

魯迅傳

上海人民出版社

1210.94/1

鲁迅传

(上)

石 一 歌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625386

上海人民出版社



625386

说 明

为了更广泛征求意见，
现将《学习与批判》已发表的
《鲁迅传》前半部汇编出版。
出版时，作者对个别文字和
史实作了修改。

一九七六年一月

鲁 迅 传

(上)

石 一 歌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4.75 字数100,000

1976年4月第1版 1976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171·206 定价· 0.34元

毛主席语录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目 录

第 一 章	从百草园到三昧书屋·····	1
第 二 章	“寻求别样的人们”·····	13
第 三 章	留学日本·····	20
第 四 章	在辛亥革命的风暴中·····	33
第 五 章	发出反帝反封建的呐喊·····	46
第 六 章	在大分化中前进(一)·····	62
	——揭露“假洋鬼子”	
第 七 章	在大分化中前进(二)·····	72
	——击退封建复古主义逆流	
第 八 章	在大分化中前进(三)·····	82
	——彷徨和求索	
第 九 章	女师大事件·····	92
第 十 章	“正视淋漓的鲜血”·····	104
第 十 一 章	在厦门·····	114
第 十 二 章	伟大的飞跃·····	127

第一章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古老的绍兴府城，石板铺的大街两旁，悬挂着“进士第”、“翰林第”、“大夫第”之类匾额的黑色大台门一个接着一个。怪异的教堂尖顶突兀而立。在台门和教堂之间，拥挤着许许多多阴暗而潮湿的小屋。

南城东昌坊口附近，有一个聚族而居的大家族——新台门周家。五进大宅院里已是一派破败景象。那断了的墙，破了的窗，那悬挂于厅堂正中的金字匾额，那两旁柱子上“品节详明德行坚定”、“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对联，都已十分陈旧，……这一切都在告诉人们，居住在这里的是一个正在衰落中的封建士大夫家族。

然而这天，一向死气沉沉的庭院里好象有了一点生气。人们脸上透露出了喜色。

原来一个婴儿诞生了。

欣喜的长辈们对这婴儿寄托了莫大的希望，指望他能延续和振兴这个日趋破败的大家族。他们动了不少脑筋，给他取过许多名字：阿张、樟寿、豫山、豫才，后又改名树人。但在三十九年以后，他却以“鲁迅”这个响亮的名字向旧世界发出了勇猛的挑战。

鲁迅诞生在一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异常尖锐的风云变

幻的年代。

一八四〇年，即鲁迅诞生前四十年，英帝国主义用鸦片和大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

其时，深居紫禁城中的道光皇帝仍然陶醉于“天朝威仪”的迷梦之中，穿戴着花翎马褂的满朝文武还在传诵着“借命爱钱”的做官经，如狼似虎的八旗军正在残酷地镇压人民的反抗。

霎时间，厦门失守，广州失守，浙东沦陷，上海沦陷，侵略军直逼南京城下。京畿道上，驿马狂奔，一次次飞报着溃败的消息。

一八四二年八月，清政府和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屈辱的卖国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赔偿军费、鸦片费、商欠共二千一百万银元。

于是，俄、美、法、德、日等帝国主义强盗也接踵而至，趁火打劫。

一八四四年七月，《中美望厦条约》签订；

一八四四年十月，《中法黄埔条约》签订；

一八五八年五月，《中俄璦琿条约》签订；

.....

中国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道路上迅速滑下去。鸦片战争以后的短短数十年中，中国就被强加上不下一百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道光、咸丰、慈禧、曾国藩、李鸿章、琦善、奕山等一长串名字，作为最无耻最卑鄙的汉奸卖国贼的代表载入了史册。

可爱的祖国被肢解宰割，大好的河山遭践踏蹂躏，人民血汗化成黄金白银，象淌水一样流进了帝国主义强盗们的无底欲望。荆棘满目，饿殍遍野，千村薜荔，万户萧疏，这便是半封建半

殖民地旧中国的悲惨写照。

但是，历史决不会在黑暗中停滞，伟大的中华民族决不会在灾难中灭亡！决定中国命运的并不是一小撮民族败类，而是千百万劳动人民。人民，这才是中国历史的脊梁。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当清政府的卖国贼们卑躬屈膝，专以“得外洋欢心”为行动准则的时候，广东三元里人民举起了反抗侵略的第一面战旗。

当清王朝的统治者们无耻地借“攘内”以媚外，宣扬反帝是“逆天不祥”的卖国谬论的时候，紫荆山下的金田村里响起了太平天国革命军“消灭妖魔！消灭妖魔！”的震天怒吼。

与此同时，上海的小刀会，北方的捻军，贵州苗民，也都相继点燃了起义的烽火，整个中国大地翻卷着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巨澜。

因此，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勾结起来把中国一步步推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时，伟大革命导师恩格斯却从中国人民的英勇战斗中，预见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就这样，伟大和卑鄙，英雄和奴才，庄严的斗争和无耻的叛卖，相比较而存在，交织成一幅烽烟滚滚的中国近代史的画卷。

绍兴新台门周氏家族也打上了这时代的深刻印记。

这个家族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购地建屋、设肆经商、作官为宦的全盛局面。可是到鲁迅出生的时候，早已走了下坡路，由大户而变为一个仅有四、五十亩水田的“小康”局面了。才过去十多年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曾给这个封建家族以相当大的冲击。象周家这种官僚地主，不可能不成为这场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的打击对象。因此，在太平军攻克绍兴时，鲁迅祖父周福清就和

全家一起出逃。经过这次“避难”，这个家族的财产大损，多数房族一蹶不振。鲁迅的一个曾叔祖在化装“逃难”时失踪，清政府美其名曰“殉难”，赏了个“云骑尉”，“世袭罔替”。然而，时代决定这样的家族已没有多少“世”可“袭”了。

随着“翰林”匾额的日渐剥落，鲁迅在成长着。

鲁迅幼时，出身进士的祖父周福清，在京候补，后来做“内阁中书”，一个从七品文官。父亲周凤仪，号伯宜，会稽生员，数应乡试未中，愁居在家。曾祖母、祖母都在。母亲鲁瑞，娘家在乡下，“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

不得志的父亲整日价不苟言笑，道貌岸然，鲁迅自然不会对他亲近。

每当夏夜乘凉，老祖母给他讲些“猫是老虎的师父”一类的故事，“水漫金山”一类的传说，但这也有限。

和鲁迅朝夕相处的是女长工“长妈妈”。她是个既有劳动者的质朴、又带有不少迷信观念的孤孀。说起话来，有时显得啰嗦，有时却又娓娓动听。譬如，她有许多关于“长毛”（太平天国革命军）的故事，说得有声有色，使幼小的鲁迅渐渐地懂得了，真正可怕的倒是镇压“长毛”的“花绿头”（官兵）。她还关心鲁迅读书的兴趣。鲁迅曾从一个远房叔祖那里听说有一本好看的书叫《山海经》，上面有许多图画。从此便念念不忘地想得到它。玩得高兴的时候还好，一到安静下来，可就想起了那绘图的《山海经》，弄得长妈妈也把这件事放到了心上。过了十多天，也许是一个月吧，长妈妈探家转来的时候，一见面就送给鲁迅一包书。她高兴地说：“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这使鲁迅大为感动。他赶紧接过来，打开纸包一看，是四本小书。看啊，那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三脚的鸟，……

特别引起鲁迅注意的是那没有了头，却“以乳为目，以脐为口”，且能“执干戚（按：为古时兵器，干为盾，戚为斧）而舞”的怪物“刑天”。这怪物那顽强坚韧、死犹不休的反抗精神，在鲁迅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切，使鲁迅在数十年之后，还深深地感念着长妈妈。

七岁了，鲁迅进了私塾，跟着一位叔祖读《鉴略》。听说读《鉴略》比读《千字文》、《百家姓》更有用。可是七岁的儿童根本弄不懂它说的是什么，“‘粤自盘古’就是‘粤自盘古’，读下去，记住它，‘粤自盘古’呵！‘生于太荒’呵！……”这种窒息思想的教育，使天真活泼的鲁迅感到浑身不舒服，加上“严父”的时刻督促，便更加不堪忍受。

一天，鲁迅想到东关镇看“五猖会”，大清早就起了床，笑着跳着，催着大家快上船。忽然，一个冷冰冰的声音在耳畔响了起来：“去拿你的书来。”——不知何时父亲站到了背后。“书”就是《鉴略》。当场指定二三十行，“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鲁迅直觉着象从头上浇下一盆冷水，但又有什么法子呢？自然得硬着头皮读着，读着，强记着；赶到背完了书，太阳已经升得高高的了。什么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五猖会的热闹，再也不觉得有什么大意思。多少年以后，他还说：“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

周家老屋后面还有一个叫“百草园”的荒芜园子。这园子当然说不上多好，但对于长年关在书屋里的鲁迅来说，那里便可算是真正的乐园了。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低唱，蟋蟀在弹琴，翻开断砖，还有蜈蚣和斑蝥；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

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复盆子，象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好得远……

冬天来了，百草园比较无味。可这时，鲁迅的好友，勇敢而纯朴的运水从乡下来了。运水姓章，每年冬天随了父亲来周家帮工。他比鲁迅大两三岁，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见人很怕羞，可是，与鲁迅却无话不谈。他心里似乎有无穷无尽的稀奇事，都是鲁迅往常的朋友们所不知道的。且说雪天捉鸟吧，“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秕谷，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夏天呢，“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潮汛要来的时候，就有许多跳鱼儿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两个脚……”特别令人神往的是夏夜看瓜了。运水动听的叙述，在鲁迅的眼前展现出一幅瑰丽的画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钢叉，向一匹獾尽力的刺去，那獾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这位农民的儿子对自己生活的天真叙述，使幼年的鲁迅知道了在自己家阴森的大墙之外，还有着一种非常丰富多采的劳动生活。面这一切，却是他每天读的书本中找不到的。以此为开端，在以后的长时期里，鲁迅逐步深入地了解劳动人民的生活命运，并把它作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问题来考察。他还曾在探讨中国农民命运和中国革命前途的小说《故乡》中，塑造了一个以运水为原型的典型形象——闰土，震撼了千百万读者的心。

长妈妈的故事，运水的讲述，尽管如此强烈地吸引着鲁迅，但在长辈们看来，这些纯属“无稽之谈”，哪里称得上什么“知识”！孔孟之道所宣扬的“学而优则仕”，才是他们的生活准则。因此，十二岁的时候，鲁迅被领到绍兴有名的私塾——三味书屋就学。塾师是个以“严”闻名的须发花白的老秀才。这所私塾离鲁迅家不远，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写着“三味书屋”四个大字；匾下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禄的谐音）。画的前面摆着一把大圈椅和一张八仙桌，那是塾师的位子。学生的座位排在两侧。

三味书屋的老规矩，先读《百家姓》，再读《神童诗》，然后是从头到尾教读“四书”“五经”。那宗旨显然是严格地按照孔孟之道的要求培养地主阶级的接班人，可算是一所典型的封建学校。鲁迅因为在家学过几年，一开头就读《诗经》。每天一大早上学，背书、“上”书、读书、写仿、对课，总要折腾十来个钟点才算完事。对“四书”“五经”之类本无兴趣，加上这叫人喘不过气来的教学安排，使鲁迅益发起了反感。后来他说过，“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

不过学生总有自己的办法。譬如读书的时候吧，就可以借机舒展一下。先是放开喉咙，大声朗读，什么“上九潜龙勿用”呀，什么“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呀，……待到先生也得意地读起什么“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噀，千杯未醉嘴~~~~~……。”全然入了迷，学生就可做自己高兴做的事了。有一阵儿，学生们喜欢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手指头上做戏，甚至跑到园子里去折梅花，寻蝉蜕，常常闹得先生惊觉过来，大发脾气。总之，老师和学生你讲你的，我玩我的。这种在当时几乎所有的私塾中都会出现的情景，反映了少年儿童对封建教育的不满。若干年后，鲁迅还兴致勃勃地描述过这么一幅闹哄哄的

私塾图景。而对当时置身其间的鲁迅来说，他觉得顶有意思的还是在讲堂上偷看“闲书”，《西游记》呀什么的。一边看故事，一边用荆川纸描画书上的绣象。“闲书”看多了，描的图也积成厚厚的一册。鲁迅的课外时间，几乎全用在搜集画谱、描绘图画上了；仅有的几个“压岁钱”，也都用来买画谱，买年画。这样便养成了他对民间艺术的浓厚兴趣。

但是，鲁迅也看到了一些令人厌恶的封建读物。一次，有个长辈给了鲁迅一本《二十四孝图》，听说是有图的书，鲁迅高兴极了。可翻开一看，却大为扫兴。

触目就是“卧冰求鲤”的故事：严寒的冬天，儿子为让母亲吃到新鲜鲤鱼，竟脱得赤条条地卧在河面冰上。

接着是“老莱娱亲”的丑恶形象：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子，身穿花花绿绿的小孩衣裳，扭捏作态地拿着“摇咕咚”，故意跌倒在地，装疯卖傻，撒娇弄痴，以博父母一笑。

引起鲁迅特别愤怒的是“郭巨埋儿”：有个叫郭巨的人，为了省下粮食“抚养”母亲，居然想活埋自己的儿子！如果说，前面两个故事是那么虚伪和丑恶，那么，这个故事就非常残酷了。鲁迅后来曾这样回忆当时读了这个故事后的心情：“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吗？”

如此等等，便是所谓孔孟的“孝道”！这些图画鲁迅是不愿再看第二遍的。反动派炮制《二十四孝图》之类，是为了以通俗的形式普及孔孟之道，“教育”即毒化更多的人民，特别是天真烂漫的儿童，但他们怎么也没料到，在鲁迅身上，却起到了相反的“教育”作用，那便是从此他对一味宣扬“孝顺”的说教愈加厌恶仇视，同那些专讲封建伦理的长辈疏远起来。

一八九三年，鲁迅十三岁的时候，家庭又发生了一个大的变故：祖父入狱。原因是光绪十九年浙江乡试，他曾为几个亲友“通关节”，结果被光绪皇帝亲笔判以“斩监候”，说不上到那一个“秋后”就要杀头。在封建社会里，行贿纳官，本属常事。拉出一个来小题大做一番，无非是要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收“安抚民心”之效，其实恰好暴露了行将灭亡的反动统治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四分五裂。

那时，“一人犯法”常有“满门抄斩”之危。于是，鲁迅就到绍兴乡下皇甫庄大舅父家中去避难。

到乡下去，鲁迅总是高兴的。一年前他就到过安桥头外婆家。那可真是鲁迅的乐土。在那里不但可以免念什么“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之类，可以对“两眼直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的“家教”不加顾忌，而且可以和许多农民的儿子一起玩耍。他们和鲁迅年龄都相仿，但论起行辈来，却至少是叔子，有几个还是太公。然而大家是朋友，即使偶尔吵闹起来，打了“太公”，一村的老老小小也决不会想出孔老二那“犯上”的罪名来。他们带着鲁迅掘蚯蚓，钓虾子。虾照例是归鲁迅这个外来的客人。要么便一同去放牛。黄牛水牛都欺生，鲁迅不敢近身。这时小朋友们便不再原谅他会读“秩秩斯干”，全都友好地嘲笑起来。最有趣的要算是夜晚驾船去看社戏了。有摇橹的，有撑篙的，有笑的，有嚷的。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散发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山峦，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他们的目的地——屹立在庄外临河空地上的一座戏台，模糊在远处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使人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就在这里出现了。……这一切愉快的玩乐，使少年的鲁迅同那些劳动人民的孩子结下了深厚

的友谊。

但这次到皇甫庄，他在亲眷中遭到了冷遇，被视为“乞食者”。只有穷苦农民对他依然热情，他们的孩子仍象往常一样同他一道玩耍。这种对比，给了鲁迅以很大的刺激，使他初步看到了剥削者的虚伪和劳动者的纯朴。在和劳动人民日益亲近的接触中，鲁迅也体会到了他们的酸辛。后来他曾写道：“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正因为这样，他对在这里迎神赛会上看过的象《女吊》那样寄托着劳动人民对剥削者的复仇思想的民间戏曲，保留着鲜明的记忆。

鲁迅在皇甫庄大约住了半年。十四岁时，回到城里，仍到三味书屋读书。这时，祖父尚未出狱。每年为了应付那个可怕的“秋后”，总要用大量的金钱去疏通，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几个月前，父亲又病倒了。家境更为困难，只好变卖东西为父亲治病。从此，鲁迅家里就彻底破落下来。

于是，鲁迅便天天出入于当铺和药店之间。药店的柜台和他一样高，当铺的柜台比他高一倍。每次都是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得忙别的事。因为开方的都是“名医”，所用的药引也就特别奇怪：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是不容易办到的东西。而且在当时的社会里，所谓“名医”，有些实际是骗钱能手。出诊一元四角，特约十元，深夜加倍，出城加倍。然而父亲的病却并不见好，反而日复一日地加重。

这样的生活，鲁迅过了二三年。终于，那班“名医”看到从这个家庭已榨不出东西来了，也就露出了真相：“我想，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

鲁迅十六岁那年，父亲终于亡故了。

亲身经历了这样的变故，使鲁迅对社会的看法在改变着。他曾悲愤地说过：“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正当鲁迅在困顿动荡的生活中从少年时代跨向青年时代的时候，整个国家也在日益激烈地动荡着。

一八九四年开始的中日甲午战争，第二年以可耻的《马关条约》作结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一八九六年，李鸿章赴俄，签订了卖国的《中俄密约》。接着，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强占旅顺、大连。另一方面，这几年里则发生了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广东武装起义，上海小车工人的反加捐斗争，康有为等五次“公车上书”，随后成立“强学会”，创办《时务报》，鼓吹维新变法。新思潮的微风在拂荡。

但在绍兴，仍然沉闷得令人窒息。“圣贤之书”使人厌倦，顽固派的冷嘲热讽更给人以重压。“维新”之风也曾吹进过绍兴，几个热心人办了一所“中西学堂”，课程中有外文和算学，但即使这种只敢把中西并提而不敢根本否定旧学的软弱尝试，也招来了顽固派的疯狂攻击，待戊戌政变失败，校名便改成了“绍兴府学堂”；于是，一切又是千篇一律，腐朽衰败。在绍兴仅仅是淡淡显露了一下的新思想、新事物，对刚刚跨入青年时代的鲁迅很有吸引力，加以家计维艰，“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鲁迅便决定打破家乡没落读书人家子弟做幕僚或做商人的老例，

不管别人的奚落和笑骂，“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巨大的历史变革以及这个变革在绍兴、在家庭里的反映，决定了鲁迅的生活道路。一八九八年春上，鲁迅接过母亲筹办的八元川资，告别了故乡，到南京去求学。

这时，鲁迅十八岁。

第二章 “寻求别样的人们”

一八九八年五月七日，鲁迅到了南京。

南京古城，一片灰暗、颓败的景象。三十多年前，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在这里被中外反动派扼杀了，英勇的太平军战士的鲜血淌遍全城。至今，留在破旧的城楼和房屋上的累累弹痕，仍在向人们控诉着中外反动派的卑劣凶残。三年前清军在甲午战争中全线溃败后，越来越多的外国军舰和货轮，从长江口进来，经过下关码头，溯江而上，肆无忌惮地深入中国内地。

街头，偶尔有一队队的新兵，扛着洋枪，唱着军歌：“波兰灭，印度亡……”，神情麻木地行进着。这就是“洋务运动”留下来的“政绩”。

“波兰灭，印度亡”，中国自己呢？帝国主义强盗正在中国横行不法，得寸进尺，这样下去，与波兰、印度这样的殖民地又有什么区别？由腐败的清兵来唱这样的军歌，岂不是一个绝妙的讽刺？目睹此情此景，鲁迅不觉打了一个寒噤。

南京城北仪凤门附近，一片荒凉。这里有着一排低矮的房屋，却引人注目地矗立着一个高大的烟囱和一根大约数丈高的桅杆。这就是江南水师学堂。

水师学堂是一所免费的学校，鲁迅因为进不起别的学校，所以来投考了。

不几天，学校举行入学考试。气氛森严的考场，威风凛凛的监考官……但是很奇怪，考试的题目并不陌生：《武有七德论》。

又是一篇八股文！

学堂郑重其事地请来了外国的低级军官做教员，待他们如同上宾，所学的课程也是以英语为主，一星期有四天。此外便是一天读古文，一天做八股文。崇洋媚外与复古守旧，奇特地混合在一起。

在“洋务派”官僚主办的这所“水师学堂”里，根本见不到江，见不到河，连唯一的游泳池也给填了，原因是有两个年幼的学生不慎淹死，学校当局就不许“水师”游水，干脆填上土，而且在上面造了一座关帝庙，借“伏魔大帝关圣帝君”的威灵来镇压那两个“淹死鬼”。每年夏历七月十五日，学堂还请一群和尚到雨天操场“放焰口”，一个红鼻子的胖和尚，戴着绣有佛像的帽子，捏诀，念咒：“回资罗，普弥耶吽！唵耶吽！唵！耶！吽！！”一股股浓烟毒雾，把洋务派搞的那点新花样都驱逐得无影无踪。

自然，“水师学堂”也不是一潭死水。对学堂的管理、课程等各方面都有反感的学生，屡屡掀起风潮。还在鲁迅进校前不久，当时上海的《申报》上就登载着一则水师学堂学生大闹厨房、校方“弹压”无效的消息。鲁迅进校后不久，也亲身受到了反动校方的“弹压”。

一天，学校里来了一个新的职员，势派很大，在青年学生面前大摆其学者架子。后来，他见到一个学生的名字：“沈钊”。因为不认识“钊”字，就喊成了“沈钩”，结果引得鲁迅和其他同学都“哗”地大笑起来，弄得这家伙十分狼狈。从此，鲁迅和同学一见到这个人，就讥笑地叫他“沈钩”。学校当局发觉了这件事，两天之内，竟然给鲁迅和其他十多个同学叠连记了两次大过两次小过。

鲁迅受到这样的处罚倒也并不觉得是什么大事，因为还有严厉得多的惩罚。水师学堂的校长，当时称为“总办”，头衔是候

补道，威风十足，清政府特地颁发了一张军令状，规定“总办”有权处罚学生，直至将学生杀头。这张军令状就挂在大堂的墙壁上，它标明这所所谓新式的“学堂”，仍然是封建王朝血腥镇压进步青年的一个工具。

面对着这派乌烟瘴气的景况，鲁迅再也待不下去了。第二年年初，他毅然脱离这所学校，进了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

矿路学堂的前身是铁路学堂，它也是由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前任两江总督张之洞奏请清廷开办的。以后，继任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发现南京附近的青龙山蕴藏烟煤，开发出来，足可渔利，于是便花样翻新，想训练一些开矿的技师，把学堂改为矿务铁路学堂，学生所学的功课也开始偏重于矿业。

在洋务派心目中，海军数英国最强，陆军就要数德国了。因此，陆师学堂及其附属的矿路学堂，一概“仿照德制”，所学的外语也以德语为主。其他的课程，便是和开矿有关的化学、物理、地质学、矿务学等。这些都使鲁迅有一种新鲜之感。而且，这时的整个中国社会也处于急剧变革之中，在鲁迅面前似乎也朦朦胧胧地展现出一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异路”。

还在鲁迅进矿路学堂以前，康有为、梁启超等一班“新党”，借助光绪皇帝，经过长期酝酿以后，终于发起了一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戊戌变法运动。从一八九八年的六月十一日到九月二十一日总共一百零三天的时间内，紫禁城里飞出了许多实施“新政”的诏书、谕令。然而，写在纸上的东西并不一定能兑现。正当“新党”做着好梦的时候，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迅速发动政变，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亡命出国。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彻底破产。

紫禁城的风波平息了，昆明湖的旋涡消散了。从表面看来，

一切恢复到和原先一样。但是，人们胸中的波澜却再也阻遏不住。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鉴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正在探索新的道路。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愈来愈多地传入中国。所有这一切汇合在一起，使鲁迅看到：四周的情况正在起变化，新思潮的风吹进了南京古城。

看新书的风气，这时便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流行起来。连矿路学堂新到的一个校长有一次也居然出了个新题目：《华盛顿论》。墨守旧规的国文教师被弄得莫名其妙，从《论语》、《孟子》想到《左传》，都想不出这“华盛顿”是怎么一回事，只好惴惴地来问学生：“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鲁迅这时也开始接触到新的报纸，新的书籍，见到了封建教育的牢笼里所没有见到过的资产阶级哲学、政治学和自然科学，觉得耳目为之一新。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和寻求着这些新书。

当时，鲁迅的生活非常艰苦，他在校一年的补贴费只有十几两银子。冬天，南京比绍兴冷得多，鲁迅连棉裤也做不起，只好穿着夹裤过冬，往往靠吃辣椒取暖。生活如此拮据，买书更为困难，但这阻碍不了鲁迅寻求新知识的欲望。他想了一个法子，把因考试成绩优异而获得的一些奖章换成现钱，留在身边作为书款。

著名的维新派人物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了。鲁迅听到消息，星期天就跑到城南的一家书铺去买。书很贵，五百文钱一部，然而鲁迅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下了。

打开书，一口气读下去，只见开首这样写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

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入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

一种颇为壮阔的思想意境突现在面前，铿锵的音节也使人读得琅琅上口。鲁迅专心地读着，有时直读到午夜才肯睡觉。

《天演论》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宣传达尔文进化论的重要著作。严复在翻译时从中国贫弱落后的现状出发，增添了自己的不少见解。这些见解和原著的观点大体相符，即：自然界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而这种发展是通过生存竞争来实现的。最适宜生存的，被选择出来生存下去，即所谓“物竞”、“天择”。他们认为这个原理，同样适用于解释人类社会的斗争和发展。因此，总的讲来，这本书前半部着重解释自然现象，是唯物的；后半部着重解释社会现象，是唯心的。鲁迅从这部书里，既受到了唯物的自然史观的影响，又受到了唯心的社会史观的影响。

大概与那位颇有点维新思想的新校长有关吧，不久，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里面摆着风靡一时的《时务报》，留日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等等。课余时间，鲁迅总是跑到阅报处去看书、读报。阅读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研究外国的历史，同时，密切关心着当时的时事政治：兴起于北方的义和团运动、猖狂入侵的八国联军、屈辱的辛丑和约……一桩桩，一件件，强烈地吸引着鲁迅的注意。既然思想上开始注入了一些新的内容，那么，他自然对各种政治事件更加敏感，更加关切了。为了表示同旧社会战斗的决心，鲁迅先后刻了两个图章：一个是“文章误我”，表示年青的鲁迅与旧文化、八股文章的决裂；一个是“夏剑生”——展现在人们面前的的是一个握剑而起，奋勇

向前的青年战士的形象。

鲁迅渴求新思潮的这些活动，终于引起顽固势力的不满和反对。一个住在南京的老本家走到鲁迅面前，手中拿着清王朝大臣、反对维新的顽固分子许应骙弹劾康有为的参本，一本正经地说：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

有什么不对呢？鲁迅不睬他。一有空，还是照旧看《天演论》，看新报纸，看新的图书。冷了，多吃点辣椒；饿了，买几个便宜的烧饼充饥。

第三学年，学校要学生到青龙山矿洞去看看，鲁迅和他的同学都去了。到那里，只见一片凄凉的景象：两架抽水机懒洋洋地转动着，矿洞里的积水有半尺深，工人穿着破烂的衣服，全身漆黑，骨瘦如柴，拿着原始的工具，双脚终日浸在水里，无力地挖着，挖着。鲁迅不由得一阵心寒，深深地感到：中国矿工真是象鬼一样地工作啊！

这就是洋务派大吹大擂的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的缩影！

三年多时间很快过去了。鲁迅看到国家的惨象，目不忍睹；看到学校的前途，一片黑暗。清廷当局，眼看煤矿榨不到油水，正在打算撤销学校了。

一九〇一年十二月，鲁迅在矿路学堂毕业，他成绩优异，领到了一张“第一等”的毕业文凭。但是，到哪里去呢？

历史已经进入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从洋务学堂毕业的鲁迅，根据自己几年来的亲身体察，彻底摒弃了标榜“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受过戊戌变法思潮影响的鲁迅，早已突破了戊戌“新党”的“君主立宪”之类的说教。他对于清王朝残暴腐朽的统治、中国人民因辫子去

留所受的灾难、二百多年来接连不断的文字狱，等等，已经知道了一个大概，再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迫令他走回头路了。

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当时很多先进分子以为，要救国，只有实现政治上的革新；要实现政治上的革新，只有学外国；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学。当时，江南督练公所正在选择留学生，鲁迅就决定到日本去。

一九〇二年三月，二十二岁的鲁迅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离别祖国，到了日本。

第三章 留学日本

鲁迅到日本后，进了东京的弘文学院。

弘文学院是一所专为中国留学生补习日语而办的学校。条件原来就不好，加上这年去的中国留学生多到几千人，学校的住房更嫌拥挤。鲁迅同七位同学挤在一间狭窄的房间里，天冷还好，到了炎热的夏季，八人合用一顶日本式大蚊帐，那真是汗流如雨、蒸气如笼了。好在楼下还有一间自修室，总算有一个读书的地方。

入学不久，一个叫大久保的学监把大家集合起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按：东京一地名）的孔庙里去行礼罢！”鲁迅听了大吃一惊，心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鲁迅深感惊奇、气愤和苦闷，难道到了日本，还是不能冲出孔孟之道的阴森罗网么？而外国人又为什么要尊孔呢？

幸好在当时，在东京为数不少的中国人中，尊孔的封建顽固势力只不过是一股逆流，革命的政治空气相当浓厚。我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传播着革命的火种，反清革命组织“兴中会”、“光复会”正在联络同志。这年春上，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学者章太炎也来到东京，旗帜鲜明地批判孔丘和儒家学说，以响亮而痛快的呼喊鼓吹着种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揭露清朝暴政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一度被禁毁的书公开了。宣传革命的杂志刊物有如雨后春笋。不久，年仅十九岁

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写的《革命军》出版，“革命独立万岁”、“中华共和国万岁”的雷霆般的呼号，尤其使革命青年热血沸腾。

鲁迅感受着这热烈的革命气氛，真是欢欣鼓舞。他的虽然不长，然而却是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使他比周围的同龄青年更深切地懂得中国社会的黑暗和腐败，懂得在中国进行一次社会大改革的必要。因此，资产阶级革命家们的宣传，对他有着更强烈的号召力。他经常“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

在东京留学生中，也还有一些冥顽不灵的保皇派。他们有的为清廷驻日使馆所雇用，做暗探，充警犬，破坏革命工作。有的靠官方资助，办刊物，造舆论，兜售君主立宪。有的则完全为了镀金做官，平时不读书，嫩嫩牛肉跳跳舞，临毕业花点钱，买上一张文凭完事。对这些人，鲁迅是深恶痛绝的，他曾与其他爱国学生一起，同他们进行过多次斗争。好几次，弄得他们狼狈不堪，丑态百出。

东京上野公园，每当樱花烂漫时节，就象笼罩着一片粉红色的云霞，非常美丽。但大煞风景的是，这儿也少不了留学生中保皇派的身影。他们那条象征着清王朝反动统治的长辫子，从国内拖到国外，到了日本还一直拖下去，以示对清王朝的忠诚。留学生须戴制帽，不得已把辫子盘到头顶上，直顶得那帽子高高耸起，难看极了，鲁迅讥之为“富士山”。此后，在留学生中，“富士山”便成了保皇派们的代名词。

既然鲁迅一直把辫子当做清王朝反动统治的标志，所以在弘文学院的江南班，他第一个剪去辫子，表示自己与封建统治者彻底决裂的决心；为其他留日学生树立了榜样。剪辫以后，鲁迅还特地拍了一张“断发照”做纪念。在这张器宇轩昂的照片背面，

他还写了一首诗，名之为《自题小像》：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爱国，救国，是鲁迅留学的宗旨。受着革命潮流的激励，遥望着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风雨如磐、暗夜沉沉的祖国，鲁迅决心以鲜血和生命去谋求祖国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此后，他不仅从未违背过自己的誓言，而且随着时代的前进，革命的发展，不断给这个誓言注入新的内容。

鲁迅怀着深厚的爱国热情，认真学习，刻苦钻研。除了学日语，还自修英语。此外，还挤出大量时间，翻阅各种历史、自然科学著作，以及被压迫民族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

鲁迅经常同朋友们讨论这样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这种讨论有时进行得很热烈。这种讨论，固然还停留在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范畴，却也反映了鲁迅早已突破当时不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热衷的狭隘的“排满”宣传，而开始把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群众的觉悟联系起来思考了。

一边讨论，一边还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行动起来。仅一九〇三年的一段时间，他就为留日学生办的《浙江潮》杂志翻译了科学幻想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撰写了科学论文《说钶》（按：钶即镅）；一九〇四年初又翻译了《北极探险记》。他想通过这类提倡科学、普及知识的活动打破反动的封建统治禁锢群众思想的精神枷锁。同时，在《中国地质略论》等文章中，他又愤怒谴责了帝国主义强盗瓜分中国的罪行，揭露了清政府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行径。鲁迅还借着古希腊斯巴

达人反侵略战争的故事，创作了小说《斯巴达之魂》，热切期望中国人民能象斯巴达人那样，在侵略者面前宁死不屈，为祖国战至最后一人，流尽最后一滴血。

鲁迅的这些作品在留学生中广为流传，激起爱国学生的强烈共鸣。后来，大家只要一知道是“周树人君”的文章，就立即争相传阅，先睹为快。这些满怀悲愤、一心想救国的青年，每当在鲁迅的文章中读到“临敌而笑，结怒欲冲冠之长发，以示一瞑不视之决志”，“世有不甘白下于巾幗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等等慷慨激昂的词句时，往往禁不住心潮激荡。

一九〇四年八月，鲁迅结束了弘文学院的学习生活，要选择专业学校了。

鲁迅原学矿务，后来在一些日本史书上读到，新医学对日本的明治维新发生很大推动作用，促进了日本的强盛。这自然是资产阶级史学家的曲解。但鲁迅出于爱国热情，受到这种说法的影响，对医学发生了兴趣。他想：学好医学回国，平时既可救治象父亲那样被愚昧迷信耽误了的病人，战时又可当军医，为反压迫、反侵略的斗争出力。他还想以医学作为宣传新思想的工具，启发人们对社会改革的信仰，达到改造国家的目的。这样，他终于决定放弃矿务，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仙台位于东京北面一个相当僻远的地方，滨海倚山，在鲁迅之前还没有中国留学生去过。友好的日本人民热烈欢迎第一位中国学生的到来。

从此，鲁迅就看见许多陌生的老师，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这门课程是由两个教授担任的，最初讲骨学，走进课堂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他用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自我介绍：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接着他就讲解剖学在日本发展的历史，他指着挟进来的那一叠书说，日本最初关于这门学问的著作，有的还是翻刻中国译本的。

藤野先生非常关心他的第一个中国学生。才过了一星期，他就请人把鲁迅叫到自己的研究室里，问：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第二、三天，他就把讲义还给了鲁迅。鲁迅打开一看，全部讲义已用红笔从头至尾改过，不仅添了脱漏之处，连语法错误也一一订正。此后，藤野先生每星期都要这样来改一次鲁迅抄录的讲义。

鲁迅从心底里感激藤野先生。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对他是一种鼓舞和鞭策。

鲁迅在仙台医专的学习是极其紧张的。在此期间，除了跟同学到松岛去过一趟外，唯一的一次旅行是在一九〇五年春假，应弘文学院同学、好友许寿裳邀请到箱根去了一次。那是一个樱花盛开的日子。登山一望，只见“芦之湖”明净如镜，三面环山，正面缺口处恰好有富士山遥为屏障，真所谓“白扇倒悬东海天”了。但鲁迅从这湖光山色，想到了自己美丽而又苦难的祖国，所以很快便赶回东京转往仙台去了。

可是，刻苦地学习医学是否就能拯救祖国？这个鲁迅原来深信不疑的信念，不久竟被现实打破了。

那时日本已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鲁迅赴日那年，即一九〇二年，日本同英国订立了“同盟条约”，参与瓜分中国的罪恶勾当，并积极准备日俄战争。正在鲁迅到仙台之前，一九〇四年二月十日，已经对俄宣战。这样一来，日本那些军国主义分子在中

国人面前便特别的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仙台医专也有这样一些人，就在藤野先生等人无微不至地关怀着鲁迅的同时，他们却不断对鲁迅进行侮辱和挑衅，对此，远离祖国和同胞的鲁迅总是予以坚决回击。

这是一九〇五年的下半年。解剖学、血管学、神经学都已学过，现在正在学习细菌学。这门课的教师常常借用电影来显示细菌活动的情形，学校当局也便趁机加映一些时事影片，鼓吹军国主义。

一次，教师上了一堂细菌学，离下课还有一段时间，就又放起了时事影片，仍然是歌颂日本“皇军”在日俄战争中的“赫赫武功”的。鲁迅跟同学们一道看着。突然，银幕上出现了这样的镜头：一伙日军抓住了一个中国人，据说他做了俄国人的侦探，现在要拉去枪毙了。影片还别有用心地渲染这样的场面：刑场周围有不少中国人围着看热闹；他们的身体似乎都很强壮，脸上却流露出一种麻木的神情。看到这里，鲁迅感到难言的痛苦。

“万岁！”一个反动的日本学生禁不住歇斯底里地欢呼起来。

“万岁！”还有一些人附和着。

“只要看中国人的样子，就可断定中国必亡。”有人得意而恶毒地议论着。

污蔑、诽谤、叫嚣，毒箭般向鲁迅袭来，鲁迅怒不可遏，愤然离开了教室。

愤怒和悲痛攫住了年轻鲁迅的心，他躺在教室外面的草地上，仰望辽阔的长空，思绪如乱云般飞驰：学医，无非是要使祖国人民身体强壮。但有了好的体魄而思想得不到解放，还不是象刚才影片里那样，被人抓去屠杀么？不是“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么？一个备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动政府压迫的中国，是医学挽救得了的么？新医学真能使祖国摆脱被侵略、被

奴役的悲惨命运么？看来是可疑的。

鲁迅沉思着，走出校园，登上青叶山。

已是严冬季节了。眼前寥廓无际，万物萧索；惟有身旁的劲松，一株株直刺云天，不屈不挠；对面的大海，一声声巨浪拍岸，奔腾呼啸。望远方，水天一色，云雾迷茫，祖国啊，遥远的祖国，究竟通过什么道路，才能使您摆脱深重的苦难？

这件事对鲁迅是一个大刺激，使他“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重要的是改变人们的精神。

鲁迅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道路。这一学年还没结束，鲁迅便去找藤野先生，告诉他，自己决定不再学医，并将离开仙台。

藤野先生显得很难过，似乎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鲁迅尊敬藤野先生，深恐先生更加难过，只得这样婉转地安慰他。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藤野先生叹息地说。

.....

去东京前，鲁迅又去向先生告别，藤野先生拿出自己的一张照片，送给鲁迅，背面郑重地写着两个字：“惜别”。此后这张照片一直带在鲁迅身边。在北京工作期间，还挂在房间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多年以后，鲁迅还这样深深地怀念着藤野先生。

离别了仙台，鲁迅于一九〇六年初春来到东京。

他告诉在东京的朋友们说：“我退学了。”

友人大吃一惊：“为什么？你不是学得正有兴趣吗？为什么

要中断？”

“是的”，鲁迅坚决地说，“我决计要学文艺了。”

为了倡导新文艺，鲁迅到东京后，不再进专门学校，只在“独逸语学会”办的德语学校挂了个名字，有时去听听德语课，主要精力则用以参加革命活动，翻译介绍外国文艺作品。

一九〇六年的东京，以孙中山、章太炎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正在展开剧烈的论战。论战的焦点是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章太炎这时刚刚刑满出狱到日本，他主编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号召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影响很大。改良派则以《新民丛报》为据点，高唱君主立宪的滥调，反对革命。鲁迅积极参加了这场论战。他密切注视论战的发展，热心阅读报纸刊物。章太炎批判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保皇、尊孔主张的战斗文章，特别引起他的兴趣。他经常把报纸收集起来，装订成册，以备随时翻阅。

鲁迅搞文艺，开始重在译介被压迫民族的进步文学作品，特别是反映捷克、塞尔维亚、保加利亚、芬兰、匈牙利、希腊，以及北欧一些弱小国家生活和斗争的小说；也注意俄国的作品，主要是那些暴露沙皇罪恶统治的。至于当时的日本文学，鲁迅倒并不怎么重视，除少数几个作家，很少过问。对于当时颇为流行的自然主义，尤其不感兴趣。他的选择要求是那些表现反抗精神，有助于唤起中国人民觉醒的作品。但这类作品，那时的日本却最不注意翻译，出版得很少。因此他不知疲倦地学习外语，主要是德语，有一阵还学俄语。而且是边学边译，废寝忘食，常常通宵达旦。

这次到东京，先是住在本乡区汤岛二了目的伏见馆里，不久又搬到东竹町的中越馆居住。鲁迅住在楼下。每晚客人走后，即于煤油灯下，矮脚书几前席地而坐，看书、译著，到什么时候睡

觉，别人是不知道的。只是到了第二天早晨，房东来收拾房间时，往往看到炭火盆里，插满了香烟头。

翻译了作品，要有个发表的阵地，鲁迅打算组织几个人办一个文艺刊物。但是东京的留学生，多数是学法政和警察的，跟他们无话可说。后来总算找到了几个人，便着手筹备。定印了稿纸，拟好了插图，做好了计划，文稿也已齐备，甚至刊物的名称也定了，曰《新生》。可是正当刊物要出版的时候，有人却偷偷溜走了，还卷走了筹集的资金；而答应供稿的人也忽然不知去向。剩下鲁迅、许寿裳等三人，根本无力支付出版费用。一个美好的愿望破灭了。

刊物虽然夭折，斗争必须继续。鲁迅一边继续译介欧洲大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富有民主精神的作品，同时开始突破文艺的范围，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了整个旧文化、旧思想，决心为我国民主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制造舆论，扫除障碍。

仅一九〇七年这一年，鲁迅就给《河南》杂志撰写了四篇长文：《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在这些文章中，鲁迅以战士的姿态，猛烈地批判了洋务派、改良派和复古派。鲁迅接受的进化论观点是改良派介绍进来的，但他们自己在政治观点上却无法接受新陈代谢的革命结论。鲁迅的这些批判清楚表明，他坚定地站在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上，与改良派鲜明地划清了思想界线，因此，他能看透形形色色的古装绅士们借革命以自肥的妥协性和欺骗性。

《人之历史》是中国早期介绍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及其发展的重要论文之一。《科学史教篇》概述了西方自然科学的演变，说明了科学在改造自然、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这两篇文章，坚持进步，坚持发展，反对倒退，反对复古，揭露了“中国抱残守阙之辈，耳新声而疾走”的丑恶面目。

《文化偏至论》则是针对新老改良主义者而发的。维新派如康有为、梁启超，洋务派如李鸿章、张之洞，都拜倒在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脚下，“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实在是借帝国主义的“钩爪锯牙”，来压榨和屠杀中国人民。所以鲁迅直斥他们为“垂微饵以冀鲸鲵”的“巨奸”。

鲁迅既反对“死抱国粹”、因循守旧，也反对照抄西方，亦步亦趋。倘若依了这两者，结果只能是“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沈沦遂以益速矣”。

那末，出路究竟何在？鲁迅认为，“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掇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这种看法的产生主要是受了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但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在封建思想还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提倡个性解放，敢于标新立异，期望勇猛的革命战士出现，还是有其进步意义的。这也是他在另一篇论文《摩罗诗力说》中那样推崇“摩罗”诗人的原因。

“摩罗”，梵文音译，“天魔”之意，欧洲称“撒旦”。本来是有些人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诗人拜伦的称呼，后来“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所谓“摩罗”诗人也就是造反诗人。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全面地介绍了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艺思想，热烈歌颂了那些革命民主主义的诗人：拜伦、雪莱、彭斯、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裴多菲……他们都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代表进步的社会力量，同反动统治进行了英勇的战斗。

面对着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重压的祖国，鲁迅渴望有

自己的“摩罗”诗人出现。他大声疾呼：“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鲁迅的这个呼声是热切感人的，但他当时还不可能认识到，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不可能出现欧洲当时那种彻底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的。

这些政治论文和文艺论文，突出地表现了鲁迅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斗争精神，推动了当时的革命运动，是中国革命史和文艺史上的重要文献。但是也表明了鲁迅在世界观上的阶级局限和历史局限。他当时对社会生活的理解，虽然也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而唯心主义却是占据了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启蒙学说曾经对他有所启发，资产阶级没落时期的反动哲学如尼采哲学中的“超人”说，也对他产生过或多或少的消极影响，尽管他的用意是想通过发扬个性来突破随波逐流的奴才哲学和市侩哲学，和这些仇视群众的反动哲学的提倡者完全不同。

一个经历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转变的无产阶级战士，在其早年受到历史唯心论的影响是不足为怪的。鲁迅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永远自觉地紧跟时代的步伐，坚持战斗，坚持前进，一步步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终于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而他的多少同时代人，包括那些曾风云一时，影响很大的人物，却被历史无情地抛到后面，销声匿迹了。

一九〇八年春，一个雪花飞扬的日子，鲁迅和四位同学迁居到本乡西片町一所房子，取名“伍舍”。这时，鲁迅继续同革命党人保持着密切联系。

鲁迅刚到日本时，就与同文书院的邹容相识。后来，又同秋瑾、徐锡麟有所交往。一九〇八年初，光复会创始人之一陶成

章来日,跟鲁迅的关系更加密切,隔不了几天总要来找鲁迅谈谈。陶成章那时正积极联络江浙会党,计划起义。他所谈的都是某地不久可“动”的事,还托鲁迅代为收藏文件、票布、龙头(按:龙头系会党某堂口的头头,此处指龙头所戴之标志,系用红缎制成。)之类的物品。这年,鲁迅由章太炎介绍,加入了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

对当时站在革命前列的章太炎,鲁迅一直是很尊敬的。因此在学习和工作那样紧张的情况下,每个星期日上午还要跑到《民报》社去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那是一间八席(按:一席相当一张单人床大小)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太炎先生坐在正面,鲁迅等八位学生三面围坐。章太炎对学生的态度很好,随便说笑,同家人朋友一样。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小胡须,笑嘻嘻地讲书,庄谐杂出,特别那些借训诂挖苦孔老二的妙语,常常引起哄堂的笑声。鲁迅之尊敬章太炎,首先并不是因为他有学问,而是因为他和保皇派、改良派、复古派进行着斗争。前去听讲,也是这样,“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直到多年以后,鲁迅还说,“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这段时间,鲁迅的主要精力仍然集中在译介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新生》没办成,于是便把译好的作品汇集成《域外小说集》出版。到了第二年,一共出了两册。但寄回国内来卖,销路却使鲁迅大失所望;看来,在当时的情况下,靠少数几个人用这种方式进行宣传鼓动,效果并不大。

这时,斗争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九〇六年开始的大论战,以保皇派和改良派的惨重失败而告终。清政府黔驴技穷,竟与日本政府暗相勾结,驱逐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出境,限制革命者的活动自由。东京的革命活动便日益冷落下去了。

但是，革命是镇压不了的！

一九〇七年，湖南浏阳、醴陵革命党人，头裹白巾，手执白旗，号称革命军，发动起义。

同年，还接连发生过“潮州之役”、“黄冈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孙中山更亲自领导了“镇南关之役”。徐锡麟在安庆，秋瑾在绍兴，也同时密谋起义，未果身死。

一九〇八年，革命党人又组织了“马笃山之役”、“云南河口之役”。

安庆熊成基于同年率领马队营起义。

西南边疆、广州、钦州、廉州相继燃起武装反抗的烽火。

.....

在祖国的大地上，革命在召唤。鲁迅于一九〇九年夏离日返国。

第四章 在辛亥革命的风暴中

鲁迅一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就怀着满腔革命激情，投入了反封建的斗争。

由于许寿裳的推荐，鲁迅到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化学和生理学教员，兼植物学的日文翻译。两级师范的校长是沈钧儒，教员多是日本留学生，民主思想比较浓厚，他们经常在一起议论国家大事，赞美孙中山、秋瑾等人的革命精神。在教学上，他们也开始摒弃封建阶级那一套腐朽的教育方法。其中尤以鲁迅最为突出，他不但开设新课程向学生讲授新知识，而且经常带他们到孤山、葛岭、北高峰一带去采集标本，进行野外实习。

这些进步言行，自然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这年冬天，校长沈钧儒辞职，浙江巡抚立即派了一个以“道学家”闻名的孔孟之徒夏震武继任。这个封建顽固派到校的第一天，就倚仗官势，破口大骂革命党是“髡首易服”，“邪说谄之”，使“正学扫地”，疯狂叫嚣要进行所谓“廉耻教育”，并迫不及待地恢复封建秩序，要监学（教务长）陪同“谒圣”，甚至要教员用官场下属见上司的“庭参”礼节，穿礼服到礼堂向他“参见”。

夏震武的倒行逆施立即受到鲁迅等进步教师的反击。他们拒绝“谒圣”，反对“庭参”，并轻蔑地把这个顽固派称为“木瓜”，坚决和他进行斗争。教师们相率罢教，最后全体辞职，搬出学校。夏木瓜慌了，一面向浙江巡抚求援，一面对态度坚决的鲁迅、许

寿裳进行人身攻击。最后又用提前放假，遣散学生的办法，妄图使教师们屈服。鲁迅等进步教师绝不退让，他们的正义斗争得到了杭州各校教员的声援，风潮逐渐扩大。至此，夏木瓜只好卷起铺盖灰溜溜地走了。

民主、进步的力量终于战胜了封建、顽固的势力。鲁迅等人胜利返校了，他们风趣地开了一个“木瓜纪念会”，来庆祝这次反封建斗争的胜利。

第二年的秋天，鲁迅回到故乡，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的监学兼教员。

全国蓬勃兴起的革命风潮，也冲破了这座古城的沉寂气氛，绍兴已不是鲁迅童年时代的绍兴了。学生们知道鲁迅和著名的革命党人秋瑾等有过交往，对他十分景仰，都喜欢和他接近。鲁迅经常和他们讨论时事政治，假日到了，就带着他们到名胜古迹参观游览，采集植物标本。

这样，鲁迅又成了绍兴的封建顽固派十分注意的人物。

鲁迅的辫子已在日本剪去，现在留着短短的头发，有时穿灰布长袍，下面是西式裤子，有时干脆就穿西服。这样的一身装束，在那些“圣人之徒”眼里，已经显得异乎寻常，大逆不道，更何况又有新的思想和活动！于是，他们就污蔑讥刺鲁迅是“里通外国”。特别是那个绍兴知府，每次到学校来，有话无话都要找鲁迅谈谈，两只眼睛老是骨碌碌地盯着他的头发看，似乎要从那里发现出什么东西来。

对封建顽固势力的嘲笑和监视，鲁迅毫不畏惧。他认真教书，团结和组织学生，时刻准备着和他们进行战斗。有一次，浙江提学司特派专员来校搜查，说是接到密告：绍兴府中学堂是革命党人的秘密活动机关。鲁迅闻讯后立刻召集学生骨干商量对策，支持他们开大会进行说理斗争，使那个专员一无所获，狼狈

不堪，只得悻悻而回。

总之，人们都已感觉到将有一场暴风雨来临。但是，暴风雨前的空气特别令人窒息。这期间，鲁迅在教学之余，辑录了许多古代散佚的小说和有关会稽的历史、地理逸书，后来出版的《古小说钩沉》和《会稽郡故书杂集》，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编纂成的。但是，鲁迅的心是不平静的，他痛恨反动统治者的垂死挣扎，痛恨城狐社鼠的横行跋扈。他是多么迫切地期望着革命风暴快点来到呵！

鲁迅的愿望很快就实现了。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领导下，辛亥革命爆发了。武昌新军攻占湖广总督衙门，宣告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

缺口一经打开，革命洪流汹涌奔腾，席卷全国。

十月下旬，湖南建立了军政府，陕西革命党人占领西安，江西宣布独立，山西脱离清廷。十一月初，上海成立沪军，宣告独立；江苏各地农民暴动，树起了革命大都督的旗帜。十一月四日，革命党人活捉了浙江巡抚，焚毁了抚署衙门，杭州光复了。

杭州光复的喜讯，很快传到绍兴。古城人民沉浸在欢乐之中。日夜盼望着、并以自己的长期努力争取着祖国人民从封建枷锁中解放出来的鲁迅，自然是特别兴奋。他一时感到满眼光明，在他心目中，中国人民已经成了国家主人了，祖国有了新生的希望。他曾以兴奋的心情，描述了辛亥革命的盛况：“国土桓桓，则首举义旗于鄂。诸出响应，涛起风从，华夏故物，光复太半，东南大府，亦赫然归其主人。”

绍兴人民举行庆祝胜利大会，大家一致推举鲁迅为大会主席。鲁迅满怀革命豪情地讲述了革命胜利的意义，表达了自己喜悦的心情，并倡议组织群众上街游行，组织讲演队分散各处演说，扩大革命影响。鲁迅的讲演和倡议得到了大家热烈的拥

护。

一天，鲁迅从家里到学校去，忽然看见人们神色仓皇地奔跑着，店铺也砰砰地在上门板。鲁迅感到很诧异，一打听，原来是有了反动派的谣言，说什么杭州被打败的清兵要渡钱塘江到绍兴来了。鲁迅知道，现在人心浮动，如果不及时加以安定，就要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使革命遭到损失。因此他急忙赶到学校，把学生召集起来，组织武装演说队，上街辟谣，宣讲革命道理。

手执长刀的学生迅速排好了队，等候出发。鲁迅身穿灰色棉袍，头戴陆军军帽，腰挂红缨长刀，威武地站在队伍前面指挥着。

突然，一个学生问道：“万一有人阻挡怎么办？”

“你手上的指挥刀是做什么用的？”鲁迅的两眼发出了炯炯的光芒。

鲁迅的意思十分清楚：要用手中的武器坚决捍卫革命的成果！

武装演说队雄赳赳地上街了。鲁迅和学生们在街头巷尾，向群众详细说明杭州光复的经过，告诉他们清兵不可能南扰的道理。“溥仪逃，奕劻被逮！”的传单张贴在大街的两旁，“革命胜利万岁！”“中国万岁！”的口号声在古城的上空震荡。

革命的舆论使人心重新安定了下来，店铺也重新开门了。

谣言的流传，说明被推翻的阶级在作最后的挣扎。一种办法失败了，他们立即更换一种。很快，绍兴街头又突然冒出了许多“革命派”，扬言要“组织新政府”。

果然，“绍兴军政分府”的招牌很快打出来了，府长就是原来绍兴府反动知府程赞清，治安科科长是杀害秋瑾的谋主、大土豪章介眉，什么行政司长、军械司长，都是原来的铁路股东和钱店掌柜之类。

第二天，鲁迅在日本留学时的老同学范爱农戴着一顶农民常用的毡帽来到了鲁迅的家。范爱农比鲁迅先回国，回来后受到封建势力的轻蔑、排斥，几无立足之地，只好躲在乡下，靠教几个小学生糊口。鲁迅回绍兴后常和他相聚，喝点酒，谈谈心，一起批评时政，关系很亲密。

这天，范爱农脸上露出从来未有的笑容，一见面便说：“老周，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我们同去。”

走到街上，满眼白旗。但是鲁迅随即把这几天观察的结果愤怒地告诉范爱农：所谓军政府实际上只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貌似革命，“内骨子是依旧的”。

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军政府”自然受到人民的强烈反对。没有几天，鲁迅听到一个消息，说是在杭州起义的革命党人王金发的军队今晚要来到绍兴。鲁迅十分高兴。王金发革命武装力量的到来，就是对程赞清“军政府”的一个沉重打击！当晚，鲁迅和学生们一起兴高采烈地到城外去迎接，可是没等着。

第二天晚上，鲁迅又去了。黄昏过后，明月皎洁。忽听远远响起了枪声，接着便看见在一片朦胧的月色中，有两三只白篷船快速地摇来，里面坐满了王金发的军队。部队一上岸，立刻向城内进发。绍兴人民都兴奋地拿着写有“欢迎”字样的白旗，高举火把，夹道欢迎，革命的口号响彻了绍兴夜空。

王金发一进城，马上解散了旧乡绅的“军政府”，组织了新的军政府，自任都督，推行了一些革命措施：逮捕了陷害秋瑾的章介眉，没收了一些反动地主的田产，任用了一批新人，鲁迅也被委任为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范爱农当上了该校的监学。绍兴出现了新的气象。鲁迅和范爱农愉快地接受了新的职务，积极地投入了建设学校的工作。

王金发开始时还比较能够倾听群众的意见，作风也较民主，

没什么架子。鲁迅和范爱农本来同他是熟悉的，所以比较随便，范爱农有一次还摸摸他的头，开玩笑道：“金发大哥，依做都督哉！”

可是，“金发大哥”变成“都督”没有多少时日，就暴露了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他认为“现在共和之局已定，断无再有反对之人”，要群众放下武器，甚至在军政府里留用了程赞清。思想一麻痹，敌人就乘虚而入。没有多久，封建势力便把他包围起来，用“祖传的捧法”，把他捧起来。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把王金发捧得昏头昏脑，忘乎所以，革命气息渐渐淡薄，资产阶级的腐朽作风日见浓厚，终而关起门大做都督，并且开始动手刮地皮了。衙门里的人，穿布衣来的，没有多久就换上了皮袍子，虽然天气还并不怎么冷。

生活愈来愈腐化，政治上思想上对封建阶级也愈来愈妥协，王金发竟然常说什么现在已经是民国，大家都“咸与维新”，应该“不念旧恶”，甚至把大恶霸章介眉释放了。

对王金发的腐化倒退，鲁迅感到十分痛心。

一天，一个学生急匆匆地跑来，激动地说：“王金发他们还是不行，我们要办一种报来监督他们，不过发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

开辟舆论阵地，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批评，这对挽救王金发他们的错误是个好办法。鲁迅爽快地答应了，并给报纸起了个《越铎》的名字，希望它能在政治上起到警钟作用，使王金发等人迷途知返。鲁迅还为报纸写了《〈越铎〉出世辞》，声明报纸宗旨是“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复，振勇毅之精神。”他抱着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下去的决心，满腔悲愤地向革命领导人呼吁，希望他们同封建阶级坚决斗争，不要使革命半途而废，“任华土更归寂寞”。因为“专制永长，昭苏非易”，革命的胜利是得之不易的！

《越铎日报》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正式出版了。在鲁迅的指导下，报纸办得很有生气，它尖锐地讽刺了混入新政府的旧官绅的腐败，坚决地揭发了谋害秋瑾的反动政客章介眉的罪行，恳切地批评了军政府的缺点和错误。报纸还接受鲁迅的建议开辟了“稽山镜水”专栏，以三言两语的短文来讥评社会上的不良倾向，受到群众的欢迎。

但是，报纸创刊不到一个月，一些居心险恶的人又企图改变它的方向，把它变成反对王金发的工具，竟然发表了谩骂王金发，为章介眉辩护的文章。王金发看了之后，自然是大为不满，这时，谣言又从阴暗的角落里冒了出来，说是王金发已恼羞成怒，要派人来暗杀鲁迅。

鲁迅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焦急，但是鲁迅并不相信，他认为王金发虽是“绿林大学出身”，即没有什么文化的革命者，但“还算顾大局”，“杀人却不很轻易”。因此照样每天到学堂去，晚上还提着写有“周”字的灯笼，坦然地到学堂去住宿。

王金发没有来暗杀鲁迅，但他在鬼蜮们的包围下，仍然执迷不悟，甚至是非不分地停发了府中的经费。鲁迅对绍兴的政局十分不满，他知道，学校是难以办下去了。

正当这时，已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的许寿裳，受了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委托，接连来了两封信，请鲁迅到南京教育部去工作。范爱农也很赞成，但颇凄凉地说：

“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罢……。”

鲁迅理解他的心情，决计去南京。于是，到都督府去辞职，自然照准。派来继任的是一个封建老顽固，孔教会会长。

一九一二年二月，鲁迅怀着对光复后的绍兴失望的心情，再度告别了家乡。

其实，鲁迅看到的绍兴正是全国的一个缩影。

辛亥革命枪声一响，软弱的资产阶级就企图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妥协，来换取他们的所谓“同情”。他们公开声称，只要反对清朝，拥护共和，均可引为同志。全国各地反革命势力就趁机活动，利用辛亥革命领导者的妥协性，投机革命，个个满口称“我们本来都是‘草字头’一路的呵……”，一头钻进革命阵营，窃取了革命政权。至一九一二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举国上下，都已经是“新政府，旧人物”的局面了。

鲁迅来到南京，很快就发现它和绍兴并没有什么两样，革命时刚涂上的新漆已经剥落殆尽，旧相早已显露出来了。就在他刚到南京的时刻，孙中山被迫辞去了大总统职位，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登上了总统的宝座。四月，革命党人又一次屈从袁世凯的意旨，决定临时政府迁至北京。至此，鲁迅热切期待过的辛亥革命，彻底失败了。

五月五日下午，鲁迅随教育部北上。他怀着沉重的心情由海路乘船至天津，再转车北京。一路上，只见黄土漫漫，草木零落，人烟稀少，满眼凄凉。在军阀蹂躏下，北方农村真是一片死气沉沉，“无可观览”。

到京后，鲁迅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县馆的“藤花馆”里。这是一个相当狭小而又冷僻的院子。鲁迅先住西屋，半年后又移入朝南的小屋。

鲁迅在教育部任教育司第二科科长，八月又任佾事，负责主管图书馆、博物馆以及美术教育等方面的事情。可是，北洋军阀控制下的政府，把旧官场种种腐败恶习全盘继承了下来，教育部自然也不例外。几乎所有的人均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而一些旧官僚又相互勾结，把南方来的部员视为“新党”，加以排挤。

对部里的腐败现象，鲁迅看不惯；而北京的整个现实又使他更加愤怒。

在袁世凯的高压政策下，北京人民不但生活毫无保障，而且完全丧失了言论和行动的自由。公共场所引人注目地写着“莫谈国事”的标语，特务侦探到处盯梢，甚至在饭馆澡堂，脱下大衣挂在那里，都会有人随时塞进条子，说你反袁，加以逮捕。特务机关“军政执法处”，成了杀人魔窟，只见抓进去，不见放出来。恐怖的阴影把整个北京城笼罩住了。

现实中的种种现象，使鲁迅深切地感受到不将革命进行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王金发他们不行了，那么，新的革命力量在哪里？鲁迅找不到答案，苦闷异常。他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同时，他还进行着搜集和研究古籍的工作。

从教育部下班回来，鲁迅就挑灯抄书，校订古籍；每逢假日，则常到琉璃厂书店，选购古书。《谢承后汉书》、《唐宋传奇集》、《嵇康集》等都是鲁迅到北京后不久辛勤辑录校订的成果。后来，鲁迅又钻研佛经，抄古碑、收拓片，搜集汉画像。鲁迅把这些当作古代的哲学、文学、艺术、历史的材料，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和研究。这项伴随着深沉的苦闷和寂寞所做的工作，结果是深化了他对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本质的认识。

七月十九日，鲁迅从家乡来信中得到一个悲痛的消息：范爱农不幸落水身亡。鲁迅很震惊。来京后，范爱农曾来过几封信，谈到他又被孔孟之徒所排斥，以至生活无着而寄食于人，言辞十分凄苦。鲁迅曾想在北京给他找点事做，可是没有机会。后来鲁迅回故乡去，听人说，范爱农生前在失望中常常这样安慰自己：“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豫才来叫我的。”可想不到他竟如此悲惨地死去了。是不慎落水吗？鲁迅知道，他是浮水的好手，不容易淹死的。因此，鲁迅不得不疑心这是一个痛感革命失败而又走投无路的战士在悲哀的失望中处置了自己的生命。有好几天，鲁迅脑际一直萦绕着这个曾在革命风暴

中共患难的老友形象，久久不能释然。

二十二日晚上，大雨滂沱，狂风怒吼。鲁迅独坐在会馆中，不禁又想起了范爱农。范爱农的死是封建势力迫害的结果，也是辛亥革命的失败所造成的。一年多来，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感触在鲁迅胸中翻卷，他于是铺纸磨墨，悲愤地援笔写道：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

这不是一首普通的悼友诗，而是溶入了鲁迅对复辟后社会现实的有力批判：

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

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

清王朝刚刚倒下，袁世凯等大大小小的“桃偶”随即粉墨登场，照旧卖身投靠帝国主义，照旧骑在人民头上，从“故里”绍兴到全国，依然是一派寒云滚滚、长夜漫漫的凛冽景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就是这样的结果。

“桃偶”既然登场，自然要有各种表演。当初，袁世凯是脱下清朝袍褂，换上民国总统服装，现在他又想穿起龙袍做皇帝了。为了实现这一复辟阴谋，他又乞求于孔老二的亡灵，大搞“尊孔祀天”活动。一九一三年六月，他发布了《通令尊崇孔圣文》，当时已彻底堕落的保皇分子康有为等也紧紧跟上，在《不忍》杂志上大肆鼓吹孔老二为“中国之教主”。资产阶级改良派与封建复古主义者已进一步溶为一体。谁要搞复辟就必然要尊孔，袁世凯以他的反动实践又一次证明了这个历史规律。而在这个时候，那些曾一度活跃于辛亥革命之前的有着浓厚崇洋思想的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已根本无力与他们进行战斗。相反，这些人自己也可能早或迟地开始转化为革命的对立面。因此，尊孔逆流一时相当嚣张。

鲁迅所在的教育部，是执行袁世凯尊孔通令的主要机构之一，这一来就忙得不亦乐乎。不仅组织别人搞，教育总长汪大燮还要部员带头身体力行。九月二十八日，是所谓“孔诞日”，汪大燮更是命令全体部员必须到国子监去祭孔。这天早晨，鲁迅也去看了一下这个丑剧，回来后，他在日记里记录了这样一个祭孔场面：

二十八日：星期休息。又云是孔子生日也。昨汪总长令部员往国子监，且须跪拜，众已譁然。晨七时往视之，则至者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钱念劬又从旁大声而倡（骂）。顷刻间便草率了事，真一笑话，闻此举由夏穗卿主动，阴鸷可畏也。

这篇日记，几乎是一篇绝妙的讽刺小品，尊孔者的丑态和不满者的神情刻划得维妙维肖；而鲁迅对复辟分子搞尊孔丑剧的愤恨和鄙视，更是溢之于字里行间。

为了附和袁世凯的政治需要，各地反动派呈请实行各种尊孔措施的公文不断送到教育部来。但这类公文一旦落到鲁迅手里，总被他巧妙地“驳”回去。例如有一次，鲁迅处理山西来的一个公文，这个公文居然要求在山西省文庙设立一个不伦不类的“崇圣会社”。鲁迅当即表示：“‘崇圣会社’这个名义就可笑了，更不要谈内容了。”干脆打了回去。

一九一四年，鲁迅还组织了从浙江来教育部任职的五位同事，一起签名写信给教育总长，反对“读经祭孔”，并将信另抄一

份摊在办公桌上，引得其他部员竞相来阅。

袁世凯妄图靠尊孔称帝，不久却在尊孔的“韶乐”声中灭亡了。但是，笼罩在北京上空的复辟乌云并未消散。一九一七年七月，反动军阀张勋又刮起复辟的阴风，他的“辫子兵”和清朝的遗老遗少，象从棺材里爬出来的僵尸，转眼间又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乱跑乱窜。在张勋复辟的日子里，鲁迅“无日不处于忧患中”，为了表示抗议，他曾愤而辞职。

由于藤花馆过于嘈杂，鲁迅于一九一六年五月搬进了补树书屋。这是一个一排四间屋的小院落，在院子里有一棵槐树，相传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所以房子一直没有人住。鲁迅就在这静谧的环境中，继续从事中国文学古籍的纂辑和校勘工作，思考着中国革命的问题。

这几年来，鲁迅经历过多少阶级斗争的风浪呵！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历史的风云从他眼前迅速地翻滚而过。鲁迅总结了辛亥革命的教训，研究了中国历史上反动派镇压革命的惯用手法，分析了眼前的社会现实，经过总结和研究，他痛感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无以对付封建反动派的阴险和凶残，痛感资产阶级脱离群众和群众的不觉悟，……他对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已从逐步怀疑到了失望。长夜漫漫，风雨凄凄，革命的出路在何方？这时，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未到来，时代还没有向鲁迅提供这些问题的答案。于是，他只能在沉寂的环境里，继续深深地思索着。

毛主席在论述中国近代史时曾经说过：“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

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鲁迅，就是经历了寻找——奋斗——失败——怀疑这个典型过程的许多“先进的中国人”中的一员。他在辛亥革命后的苦闷和思索，包含着深刻的时代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成熟之前，鲁迅自然也不可能产生出超越时代思想和行动。

但是，就当鲁迅在绍兴县馆中默默地思索着的时候，时代的车轮却在不息地前进，无产阶级推翻旧世界的革命浪潮已经在东方地平线上涌现……

世界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即将掀开新的一页。

第五章 发出反帝反封建的呐喊

一九一七年冬，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得出了走俄国人的路的正确结论。

十月革命的消息传来之前，鲁迅仍在绍兴县馆里抄着古书。但当时，在他身边，有一个战斗阵地——《新青年》杂志，引起了他的深切的关注。

《新青年》自一九一五年创刊以来，提倡科学和民主，对封建旧文化和旧道德，曾经作过一定程度的揭露和批判。一九一七年初，又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展开了白话文运动。但是，当时在《新青年》上发文较多、以反孔斗士姿态出现的陈独秀、吴虞等人，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目标，不过是幻想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他们使用的也仍然是资产阶级思想理论武器。至于混进新文化运动队伍里的买办资产阶级文人胡适，更完全是为了投革命之机，才写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说来说去，只是在形式上兜圈子。

至于创作，那就更寥落。胡适自己曾经作过一番“尝试”，写了不少白话诗，其中一首写道：

“黄油面包颇新鲜，家乡茶叶不废钱，吃饱喝胀活神仙，唱个‘蝴蝶儿上天’！”

难道这就是“文学革命”？

曾深刻地总结过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鲁迅，当然不相信《新青年》宣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能够救中国，也不相信仅仅从形式上进行改良的“文学革命”能够彻底摧毁封建的旧文化和旧道德。在他看来，旧中国，犹如一间绝无窗户万难轰毁的铁屋子，里面熟睡着许多即将闷死的人们，少数人的呼唤，至多只能惊起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岂不徒然增加他们临终的苦痛？

可是，鲁迅也知道，自己见过的人物、事件，毕竟是有限的，决不能因为怀疑而陷于失望，甚至颓唐下去，更何况《新青年》把矛头对准封建文化和封建道德的大方向还是正确的……。

夏夜，蚊子嗡嗡地哼着，室内闷热异常，无法工作。鲁迅只好摇着蒲扇，坐在县馆院子里的大槐树下乘凉，从密叶缝里看着那一点一点的青天，心中思绪万千。当晚出的槐蚕冰冷地落在头颈上时，往往打断了鲁迅的思路。

县馆的客人是很少的。这时偶或来谈的，是鲁迅留学日本时的老朋友钱玄同。他正担任着《新青年》的编辑。多半是下午，他手提着一个大皮夹来访，在县馆吃了晚饭，每每谈至深夜才回去。

钱玄同来访的目的，是希望鲁迅能为《新青年》写点文章。用笔来战斗，是鲁迅蓄志已久的事。十多年前，在日本因筹办《新生》杂志未成，曾经使鲁迅感到十分寂寞。现在，《新青年》虽发表了不少慷慨激昂的文字，但反对者不多，赞同者寥寥，也显得颇为寂寞。为了批判封建旧道德旧文化，“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鲁迅终于答应了钱玄同的请求。

就在钱玄同约稿两个多月后，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鲁迅虽然还不可能立即理解十月革命的意义。

义，但是，这场他从未见闻过的无产阶级革命毕竟使他看到“新世纪的曙光”已经照进了中国这个黑暗的“铁屋子”。沉寂的心情顿然为之一振，他更加确信“希望是在于将来”。他开始以新的姿态进行战斗了。

一九一八年初，《新青年》进行了一次改组。鲁迅参加了商量《新青年》工作的讨论会，并在会上认识了李大钊。这时，李大钊已经发表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虽然他的理论，正如鲁迅后来所说，“未必精当”，但是在当时的思想界，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参加改组后的《新青年》编辑工作的，除了鲁迅、李大钊，还有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以及胡适等。以后杂志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鲁迅经常出席编辑会议，讨论各种问题。

在此同时，鲁迅开始酝酿创作。

这时，在十月革命的伟大影响下，中国已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夜。新的革命迫切需要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对主张复辟倒退、历来为反动派利用来愚弄和毒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孔孟之道发动猛烈的攻击。“打倒孔家店”，已成为历史的使命，时代的号召。

伟大的革命者，总是能够敏锐地抓住时代的脉搏，勇敢地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鲁迅深切地感到，要真正打倒孔家店，必须尖锐地指出它的残酷本质，使人们震聋发聩。

幼时翻过的《二十四孝图》又出现在鲁迅脑际。辛亥革命前后反动派一边尊孔一边杀人的景象又显现在鲁迅眼前。读史书时，鲁迅还曾见到过不少“易子而食”、“食肉寝皮”之类的记载。这种食肉吃人的野蛮现象，正是孔孟之道长期毒害、麻醉的必然结果。至于孔孟之道从精神上吃人的事例，则更加普遍……

多少个寂静的、春寒料峭的夜晚逝去了，鲁迅的酝酿成熟了，创作开始了。

一九一八年四月二日，鲁迅终于完成了他的、也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篇战斗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小说通过一个被孔孟之道逼疯了的“狂人”之口，发出了英勇的反封建的战斗呐喊。“狂人”，实际上是一个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形象。正因为他觉醒了，所以能够深刻地看透封建社会的本质：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真是一针见血。

中国，就是“四千年来时吃人的地方”。封建统治者象小说里的赵贵翁、古久先生以及“狂人”的大哥那样，从肉体上、精神上，吞噬着千千万万的人民。所谓“礼教”、“仁义道德”，无一不是给封建统治者的“吃人”造舆论，找根据的！

识破了孔孟之道的“吃人”本相，“狂人”便向封建社会提出了怀疑和挑战：

“吃人的事，对么？”

“从来如此，便对么？”

“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尽管对于这“将来”是怎样的社会，怎样才能实现，鲁迅还十分渺茫，但是，由于他是“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所以，对封建制度及其精神支柱孔孟之道抨击之强烈，批判之深刻，远远超过这时一般反孔文章的水

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鲁迅希望新的一代能从孔孟之道的精神绳索中解放出来，再不要被吃，或去吃人，因此，他在小说最后深沉地写道：“救救孩子……”

一个月后，《狂人日记》最先署上“鲁迅”的笔名，出现于《新青年》杂志。

这是讨伐“孔家店”的一篇战斗檄文，这是反封建文化革命的第一声春雷。

《狂人日记》的发表，在思想文化界激起了巨大的反响。由于它内容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激动了许多进步青年的心。甚至连名噪一时的吴虞，也心悦诚服地承认，《狂人日记》把戴着礼教假面具的吃人黑幕完全揭破了，由此他还受到启发，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吃人和礼教》的文章。

从《狂人日记》开始，鲁迅“一发而不可收”，向着孔孟之道展开了持久的、勇猛的攻击，成为“打倒孔家店”的一员主将。

春雷响过，预示着一场新的暴风雨的来临。

一九一八年八月，鲁迅在写给老友许寿裳的信中，曾抑制不住地流露出革命高潮前夕的兴奋心情：“历观国内无一佳象，而仆则思想颇变迁，毫不悲观”。

但乌云还是那么浓重。孔孟之徒的反扑也越来越猖狂。当时，他们拚命以“官方”的名义，印发了一个又一个“褒扬节妇烈女条例”，妄图以此来“挽救”日益脱离孔孟之道的“世道人心”。在他们的欺骗和愚弄下，教育部收到从全国各地，甚至穷乡僻壤寄来的请求旌表具呈人母亲“节孝”等等的呈文越来越多，有的连文字都写不清楚，将“旌表”写成“旅表”。

甚至在教育部里面也刮起了这股荒唐的歪风。一天，部里一个姓甘的绍兴人也想给他母亲“请”旌节表，按规定，需要同乡官具结。所以竟跑来请求鲁迅，但当即遭到严厉拒绝。此人一

下子还未明白鲁迅的意思，又表白说：“这是我的母亲啊！”鲁迅的回答是：“正为此更不可盖印”。

在这种“表彰节烈”的迷雾下，全国各地，有多少妇女的生命和青春被封建礼教摧残了！鲁迅每天愤怒地注视着反动报纸上这类津津乐道的报道：海宁有个“唐烈妇”，在夫亡九十八天内，用各种方式自杀了九次，终于死去；上海有个十七岁的“陈烈女”，自己未见过面的未婚夫病死了，她立即“沐浴更衣”，服毒自杀，留言是“生虽未获见夫，歿或相从地下”……

鲁迅决不能容忍在二十世纪的今天，再让这种孔孟之道造成的悲剧在祖国大地上延续！一九一八年七月，他写下了论文《我之节烈观》，对孔孟之徒的“节烈”说教进行了系统的清算。通过细致而雄辩的论述，鲁迅得出结论，所谓“节烈”，是一种“畸形道德”，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文中，鲁迅又深入一层，对各种腐朽的社会道德“何以发生，何以通行，何以不生改革的缘故”，作了历史的剖析。他认为这是“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的结果，只有“那一班‘业儒’的才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他们为什么要提倡？完全是为了建立一种足以巩固反动统治的社会秩序：“皇帝要臣于尽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节”。

“时候已是二十世纪了；人类眼前，早已闪出曙光”，鲁迅写道，在这样的時候，再有“节烈”迷雾的弥漫，是“最可寒心”的。因此，他在文末大声呼吁：“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

这样痛快淋漓的文章的发表，立即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使鲁迅感到了战斗的喜悦。他于是象个一上阵就连打胜仗的战士，斗志昂扬，锐不可当，摆开大战的阵势，全面地研究

并批判了孔孟之道在各个领域里、在各种类型的人物身上所犯下的罪行，深刻地剖析和狠狠地鞭笞了孔孟之徒在现代社会里的种种伪装和种种劣迹。

在写《我之节烈观》之后的短短几个月里，鲁迅接连在《新青年》新开辟的“随感录”专栏里，发表了十几篇随感录。他成了这个专栏最积极的作者，也成了一种独特的战斗形式——杂文的开创者。新文化运动的种种敌人，以顽固的孔孟之徒为中心，包括什么乱坛的“法师”，鬼话连篇的“神童”，提倡“天罡拳阴截腿”的“武士”，“才从私窝里跨出脚，便说‘中国道德第一’”的伪君子，无一不在鲁迅笔下显出原形。鲁迅与他们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白刃战，真是摧枯拉朽，所向披靡。

这年冬天，鲁迅又创作了小说《孔乙己》。这篇作品的主角孔乙己，是一个受孔孟之道毒害至死的可怜又可憎的穷知识分子。他成年穿着长衫，满口“之乎者也”，一心想中举往上爬，但又偏偏连个秀才也没捞到。他不事生产，好吃懒做，不屑与穿短衣的劳动者为伍。结果穷愁潦倒，终于偷起东西来，最后被打折了腿，在人们的嘲笑声中，无声无息地死了。

孔孟之道是怎样地摧残了“读书人”的灵魂！科举制度是怎样地造成了这类畸形的怪物！然而，在封建制度下，这类人物又有多少多少！《孔乙己》就是以这样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无情嘲笑和尖锐批判，催促青年们起来扫荡窒息人们灵魂的孔孟之道。

鲁迅这种击中要害的有力批判，大大地提高了新文化运动的战斗水平，因此也震慑了各色各样的封建老顽固。其间有一些反革命政治嗅觉比较灵敏的人，在十月革命前，他们看出胡适等人提倡新文学的主张，不过要求语言形式的改革，无伤封建内容的根本，所以摆出一副“不屑与辩”的姿态，声称“春鸟秋虫，听其

自鸣自止可耳”。但现在，他们很有点着慌了。于是，人们看到，拖着长辫子的北人教授辜鸿铭，同盟会叛徒刘师培，一心想死后在坟上竖一块“清处士”墓碑的遗老林琴南等复古分子，一古脑儿破门而出，向新文化运动开始了疯狂的攻击。特别是那个林琴南，他挖空心思地写了文言小说《荆生》和《妖梦》，假托北洋军阀的铁腕人物“伟丈夫”，把他所认为的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人痛打一顿，以发泄其仇恨心理。接着，他又发表致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公开信，叫嚣新文化运动是“覆孔孟铲伦常”，大逆不道。总之，他们给鲁迅等新文化战士安上的最大罪名是“破坏中国国粹”，而把保存以孔孟之道为中心的“国粹”引为己任。

与以前那些耳聋眼花、除了“子曰诗云”、“节女烈妇”外一无所知的腐儒相比，眼前的这批反对者要险恶得多。辜鸿铭懂得英文，周旋于驻京外国使节之间，在北大专讲西洋文学；林琴南虽不懂外文，却与合作者一起翻译过数量可观的外国文学作品，在不少人眼中，他们是“深知外情”、“谙悉世界潮流”的人物。而刘师培，则因参加过同盟会，在社会上还有一定的欺骗性。由这么一帮子人来宣扬“中国道德”、“东方文明”、“保存国粹”，迷惑力自然较大。而且他们的复辟活动，早就得到后台帝国主义的支持。从美帝国主义分子李佳白到老沙皇文化特务盖沙令，都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同中国的复古分子勾结一起，到处宣传孔孟之道，组织孔教会。因此，新文化运动面临着一场严重的战斗。

一九一八年春天，钱玄同、刘半农经过苦心设计，在《新青年》上发表过“双簧信”。先由钱玄同用“王敬轩”的名字，模拟一个封建老顽固的口吻，集中了当时“保存国粹”论的种种反动观点，写信给编辑部，对新文化运动进行攻击和污蔑。然后再由刘半农出面，写了一封《复王敬轩书》的公开信，淋漓尽致地逐条加

以驳斥，以期引起一场争论。可是，当时在公开的敌人中间反应不大，反而遭来了还混迹于新文化运动内部的胡适的嘲笑，他认为钱、刘的这种作法太“浅薄”，“没有学者风度”。为此，他后来还准备把这两人排挤出编辑部。

但是，“国粹家”们毕竟遇到了最强劲的批判——鲁迅出阵了。

早已宣布过“中国国粹”“等于放屁”、“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的鲁迅，以他犀利的笔锋，直捣维护孔孟之道的“保存国粹”论：

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

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那么，“国粹”能否保存我们？鲁迅凭借历史经验指出，那些“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妄想折衷一世的中庸之徒，那些洒泪卫道而其实手巾上浸着辣椒水的伪君子，目的是要使中国人永远受孔孟之道的麻醉，最后“从‘世界人’中挤出”，远远落在历史车轮后面，以便他们任意宰割。鲁迅在批判封建复古派的同时，还根据殖民主义者为了加强其统治，总是同殖民地反动的酋长祭师们勾结一起，竭力利用当地落后的文化、风俗习惯愚弄人民的历史事实，揭露了帝国主义尊孔的阴谋，他深刻地指

出：“中国十三经二十五史，正是酋长祭师们一心崇奉的治国平天下的谱，此后凡与土人有交涉的‘西哲’，倘能人手一编，便助成了我们的‘东学西渐’。”这样的“东学西渐”，说穿了，就是帝国主义同中国的封建复古派勾结起来，结成反动的文化同盟，用孔孟之道禁锢中国人民的思想，使他们永远沦为侵略者的奴隶。因此，鲁迅号召，“从现代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生着“祖传老病”的中国才有转机。

这种对封建复古派及其后台帝国主义无可辩驳的批判，当然是林琴南之流所无法招架的。

鲁迅就是这样彻底粉碎了孔孟之道的种种伪装和保存孔孟之道的种种借口，以有声有色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迎接了新的革命风暴的到来。

一九一九年的春天，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

新年里，北洋军阀为了点缀太平，在各处衙门门口扎起了一座座红红绿绿的彩色牌楼，可是，经过风吹雨打日晒，已经破败不堪。

牌楼扎得再好看，也粉饰不了“太平”。

两个多月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中国有不少人，包括那些盲目排外的守旧复古分子，都异口同声吹捧美英法等帝国主义战胜德国帝国主义是什么“公理战胜了强权”，纷纷“向公理颂扬了一番，客气了一顿”。然而，鲁迅却清醒地认识到，战胜国和战败国一样，都是帝国主义，根本不能代表什么“公理”，他正担心这局面“将来如何收场”。

果然如鲁迅所担忧的，一月间，在战后帝国主义进行分赃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人民关于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废除卖国的“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竟然遭到拒绝。事实教育着人们进

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和北洋军阀的卖国嘴脸。长期积压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反帝反封建怒火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鲁迅也已强烈地感受到了跳动越来越急促的时代脉搏。

他觉得，当新的革命到来之前，很需要把旧的革命失败的教训总结出来，以期引起人们的警惕，不要走老路。因此，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即在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的十天之前，他写下了小说《药》。

故事是很简单的：开小茶馆的小商人华老栓，花钱买了一只蘸满革命烈士夏瑜（影射秋瑾）鲜血的馒头，给生了肺病的儿子当“药”吃。结果儿子的病不仅未见好转，反而愈加严重，终于悲惨地死去。

用人血馒头治病，固然表明华老栓受封建迷信毒害之深，但是造成华老栓悲剧的根源却在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他们没有也不敢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彻底地反帝反封建。所以，人民对这场革命很不理解。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悲剧场面：一边，革命者同封建统治者英勇地、但又是孤单地作战，一边，群众却麻木地说革命者“简直是发了疯”；一边，烈士流血牺牲，一边，不觉悟的群众却把蘸着烈士鲜血的馒头当“药”吃。这显然是对辛亥革命历史教训的艺术概括。

然而，鲁迅也不仅止于批判。历史在前进，革命在发展，群众不会永远处于不觉悟的状态。十月革命帮助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充满着信心和希望。在他们的带动和影响下，鲁迅也看到患有严重的“祖传老病”的祖国有了疗治的希望，因此，决心与这些“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自觉地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有意识地在小说中“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

的显出若干亮色”。《药》的结尾，鲁迅赋有深意地在烈士夏瑜的坟上，“添上一个花环”，表明毕竟有人并没有忘记牺牲了的革命者。花环，是革命后继有人象征；花环，是新的革命终究要来的预示；花环，寄托着鲁迅的理想和希望。

在创作小说《药》的同时，鲁迅又充满激情写了两篇歌颂十月革命的随感录《来了》和《圣武》，严正驳斥了封建顽固派对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诬蔑，揭露他们危言耸听的“过激主义来了”的叫嚷，不过是为了拒绝新的“主义”，顽抗革命洪流的冲击，让中国永远在孔孟之道的禁锢下，沉没于黑暗之中。这样他们就可得到“威福、子女、玉帛”，以满足“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这批顽固不化的孔孟之徒，除此而外还能有什么“主义”和“理想”呢！

鲁迅认为，十月革命之所以胜利，是因为俄国人民有新的主义。他期待着中国人民的心灵中也能打开接受新思想的大门。他写道：“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诚然，鲁迅当时对这种火光和声音的实质和意义还没有更多的了解，但是，他多么急切地盼望革命的火种在中国燃烧，期待新的主义的声音在中国激起反响啊！

为此，鲁迅觉得中国人民不应怕“过激主义”的到来，更不要相信反动派的欺骗和恐吓，而应该象取得革命胜利的俄国人民那样：

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用骨肉碰钝敌人的锋刃，用血液浇灭敌人的火焰，当鲁迅发出这个坚定、勇敢的声音时，中国黑暗的天空真的出现了“曙光”，他日夜向往的一场新的革命来到了！

一九一九年四月三十日，开了三个多月的“巴黎和会”，在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的把持下，悍然通过日本侵占我国领土山东权益的决议，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和北洋军阀的屈膝投降进一步教育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发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怒吼。

五月四日，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这一天下午，北京十三所学校，三千多名学生，集会于天安门前。“取消二十一条！”“争回青岛方罢休！”“拒绝和约签字！”“外争国权，内惩国贼！”革命的口号声响彻古老的北京城。

学生们群情激愤，一致要求严惩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大会之后，组织了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火烧了曹汝霖的巢穴赵家楼，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

鲁迅对青年学生的革命行动非常关心。当天下午，有的学生参加了示威游行后，即去访问鲁迅。他们一进门，鲁迅就关切地问起当天游行的情况。

这场运动，很快以与鲁迅经历过、描写过的辛亥革命完全不同的方式和规模展开了。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只是一个开端，接着就掀起了全国的斗争风暴。各地学生纷纷宣布罢课，积极声援。六月三日以后，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上海，爆发了数十万工人大罢工和示威游行。自此，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了运动的领导者和主力军。

五四运动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它是在十月革命号召之下，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

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化新军,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团结同盟军,向着封建文化的中心堡垒——孔家店,展开了英勇的进攻。中国革命自此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

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毛泽东同志在湖南主编了著名的革命刊物《湘江评论》,发表了震动全国的《民众之大联合》,创办了“文化书社”,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进行这些革命活动时,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中国人民应当仿效十月革命的方法,实行中国的民众大联合;要唤起人民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首先必须打破孔孟之道的思想统治,只有在“打倒孔家店”的斗争中,才能进一步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同志这一系列光辉的革命理论和实践,代表了“五四”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正确路线和方向。

当时的鲁迅,虽然还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但是,由于他自觉地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把批判孔孟之道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所以,他就能坚定地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站在一起,并肩作战,和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和方向取同一步调。

在“五四”高潮中,《新青年》杂志的“马克思研究专号”出版了。在这本刊登着许多篇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文章的刊物上,同时发表了鲁迅的小说《药》和随感录《来了》、《圣武》等。鲁迅这些写于“五四”前夕,发表于“五四”高潮中的战斗作品,既为五四运动作了舆论准备,又体现了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

五四运动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发生如此强大的威力,是因为它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这一点,当时的鲁迅还不可能深刻地认识到。但是,作为一个站在斗争前列的革命者,鲁

迅已开始感受到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运动中所显示的巨大力量，这是其他许多当时还置身于运动之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不能比拟的。

于是，在鲁迅的创作中，立即出现了歌颂劳动人民优秀品质这样一个崭新的主题。塑造人力车工人高大形象的短篇小说《一件小事》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事情确实很小：人力车夫撞倒了一个贫苦的老妇人。坐在车上的“我”——一个知识分子，认为这妇人是“装腔作势”，并没有摔坏，叫车夫不要多事，免得“自讨苦吃”，还要误了“我”的路。但是，车夫毫不理会“我”的“劝告”，立即停下来，关切地扶起了老妇人……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同样一件事，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人力车工人的崇高品质，给了“我”极大教育：“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描写人力车夫的作品，“五四”时代屡见不鲜。胡适为了赶时髦，还标榜所谓“人力车夫派”。然而他们的作品，完全摆着一副贵族老爷悲天悯人的架势，浸透了虚伪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只有鲁迅的《一件小事》，才真正衷心赞美了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吐露出一个迫切要求跟随时代前进的革命知识分子愿意向

劳动人民学习的真诚心情。

用不了多少年，鲁迅将会进一步发现，这些在自己眼前“愈走愈大”的劳动人民，正是改造中国社会的阶级力量。这时，他还没有获得这样的认识，但决心向劳动人民学习的心情，毕竟是他最终获得这种认识的思想基础。

当时，激烈的实际战斗早已使他对尼采的“超人”哲学“太觉渺茫”；他的思想，已远远不是进化论所能概括的了。不过他的历史观还没有从根本上脱离进化论。他认为：“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然而社会的现实是，封建势力总是以孔孟之道力图扼杀和阻碍新思想、新事物的成长和发展，这就促使鲁迅挺身而出，投入“打倒孔家店”的革命洪流。可是，正因为他的战斗已体现着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体现着人民群众彻底反帝反封建的要求，那么，进化论的社会发展观与现实斗争的矛盾，以及作为这个矛盾的反映的内在思想矛盾，也就越来越激烈。鲁迅不是回避，而是正视这个思想矛盾，并且努力解决着这个矛盾。

与其他许多昙花一现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截然不同，五四运动对于鲁迅，不是顶点，而是继续革命的伟大起点。他不以自己曾在“五四”高潮期发出过响亮的呐喊为满足，他要求在新的征途上发出更响亮的声音。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给他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就他的思想发展来说，从此，他踏上了在斗争实践中一步步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漫长的艰苦奋斗的道路。

新的斗争风浪，新的分化和聚合在等待着鲁迅。

第六章 在大分化中前进(一)

——揭露“假洋鬼子”

“六·三”以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浪潮，迅速向纵深发展。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一面努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一面深入工人农民当中，组织和发动工农革命。全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

革命的发展吓坏了大资产阶级。他们仿佛看到一个强大掘墓人紧跟在自己的身后。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最先预感到本阶级的厄运。胡适自己就说，他实在“看不过、忍不住”了，于是接连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新思潮的意义》一类文章，疯狂攻击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是“阿猫阿狗的事”。同时便提出“一点一滴的改良”的反动实用主义主张，反对对旧中国作“根本改造”，反对人民大众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胡适的公开挑战，标志着参加五四运动的资产阶级右翼，在革命深入发展的面前，已经公开站到了反动势力一边。由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所组成的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已经发生分化。

奔腾的历史潮流，就象大浪淘沙，把各种人物的面貌区分得清清楚楚。

——在急剧的分化面前，《新潮》社的主要成员傅斯年、罗家

伦，步胡适的后尘，掉转枪口，公开攻击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背叛了革命；

——在急剧的分化面前，号称“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一头栽倒在烟榻上抽起鸦片烟来，由颓唐而销声匿迹；

——在急剧的分化面前，曾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打过几仗的刘半农和钱玄同，表现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五四”高潮刚过去，一个开了小差，跑到外国“镀金”，一个钻进了故纸堆，逃离了战斗。

在急剧的分化面前，鲁迅只见同一战线中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落荒，感到一种身在古战场的寂寞。新的战友在哪里？

但是，虽然寂寞，还要战斗。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他发表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同时又连续发表了不少《随感录》，继续批判孔孟之道。在那些曾受过青年崇敬的“导师”们背离进步青年的时刻，鲁迅却决心继续“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宽阔光明的地方”在何处，鲁迅在当时是无法回答的。共产主义理想他还不甚了然。但他总觉得，既然反动派一再反对这种学说，那一定对摧毁旧社会“黑暗的闸门”有效吧？

正在这时，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六日下午，鲁迅到北京大学去，在大学的出版部收到了陈望道寄来的一封信和他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著作《共产党宣言》。这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陈望道在信中说，在五四运动中，他受了鲁迅很大的影响。他特别记得，正当反动当局极端仇视革命学说，把种种新思潮都当作毒蛇的时候，鲁迅却针锋相对地提出，反动当局越是把新思潮当作毒蛇，这种“毒”应该越重越好。鲁迅对革命理论的热情支持给陈望道很深的教育和很大的鼓舞，现在他以崇敬的心情

把译本寄给鲁迅，并请鲁迅对译文多加指正。

读完了书，鲁迅兴奋地称赞道：“这个工作做得好！”并且说：“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

不久，鲁迅把重新出版的《域外小说集》寄了一本给陈望道，感谢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

事情是那么明显：资产阶级右翼因害怕和拒绝马列主义背离了革命，而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鲁迅却随着革命的发展日渐接近了马列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分化的焦点已越来越清楚了。如果说，至此斗争还刚刚拉开序幕，那么，围绕着是不是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围绕着接受还是反对马列主义这个焦点，分化和斗争必将日趋激烈。

果然如此。没有多久，这场斗争在《新青年》这块阵地上展开了。

“五四”以后，在马克思主义开始广泛传播的形势下，《新青年》上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文章也日益增多。据统计，从一九一九年下半年到一九二一年上半年，《新青年》上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关于苏联的研究和中国工人运动的论文及通讯等共有一百三十余篇。这个杂志，已逐步成了共产主义宣传的重要阵地之一。

这种发展，当然是与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根本对立的。已经站到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反面的胡适，又一次“看不过，忍不住”了。不久前，他挑起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妄想一手挡住马克思主义的洪流，现在，他却以《新青年》编辑的身份，在《新青年》内部搞分裂。一九二〇年底，他先写信给陈独秀，要求《新青年》“声明”“不谈政治”。接着，又写信给李大钊、鲁迅等人，攻击《新青年》“差不多成了 Soviet Russia（即《苏俄》，当时在美国出版的一种进步刊物）的汉译本”，提出要《新青年》“改变内容”，“不

谈政治”。胡适甚至扬言，如果不这样做，《新青年》就必须“停办”。

胡适的信在北京的编辑人员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人来信往，争议不休。有的主张停办，有的主张公开分裂，有的主张改变色彩，也有的反对胡适的主张。他们各以自己的不同语言，表达了各种代表人物对待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发展的不同态度。

接到胡适的信，鲁迅特别警惕。打过几年的交道，鲁迅深知胡适的为人。鲁迅跟朋友说过，如果把胡适比作一个仓库，里面明明放着刀枪剑戟，他偏要在仓库的门上贴上一张纸条，写着“内无武器，请勿疑虑”的字样，使人放松警惕，猝不及防。现在，这封满口“不谈政治”的信里又藏着什么武器呢？

鲁迅对《新青年》发表的文章和作品，做了一个总的分析。它所发表的政治论文和作品，尤其是近来宣传新思潮的作品，大多是长期受压抑的中国人民要说的话，只有反动官场对它才感到头痛。这样的“政治”不谈，岂不是明明向反动当局投降、讨好？鲁迅决不允许胡适的阴谋得逞。于是，他拿起笔来，干干净净地写了一封短信：

对当局，“不愿示人以弱”。

“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

还不是马列主义者的鲁迅之所以能如此痛恨胡适之流反对谈政治、反对宣传新思潮的行径，是因为他深知他们倒退、复辟的主张会把中国社会引进到一个什么样的境地。因此，就在与胡适等人斗争的同时，鲁迅还发表了好几篇小说，用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农村图景，向人们展示了倒退复辟是怎么回事。这些发人深思的作品，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用新思潮唤起人们觉醒、进行一次新的社会革命的必要。

一九二〇年九月，鲁迅发表了短篇小说《风波》。这篇小说以一九一七年封建顽固派张勋扶植清废帝溥仪复辟为背景，指出辛亥革命没有从根本上打击封建统治阶级，农民丝毫没有改变原来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农村表面上的风平浪静，“无思无虑”，却隐藏着复辟的危险——

正是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一阵政治阴风从北京刮到偏僻的城镇，又由城镇刮到农村：“皇帝坐了龙庭”了。于是，在辛亥革命后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的地主豪绅顿时又活跃起来，象作品中的赵七爷，就兴冲冲地放下了象征封建老根的辫子，穿起轻易不穿的宝蓝色竹布长衫，神气活现地东跑西窜。他时而用“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威胁，欲置农民于死地；时而两手捏起空拳，仿佛握着无形的蛇矛向别人刺去，露出了反动复辟狂的凶残面貌。鲁迅通过这个反面典型说明，如果反动阶级没有被摧毁，农民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一有风吹草动，这样的封建顽固势力，便要继续欺骗群众，愚弄群众，实行封建复辟。这不正是现实斗争的一面镜子吗？

一九二一年五月，鲁迅发表了又一篇小说《故乡》。小说描写的是经历过辛亥革命风风雨雨后的乡村。但是，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却是一幅农村经济日益破败，农民生活日益穷困的图画。身受封建统治阶级长期压迫和剥削的贫苦农民，革命以后，仍旧受尽了“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苦。小说的主人公闰土，在童年时代原是一个生着紫色的圆脸、颈上套着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手里拿着钢叉的农村“小英雄”。经过长期的折磨，只见他灰黄的脸上布满了很深的皱纹，手裂得象松树皮，头上戴一顶破毡帽，身上只穿着一件极薄的棉衣，因为抵抗不住寒冷，浑身抖索着。问问他的景况，他只是摇头，呐呐地说：“非常难。……”然后只管默默地吸烟，让痛苦在内心煎熬。这样的“故乡”，不又正

是那个时期的中国广大农村的缩影吗？不改革，不前进，怎么行呢？

但是，鲁迅是遵循无产阶级革命前驱的“将令”的，鲁迅也相信“将来”必胜于“现在”，因此在《故乡》的最后又出现了一个颇为乐观的结尾。“我”的眼前展现出了一片美丽的图景，而且认为“希望”虽然还有点“茫远”，但“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种毫不怀疑能以披荆斩棘的努力争取到美好将来的坚定信念，产生于大分化时期，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因此，发表这样的小说，就有力地批判了胡适等资产阶级右翼和各种反动封建势力的停滞、保守乃至倒退、复辟的论调，配合了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正当鲁迅在与胡适等人的斗争中欢呼新思潮的到来，在揭露和批判黑暗现实中憧憬着美好希望的时候，中国革命的真正希望终于出现在中国人民的眼前，它是那样辉煌和切实，以至远远超出当时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鲁迅所能预想的范围。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在上海创建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了。

鲁迅当时还没有同中国共产党发生直接的联系。但是，伟大的思想家总是善于体现时代的要求，并且在思想文化上反映出当前革命的重大问题，和无产阶级取同一步调。由于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革命政党，它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一点，敏锐的革命者鲁迅已从各个方面有所觉察。在这样的时刻，他感到需要在更深刻的意义上，继续总结过去革命的经验教训，给正在进行的革命提出新的问题。

这种思考和总结所得出的思想成果，已大大超过《药》、《风

波》、《故乡》这样的小说所能包含的容量。鲁迅已经迫切地需要通过较大篇幅的作品来系统发表意见了。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底的一个晚上，《晨报副刊》的一个编辑来看望鲁迅。在谈话中，编辑说，他们的报纸准备开辟一个“开心话”的专栏，希望鲁迅给他们写点东西。鲁迅决定利用这个机会，答应了，并开始准备。

这已经是严冬的季节。鲁迅在八道湾住的房间正好朝北，屋前又是通道，只有一个后窗，连好好的写字的地方也没有。他这时的生活又很不安定，有时在赶着翻译小说，校订文稿，有时要到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去讲课，来去奔波，简直很少有机会静下来坐一坐，想一想。

但是，就在这种环境下，鲁迅孜孜不倦地创作，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篇空前伟大的小说——《阿Q正传》。

一个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历史事件在未庄展开。未庄，这是中国一个普通的农村。那里有着一大批贫苦的农民，他们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靠出卖劳动力维持最低的生活。小说的主要人物流浪雇农阿Q，就过着十分穷困的生活。他没有家，没有土地，一个人住在土谷祠里，靠做短工、长工度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但结果，阿Q除了穿在身上的破夹袄和一条裤子以外，已经一无所有。未庄，还有一批寄生虫、吸血鬼——反动的地主阶级。以赵太爷、钱太爷、地保为代表的豪绅长期统治着贫苦的农民，对他们进行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阿Q因为说了一句他也姓赵的话，就被赵太爷打了一个嘴巴，又被地保敲了二百文酒钱。阿Q因为向女佣吴妈求爱，不仅身上被大竹杠打了几下，扣去了工钱，赔了香和红烛，还要请道士禳灾，费用由阿Q负担，地保又乘机敲去了四百文。一句话，地主

豪绅千方百计地要把农民身上的血汗榨取干净。

突然，辛亥革命开始了。革命党进了城，举人老爷、赵太爷、钱太爷都慌了手脚。丁举人逃到乡下避难，赵太爷见了阿Q也喊起“老Q”来，赵白眼对“Q哥”则称起“穷朋友”来了。

革命唤起了农民的翻身激情，阿Q见到未庄“一伙鸟男女”慌张的神情，也激发起了朦胧的革命要求，对革命有些“神往”了。极端贫困的经济地位毕竟要比他历来使用的“精神胜利法”的作用有力得多，现实得多。因此，阿Q不禁大声地嚷道：“造反了！造反了！”表达了长期受着压榨的贫苦农民的革命愿望。

可是，阿Q无论如何没有料到，正当他做着好梦的时候，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早已抛弃了农民。地主豪绅也盘起了辫子，用洋钱买了一块“自由党”的银桃子挂在衣襟上，变成了“革命党”。所以，真正的革命党没有到农村来，倒是赵太爷勾结起假洋鬼子到静修庵去“革”掉一块龙牌，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暴还未来到未庄就烟消云散了。

阿Q当然很不满足。他跑到城里想去投奔革命党，但城里并没有革命党来收容他。那里的情况也同以前一样没有什么变化，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举人老爷做了民政帮办，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把总。投来投去，阿Q还是碰上了自己的死对头——假洋鬼子。阿Q还没有来得及说出“我要投……”的时候，假洋鬼子已经扬起“哭丧棒”，吆喝着“滚出去！”不准“革命”！

阿Q的结局是十分悲惨的。革命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利益，他倒成了这场流产的革命的牺牲品。革命果实既已被地主豪绅、假洋鬼子篡夺了，他们就要反过来镇压人民。于是，阿Q终于被挂着“革命党”牌子的“长衫人物”平白无故地当作强盗拉去枪毙了，阿Q至死也没有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多么深刻的历史悲剧，这是多么沉痛的历史教训！

通过《阿Q正传》，鲁迅深刻地揭示出，由于资产阶级跟封建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动摇封建制度的基础。因此，他们虽然赶走了封建皇帝，作了某些改革，但是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亿万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从而也不能使中国从黑暗的深渊中解放出来。《阿Q正传》正是通过对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的批判，揭示出了一个历史的结论：资产阶级再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了。在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能够得出这样一个历史结论，在政治上、思想上有着显而易见的重要意义。

通过《阿Q正传》，鲁迅揭示了民主革命中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根本之点即在于没有解决农民问题，没有一个农村社会关系的大变动，没有摧毁封建主义的社会基础。认识这一点，对新的革命运动自然是至关重要的。

小说所刻划的“假洋鬼子”形象，也有着十分深刻的教育意义。

在鲁迅的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这种带有买办性质、从害怕革命到投机革命进而又破坏革命的反面典型，标志着鲁迅对资产阶级右翼破坏革命的危险性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这个典型，深刻地概括了买办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通过它，鲁迅揭示了一个重要的规律：在一切革命运动中，总有一些“假洋鬼子”要混进革命队伍来破坏革命。因此，谨防“假洋鬼子”，便是鲁迅对未来革命的重要忠告。

《阿Q正传》象照妖镜一样照出了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各种人物的原形。“开心话”一点也不开心了。官僚幕客、绅士淑女暴跳如雷，有的骂作者揭了他的疮疤，有的骂作者揭了他的隐私。这表明，他们都在鲁迅的解剖刀面前发抖了！

《阿Q正传》的发表，正迎来了革命的洪流。一九二二年初，

香港海员大罢工开始。同年九月十四日，安源煤矿一万七千多工人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举行了震撼全国的大罢工，中国工人运动迅速进入高潮。鲁迅所关切的农民运动也蓬勃兴起。历史告诉人们，无论是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枪炮和屠刀，还是形形色色的“假洋鬼子”的破坏，都改变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一九二二年底，鲁迅把一九一八年以来创作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十余篇小说编成一本集子，题名《呐喊》。“呐喊”二字，形象地概括了鲁迅在这个时期的战斗风貌。而以此命名的整本小说集，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第一个最丰硕的文学成果，它既成功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又充分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的方向。

第七章 在大分化中前进(二)

——击退封建复古主义逆流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革命新形势，不仅激励鲁迅写出了《阿Q正传》这样光辉的作品，而且使整个新文学运动也出现了一派新气象。

一九二一年刚刚过去，北京街头积雪还未消融，寒风仍然呼呼地吹着。可是，长安街一带书铺里却是热气腾腾，书架上放满了新出的书籍。那里有《共产党宣言》、《列宁传》、《俄国革命纪实》等；玻璃柜里陈列着《向导》、《前驱》、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编的《小说月报》、创造社编的《创造季刊》等新出的政治、文艺刊物。这些新出的书刊，把大批进步青年紧紧地吸引住了，他们是多么热切地希望从那里得到新的思想，听到新的声音，看到新的世界啊！

在蓬勃发展的新文化运动面前，反动势力又一次反扑过来了。不久，市面上出现一种杂志，白色的封皮上印着两个黑黑的大字：“学衡”。打开封面，便是一幅道貌岸然的孔老二全身像，翻过来又是一幅苏格拉底的头像。这两幅图像犹如商标，说明了这本杂志的全盘货色。里头文章全是文言文写的，有什么《评提倡新文化者》呀，《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呀，单看题目也就可以知道矛头是对着谁了。

《学衡》是由南京东南大学的教师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人

创办的。这些人大多是美国留学生，一出马便吹嘘自己一伙“留学国外”，“略知世界文学潮流”，摆出一副博古通今、学兼中外的“权威”架势，狂妄地声称他们要“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要来“衡量”中国文化思想界。但实际上，他们几乎反对“五四”以来的任何一点改革，任何一种进步，叫嚣文学不应当随时代而进化，白话不能代替文言，言文不能合一；攻击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国情；污蔑学生爱国运动使“神圣学校”沦为“万恶之府”……很显然，这些穿西装的卫道者们，只是企图以资产阶级的“新知”来维护封建主义的“国粹”，以对抗马克思主义思潮。这种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复古逆流的公开出现，是党成立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学衡》一出笼，鲁迅就清醒地看出，这些自我标榜为“融化新知”的遗老遗少，其实对新、旧学问都是一窍不通，他们比林琴南也远远不如。在《学衡》中，这批“学问家”竟杜撰出“造乌托之邦，作无病之呻”一类“中西合璧”的“佳句”，生造出“覆巢之下无完家”那样荒唐的“成语”，发出“侷者，新鬼而膏虎牙者也”那样迂腐透顶的谬论，甚至连文章的题目也不通。看来，封建卫道者们真是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了。

鲁迅很想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对这批不学无术的反动派横扫一下。二月四日，他在《晨报副刊》上看到一篇评论文章，竟然和“学衡”派大谈什么学理，感到大可不必。他认为所谓“学衡”派，无非是一些“假古董”，他们宣称要“衡”人家，可是自己的“称星”并未钉好，因此对于他们“决用不着较准，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

二月九日，鲁迅借此由头，也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估〈学衡〉》的文章，就以《学衡》创刊号为标本进行剖析。鲁迅

不屑去批判它的思想内容，而是运用自己丰富的古文知识，列举并分析了这些文言文中文理荒唐、逻辑混乱、词句不通、文不对题等弊病、笑话，进行了辛辣而尖锐的抨击，并说道：“诸公诘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鲁迅最后讽刺道：“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

《学衡》经鲁迅这么一“估”，终于原形毕露，出尽洋相，一蹶不振了。这场巧妙的“速决战”，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当时思想文化战线上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

《学衡》仅是封建复古主义逆流中的最初浪头，紧接而来的是一股更为凶恶的黑浪。

掀动这股黑浪的是曾以“新文学创造者”自诩的胡适。他眼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日益高涨，一方面公开发表《国际的中国》等反动政治论文，猖狂地反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诬蔑它是“很幼稚的，很奇怪的议论”，另一方面又想把进步青年从反帝反封建的战线上拉进封建旧文化的巢穴中去。于是，一九二二年十月，他创办了《读书杂志》，一九二三年一月，又创办了《国学季刊》。他戴着“学者”面具，捐出“学术”招牌，装出“关心青年”的样子，发起了所谓“整理国故”运动。他危言耸听地说什么“古学要沦亡”了，要青年走进研究室，从事“整理国故”的工作，“少说点空话，多读点好书”。三月间，他又为清华大学学生拟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开了包括孔孟之道、甚至佛经在内的近二百部古书，要青年们“下死功夫笨干”，说这就是做学问的“法门”。这些赤裸裸的倒退言行，使他的面目暴露得更彻底了。胡适这么一吆喝，梁启超等遗老遗少便急不可耐地跑出来推波助澜，相继开了一批又一批书

目，要青年们把《论语》《孟子》等“熟读成诵”。一时间乌烟瘴气，把不少的年青人搞得晕头转向。

看，为了对付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他们竟然也煞费苦心地搞起了这么一个不大不小的“运动”。这意味着一个新的战斗又展开了。鲁迅当然应战。

但就在这战斗的当口上，一九二三年十月，鲁迅少年时就得的肺病发作了，每天发烧。年底，身体稍为好了一些。一过年，他立即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发表了《未有天才之前》的演讲，猛烈抨击了“整理国故”的谬论。他明确地告诉青年们：

“整理国故”不过是“拾出祖宗来说法”的倒行逆施行为；

“整理国故”不过是一种妄图抵制“新思潮”的勾当；

因此，“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

话不多，却向青年们揭穿了“整理国故”的反动性。为了使青年免上以“导师”自诩的胡适等人的当，鲁迅又谆谆地鼓励他们：不要害怕有人讥笑“幼稚”，“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独有老衰和腐败，倒是无药可救的事！”

最后鲁迅用简洁的语言对青年们提出一个希望：要“收纳新潮，脱离旧套”，勇往直前！

鲁迅还结合教学工作进行战斗。这时他除了原兼北大、北师大讲师外，又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的讲师，主要讲中国小说史。鲁迅看到胡适打着“整理国故”的旗号，而实际上却在歪曲和糟蹋祖国的文化遗产，尤其是他的所谓小说考证，纯粹是推销他“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反动主张的黑标本。因此鲁迅配合讲课编写了《中国小说史略》，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进一步批判胡适一伙。

这期间，鲁迅由于和二弟周作人在思想上和生活道路上的

重大分歧，从八道湾十一号搬到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居住。这是一所朝北的四合院，鲁迅只占用三间小房子，十分拥挤。编写《中国小说史略》要用的材料很多，连中间吃饭的房子也堆满了线装书。历来的中国封建文人是把经、史、子、集奉为正统的，鲁迅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对他们视为“闲书”的小说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在编写中，鲁迅彻底唾弃胡适派从实用主义观点出发的烦琐考据，唾弃他们“持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以炫耀人目”的做法。他所用的材料都是“通行之本，易得之书”。他不作材料的堆砌，而注重内容的分析，对中国古代小说做了全面的科学的评价，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小说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从而粉碎了胡适利用小说考证来咒骂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阴谋。这部著作的上、下卷分别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和一九二四年六月出版。

鲁迅在大学里开的这门“中国小说史”课，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欢迎。其他系科的学生以至校外的人，也都争先恐后地赶来听课，座位没有了，连窗台都挤满了人；用水帘单面纸印的讲义，常常供不应求，没有拿到的，就认真地记笔记。鲁迅在课堂上雄辩地批驳着“整理国故”派所散布的种种谬论邪说，常常以幽默的语调借古喻今，出其不意地给复古主义者以致命一击。

就这样，鲁迅高举反复古的大旗，把广大进步青年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砖塔胡同的房子实在过于狭小了，因此，鲁迅于一九二四年五月，搬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这是一座不大然而却很幽静的四合院。院子里种着白色的丁香花。在三间并不高大的北屋后面搭出一间平顶的灰棚，这在北京叫做“老虎尾巴”。这间被鲁迅自己戏称为“绿林书屋”的房间，就是他的“战壕”。

这个“战壕”不过一丈见方。鲁迅素来俭朴，他认为“生活太

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因此房间的陈设也十分简单，东壁下放着一张普通的三屉长桌和一张旧藤椅，西壁下放一张茶几和两张木椅，北面一排都是玻璃窗，从这里可以望见栽在小院落里的青杨、刺梅、碧桃、花椒，以及挺立在墙外的两棵枣树。一张用两条长凳几块木板搭成的床铺就放在这窗子底下。床上铺的是旧棉胎，即使是寒冷的冬天也只有两床薄薄的棉被。床底下放着一只陈旧的竹网篮，这是鲁迅为应付反动势力迫害，以便随时出走而备下的。

西三条胡同是一个荒凉的地方，住在这里的大都是一些拉车的和靠手艺吃饭的穷苦人。因为地处偏僻，一到晚上几乎就没有人走了。但自从鲁迅住到这里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那在风雨中摇晃的街灯，常常照着一帮帮来访的年青人走进鲁迅的家；他们充满朝气的笑语喧哗，每每打破了黑夜的寂静。来的人很多，地方又很小，通常是早到的一批先走，让后来的人谈话。鲁迅很热爱青年，一见他们来到，立即端出糖果点心，热情招待，往往一谈就是几个钟头。青年们大多是怀着急切的心情登门求助的：有的征求对文章的意见，有的要求帮助选编作品，有的要他接洽出版事宜，更多的是希望他指示前进的道路。鲁迅常是抽着香烟，倚在藤椅的扶手上微微地笑着，耐心地听着他们的诉说，尽可能满足他们的种种要求。夜深了，人走了，鲁迅重新泡上一杯浓茶，点燃一支香烟，靠在藤椅上稍稍休息一下，就开始工作。在一片浓黑的夜雾里，“老虎尾巴”里的一星灯火，显得格外明亮。

“老虎尾巴”里春意盎然，“老虎尾巴”外风云变幻。一九二四年一开始，南方就不断传来令人兴奋的消息。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以三大政策为基础的新三民主义，改组了国民党，并积极从

事北伐准备、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促使了革命运动重新走向高潮。这种蓬蓬勃勃的革命形势，使鲁迅十分振奋，但他也清醒地估计到，旧势力还一定会反扑，“压制和黑暗还要增加”，他时刻准备着“对旧思想和旧习惯加以明白的攻击”。

不出所料。这年夏天，鲁迅应邀到西安去讲了一次学，回来后不久，就听到广州发生了反对孙中山的商团叛乱事件。紧接着，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奉系军阀撵走了直系，取得了北京政权，和皖系军阀联合了起来，段祺瑞粉墨登场，爬上了“临时执政”的宝座。虎去狼来，北京的政治空气更加污浊。

在“老虎尾巴”里，鲁迅度过了许多不眠的夜晚，窗外是一片漆黑，深秋的夜空显得格外高，墙外两株枣树的叶子也已落尽，树干铁似的默默地直刺着高空，……环境是黑暗的，但他绝不悲观，相信“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将来’这回事，虽然不能知道情形怎样，但有是一定会有的，就是一定会到来的”。鲁迅决心在文化领域里做更多的工作，催促这“将来”更快地到来。

十一月十七日，鲁迅和一些文化界人士发起成立“语丝社”，创办《语丝》周刊。鲁迅为刊物定的宗旨是：“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这样的刊物出现在黑云压城的时刻，当然受到群众的欢迎，两千份一下子就卖完了。

照例，马上有人来唱对台戏。不到一个月，北京街头又出现一种杂志，名字叫做《现代评论》，主要编辑成员除胡适外，还有徐志摩、陈西滢，他们都是欧美留学生，是拿了北洋军阀的津贴办起这个杂志来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利益已使他们与一切新老反动派的命运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因此，他们在刊物中就公开支持刚刚上台的段祺瑞政府，疯狂反对共产党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

《现代评论》既然明目张胆地支持了封建军阀，封建文人得到了帮手，所以被鲁迅严厉驳斥过的封建复古主义妖风也越刮越猛。他们似乎也在总结着教训。两年前胡适不是开了二百来部“国学书目”给青年吗？大概是数目太大，青年即使上当也难以实行，收效甚少；因此，他们这次在数量上来了个大收缩，一九二五年新春，《京报副刊》公开征求“青年必读书十部”。于是，一些所谓“名流”“学者”象苍蝇一样“嗡”了起来，胡适、徐志摩、梁启超等都争先恐后地开出书单。万变不离其宗，《论语》、《孟子》之类始终是在“必读”之列。

《京报副刊》还在一篇一篇地发表“学者”们给青年开的书目。二月间，这个报纸也给鲁迅寄来一张征求必读书的表格。鲁迅在表格上仅仅写上十四个字：

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短短一句话，显得多么与“众”不同！它鲜明地体现了鲁迅反逆流的坚决态度。但既然那些人的书目都是开给青年的，这倒使鲁迅很想给青年们讲几句话，因此，他又在“附注”栏里补充道：

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所谓“必读书”，“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因为它会使人“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

“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

鲁迅的意见在三月二十一日的《京报副刊》上发表了。文章很短，连正文加附注不到两百字，但却如一块石头投进古井，激起了巨大的反响。

许多青年来信表示热烈的赞同，但是一些穿西装的、穿军装

的、穿马褂的“豪杰之士”却寄来一封封恶毒的信加以谩骂。他们先给鲁迅戴上“学者”的纸冠，然后又说他“糟蹋了中国书”，叫嚷什么如果不读古书，就要变成外国人了。有一个警官学校的人虽然说不出什么道理，但却也大打官腔，骂鲁迅是“卖国贼”。

鲁迅把这一大捆署名的、匿名的谩骂信件往书架下一塞，立即反击。不尊孔就是卖国吗？鲁迅认为这完全是“不省人事之谈”。远的不说，单从元朝到清朝，就有大量的事实证明，真正的卖国贼就是那些孔孟之徒。非但如此，那些入侵者，为了要在中国站稳脚跟，也要求助于孔老二亡灵的。因此鲁迅在一篇文章中告诉人们，外国如果灭了中国，他们不会“劝你多读外国书”，而是“还要奖励你多读中国书，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十分精辟地揭示了孔孟之道不但是中国反动派用来麻痹人民的工具，而且是外国反动派用来侵略中国的武器。

斗争是如此激烈，而鲁迅却发现，《语丝》社内部思想并不统一，很难完全适应斗争的需要，因此他主张多组织一些“小周刊”，形成“联合战线”，来袭击那古老的坚固的堡垒。

一九二五年四月，鲁迅团结了一些文学青年创办了《莽原》周刊，为进步力量开辟了又一个“发言之地”。不久又成立了“未名社”，出版《未名丛刊》和《乌合丛书》，为青年人开创了翻译和创作的园地。

在《莽原》创刊号上，鲁迅发表了一篇题为《春末闲谈》的杂文。此文借用自然界中细腰蜂用毒汁麻痹小青虫，使之“不死不活”，以供今后食用的事例，说明反动派鼓吹复古、“进研究室主义”，实质上都是想用孔孟之道的“毒汁”麻痹人民以便任凭他们吞食，情形与细腰蜂很相类似。此后，鲁迅又一鼓作气连续写了《夏三虫》、《忽然想到（五至六）》、《灯下漫笔》、《杂感》、《导师》、《北京通讯》等锐利如匕首的杂文，对孔孟之道和“圣人”之徒进

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指出他们的全部功用在于“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青年们必须奋起“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去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时代！

在这些文章中，鲁迅还无情地撕下胡适之流“关心青年”的外衣，指出这些所谓教授名流，其实是一小撮吃了“人血”还要“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的“蚊子”，舐一点“油汗”还要“拉上一点蝇矢”的“苍蝇”。他再一次告诉青年们不要相信这些“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要自己“联合起来”，披荆斩棘向前走！

鲁迅以自己的战斗经验告诫青年，对旧势力斗争，不能讲“中庸”，一定要“蔑弃古训”，发扬敢说、敢骂、敢打的精神，只要是阻碍历史发展的，“无论是古是今，是人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总之，在这分化日趋急剧、复古倒退的反动势力日益猖獗的年月里，鲁迅的战斗也愈加有声有色。他的文章之多，威力之猛，对敌人营垒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于是，就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来“劝”鲁迅，叫他不要再写这些杂感了，应该象个“文豪”的样子，去搞“创作”。他们甚至说，没有多部的长篇创作，你怎么能进“艺术之宫”呢？鲁迅绝不上当，他公开宣布：并不愿意进什么“艺术之宫”，更不愿跟着那些文士们“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而宁愿“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

这是一个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不愿与反动派同流合污、决心革命到底的庄严战斗宣言。正是在这坚持不懈的战斗中，鲁迅以坚实的步伐前进着。

第八章 在大分化中前进(三)

——彷徨和求索

鲁迅在大分化中前进。这种前进，是时代决定的，又是通过他本人的思想矛盾运动实现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急剧分化，又一次地引起了鲁迅深沉的苦闷和思索。鲁迅后来把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五年内创作的小说编为一集，题名《彷徨》。在《彷徨》的扉页上，他引了屈原《离骚》中的诗句作为题词：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这两句诗，是鲁迅当时内心的写照。

《彷徨》和同期创作的散文诗集《野草》，以及这一时期数量繁多的杂文，一方面记录了鲁迅从大分化以来英勇战斗的光辉业绩，另一方面也深深地留下了大分化以来他在激烈的思想矛盾中稳步前进的脚印。人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个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找革命真理的迫切愿望和所走过的艰难而曲折的道路。

见过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破产、见过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鲁迅，如今，在狂飙迅雷般的五四运动高潮过去以后，他又亲眼目睹了右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叛变。政

治舞台上，“先前只许‘之乎者也’的名公捧角，现在却也准 ABC D 的‘文士’入场了”。封建顽固势力和右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结成反动同盟。鲁迅置身于这个反动同盟的中心北京，耳目所及，尽是腐败的政治和深重的灾难。走在街上，常见运煤灰的车子将煤灰堆在街头，日积月累，越堆越高，仿佛要把街旁的房子“活埋”了似的。这使他产生了一个联想：在政治思想领域里，从老顽固到洋“文士”，现在不也正竞相推出满“车”的孔孟之道等历史垃圾，妄想把广大人民群众完全“活埋”下去吗？

是谁被埋在社会的最底层？鲁迅忘不了广大贫苦农民。时刻牢记着贫苦农民的境遇，这使鲁迅在过去能深刻地总结辛亥革命的教训，在今天又能看透各种倒退行径的危害，坚持在分化中前进，在复古声浪中继续批孔。

一九二四年春节期间，鲁迅怀着极大的悲愤，度过不眠的长夜，写下了小说《祝福》。

《祝福》展现了一个穷苦的农村妇女祥林嫂的悲惨一生。祥林嫂在死了丈夫之后，逃跑出来，到鲁四老爷家做女工。鲁四老爷一面皱着眉头，讨厌她是个寡妇，一面又看到她手脚壮大，是个好劳动力，答应收下。不久，祥林嫂的婆家发现了她的踪迹，野蛮地把她绑了回去，进行逼嫁，卖到山坳里。后来，她的第二个丈夫又死了，唯一的儿子被狼衔去，夫家的大伯立刻赶她离屋，她只得单身出走，重新来到鲁四老爷家帮佣。从此，一连串更加惨痛的打击落到祥林嫂头上。鲁四老爷因她再嫁再寡，把她看作不祥之物，咒骂她“不干不净”，“败坏风俗”，严禁她沾手祭品。旁人又用阴间的锯刑恐吓她，要她到庙里捐一条门槛当替身“赎罪”，让千人踏，万人跨。她好不容易积下钱捐了门槛，没想到仍然不准“赎罪”——鲁四老爷照样不准她插手祭祀。祥林嫂再也无路可走了，她沦为乞丐，终于在地主们欢乐的爆竹轰

鸣声中，在鲁四老爷隆重筹备年终祭礼之际，悲惨地倒毙在雪地上。

祥林嫂就这样被吞噬了。封建宗法制度、孔孟伦理道德、鬼神迷信等等就是这样蹂躏着祥林嫂，一步步把她推向绝境！

《祝福》揭示出孔孟之道主要摧残的对象是祥林嫂这样的贫苦农民，这是这篇小说在思想意义上高出《孔乙己》等作品的地方。然而，究竟依靠什么社会力量才能掀翻压在千百万“祥林嫂”头上的统治？这一问题在鲁迅脑中盘旋着。

在“老虎尾巴”墙上挂着一副对联，那是鲁迅特地集了屈原《离骚》中的诗句，请人书写的：

望崦嵫而勿迫

恐鸩鴆之先鸣(注)

鲁迅在阅读和写作的间隙，抬头看到这副对联，二千多年前诗人一边徘徊一边吟咏、焦灼万分而又求索无路的情景，宛然如在目前。而当鲁迅把目光转移到案头，看到面前堆着的不少充满复古滥调的报刊时，一种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又涌上心头，他决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快“求索”的步伐，寻找明确的答案。

鲁迅对进化论越来越怀疑了，头脑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因素在不断增加。他早先常常用“上等人”、“下等

(注) 屈原《离骚》原句是：“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恐鸩鴆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羲和，神话中的人物，相传是给太阳驾车的。“弭节”，驻车的意思。“崦嵫”，神话中的山名，相传为日落之处。前句大意是：“我命令羲和慢点走，不要让太阳很快地迫近崦嵫山；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我要趁天黑之前上下四方进行求索。”“晏”，晚。“央”，尽。“鸩鴆”，即杜鹃鸟，常在初夏之时鸣叫，其时百花多已开过。后句大意是：“我的年纪还不太老，时间也还来得及；就是恐怕杜鹃鸟早早鸣叫起来，这样，春尽夏至，众芳皆歇，余下的时间就不多了。”

人”这两个不甚准确的概念来表述现实生活中的阶级对立和矛盾，以后，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深入，“阔人”和“穷人”、“治者”和“被治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等字眼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杂文和书信中。与此相适应，鲁迅原来把希望寄托在全体青年身上的信心也开始发生了动摇。且不说出国“镀金”的傅斯年、罗家伦之流也是青年，不久前，鲁迅刚就“青年必读书”问题发表了一点意见，短期内就收到了不少指责、谩骂的信件，其中有些显然出自知识青年的手笔。还有，鲁迅在女师大兼课时，发现该校某些学生不但不关心国家大事，连校内近在咫尺的风潮也无动于衷……看来，在青年中间也有倾向于“治者”、“压迫者”和“被治者”、“被压迫者”之分。大量的事实使鲁迅得出初步的结论：对青年不能“一概而论”，他们中间，有“醒着的”、“要前进的”，但也有“昏着的”、“躺着的”、“睡着的”。

在失望于那些“昏着”、“躺着”、“睡着”的青年之后，鲁迅以更加迫切的心情，瞩目于那些“要前进的”、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青年，希望通过他们的艰苦奋斗，唤醒群众，最终开创一个没有“太爷”、“老爷”之类统治的新局面。

鲁迅夜以继日，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他在“老虎尾巴”接待来访的青年，鼓励他们起来战斗；他给不少来信求教的青年写了许多回信，告诫他们同旧势力较量必须“锲而不舍”；他带领文学青年，创办有战斗力的文艺周刊，让他们为改造社会出力……

时光飞快地流驶。随着鲁迅和青年接触的增加，他的观察和“求索”较前更为深入，因而苦闷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是更为加重了。

鲁迅创办《莽原》周刊，目的是希望青年们勇敢地站出来向旧社会进行批评，“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寄来的不少仍是“花呀”、“爱呀”之类的稿件。鲁迅多次感叹地说：《莽原》“没有撒泼

文章”，“实在有些穿棉花鞋了”。穿着“棉花鞋”，怎么能够勇敢地冲锋陷阵呢？

总之，鲁迅一方面感到他身边的不少知识青年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要求，但另一方面又感到他们私心太重，“真出于‘为天下’是很少的”。鲁迅一直提倡“韧”性的战斗精神，但他发现不少知识青年华而不实，脆而不韧，碰了几个钉子以后，很快就从“醒着”转变为“昏着”，从前进转变为倒退。

为什么会出现这类现象？这使鲁迅感到困惑。他痛苦地想：如果连这类“要前进的”、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到头来都不足靠，中国的希望在哪里？

鲁迅的“求索”并没有局限于一时一地的所见所闻，他把目光追溯得很远，想从历史的回顾中作一番系统的整理。就这样，他在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五年间接连写了几篇反映知识分子的小说，对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知识青年作了深入的解剖，总结了他们在中国革命长途中怎样从“前进”到碰壁，以致最终遭受失败的教训。

《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原先对自己“改革中国的方法”深信不疑，曾经勇敢地拔掉城隍庙中神像的胡子，到后来却丧失了任何战斗意志，象蜂子和蝇子一样，“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变成一个“敷敷衍衍，模模胡胡”、专教“子曰诗云”混日子的人物；

《孤独者》中的魏连受曾经是一个“新党”，经常毫无顾忌地写文章，发议论，最后却和旧势力全盘妥协，成为一个军阀师长的顾问，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完全毁灭了自己；

《伤逝》中的涓生、子君是比吕纬甫、魏连受晚出一辈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了更多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反封建要求也更为迫切。子君喊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

有干涉我的权利！”毅然冲出旧家庭的樊笼，和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涓生实行同居。可是不久，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两人终于被迫分离，子君回到她父亲那里悲惨死去，涓生悔恨万分，又找不到出路……

三篇小说，三个悲剧，笼罩着浓重的忧郁调子，又闪发着深刻而清醒的批判光芒。

吕纬甫、魏连受、涓生、子君都曾经不失为“要前进的”青年，都向封建势力进行过挑战，然而他们到后来都失败了。症结在哪里？鲁迅痛切地感到，症结就在于：在他们的心目中，象祥林嫂之类的劳苦大众并未占有位置；症结就在于：个人奋斗式的反抗并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吕纬甫单枪匹马地拔掉神像胡子之类的举动不会收效，魏连受孤身一人、我行我素的抗争冲不破黑暗的罗网，而子君的呼喊“我是我自己的”，看似颇有信心，实质上正好暴露了她思想的脆弱性——在强大凶暴的封建势力面前，离开整个社会的解放去追求个人幸福，怎能避免失败的命运？到头来，等待着她的竟是连一块墓碑也没有的坟墓！

这些人物共同的悲剧说明了他们斗争目的、斗争方式和斗争武器都存在严重的问题。那末，究竟怎样才能另辟生路，不致重蹈覆辙？尽管鲁迅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还不甚了然，但是，有一点是明白无疑的：为了使千千万万闰土、阿Q、七斤、祥林嫂得到解放，必须不间断地寻找新的思想武器，必须坚持顽强的战斗，决不能回过头去同旧势力妥协！

写于一九二五年三月的散文《过客》，在某种程度上正反映了鲁迅这时彷徨求索，坚持战斗的精神状态。这个“过客”不顾长途跋涉，不避荆棘挡道，不怕流血受伤，始终顽强地向前、向前。途中，他向一个老翁问路，这个老翁早已在道旁筑起了一个休憩的小屋，停步不前了。老翁以“过来人”的身份劝“过客”回去，理

由是：“据我看来，你已经这么劳顿了，还不如回转去，因为你前去也料不定可能走完。”

“过客”沉思片刻，忽然惊起，斩钉截铁地说：

那不行！我只得走。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

是的，决不能回转去！在那里，鲁四老爷安下了剥削和压榨的陷阱，假洋鬼子举起了“不准革命”的哭丧棒……必须对于这一切旧势力“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决不能让他们继续作威作福，统治人民！

“过客”和老翁分手，和一切半途停止战斗的人分手。他包扎好伤口，提起竹杖，准备继续向前探路。临行，他深沉地说：“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

在“过客”听到的“声音”中，显然，有着阿Q、祥林嫂等被压迫人民的呼喊，有着时代的鼓点。

鲁迅曾经说过，《过客》这篇散文，他在头脑中酝酿了好多年。不言而喻，在“过客”身上，多少可以照见大分化以来鲁迅自己的影子。

“过客”是一个进行“韧”性战斗的勇士形象，同时，他又是孤独的，也不无疲乏之感。他不知道前途如何，在彷徨也在探索。

鲁迅后来写过一首《题〈彷徨〉》的诗，追述他当时有过“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思想情绪。这种情绪不时流露在他的笔下。在鲁迅的作品中曾出现过这样的句子：“我的心分外地寂寞。”“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梦见自己在冰山间奔驰。”

有时，词句又一变而为愤慨激昂，几乎是大声疾呼：“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鲁迅无情地批判了当时存在于知识分子中间的各种颓废复古、消极逃避的倾向，但是，大声疾呼和无情批判掩不住内心的一片焦灼之情：“新的战友在那里呢？”

基于这种没有解决的思想矛盾，鲁迅在和青年们接触的时候又表达了这样的想法：“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因为“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我现在还要找寻生力军”。

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政治理想和斗争道路。因此，对于鲁迅来说，“找寻生力军”和找寻新的斗争道路、斗争方式这两个问题，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了。

从留学日本开始，鲁迅曾经想以文艺为武器，从思想和精神方面入手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但是严峻的阶级斗争现实动摇了他这种想法。

孙中山的逝世引起了鲁迅不少联想。回顾这位伟大革命先行者走过的道路，鲁迅得出结论道：“孙中山奔波一世”，所以屡遭挫折和失败，“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总而言之，“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

面对北洋军阀及其走狗“现代评论派”的猖狂反扑，鲁迅毫无怯阵的表示，但在和战友倾心交谈时，他又从不讳言自己内心的矛盾：“我又无拳无勇，真没有法，在手头的只有笔墨”，“我明知道笔是无用的，可是现在只有这个，只有这个而且还要为鬼魅所妨害。”这些话渗透着鲁迅在认识工农革命武装斗争的巨大威力前极大的悲愤和苦闷。

从寄希望于全体青年、寄希望于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

青年发展到寻找“新的战友”；从不恰当地估价文艺的作用发展到推崇革命的“火与剑”，这标志着鲁迅的世界观正在发生部分质变，也说明了鲁迅思想深处的矛盾斗争已经到了何等激烈的程度。

在头脑中的进化论和唯心史观不断受到冲击的过程中，对于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了解、学习、思考，使得鲁迅内心的矛盾斗争增添了崭新的因素，从而加速着鲁迅思想的发展。

鲁迅思考和“求索”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已经有了一段较长的时间，他不断地从国内外反面教员那里得到“启发”。反动派不择手段地丑化十月革命，使鲁迅认识到这场革命已经吓得他们胆战心惊；而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外国游客编写的苏俄游记，更分明流露着富人们阴暗、恐惧的心理。一九二五年四月，鲁迅为一位青年友人编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一书写了前记，在“中国至今于苏俄的新文化都不了然”的情况下，他表达了自己急于了解“苏俄的新文化”的强烈愿望。

鲁迅学习马列主义虽然不是最早，但很踏实，他不断把自己在现实斗争中的切身感受和马列主义的理论互相印证，从中得出自己为之深信不疑的结论。在《春末闲谈》中，鲁迅曾热情赞扬十月革命掀翻了沙皇的罪恶统治。在另一篇杂文中，鲁迅从北洋军阀不准学生开会的事想到：“因为加了强力的迫压，遂闹出开会以上的事来。俄国的革命，不就是从这样的路径出发的么？”

然而，当时鲁迅终究还不能确有把握地断定：象十月革命这类崭新的革命会不会在中国出现。在中国该到哪里寻找足以发动这样的革命的社会力量？

时代在不断地向鲁迅揭示着答案。无数“新的战友”——广大工农群众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

争迎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高潮。

革命风涛震撼着北京，也震撼着鲁迅的思想，加速了他思想矛盾的激化。

第九章 女师大事件

在北京石驸马大街口，有一座经常关闭着黑色铁门的楼房，这就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一九二五年，在南方风起云涌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浪潮的影响下，这里爆发了震动整个北京城的“女师大事件”。在这一事件中，帝国主义、封建官僚和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结成的反革命同盟，同日益发展的人民革命力量进行了短兵相接的较量。

女师大的校长原是许寿裳，鲁迅就是应他之聘在女师大兼课的。一九二四年三月许寿裳去职，继任的叫杨荫榆。这是一个典型的帝国主义走狗，封建军阀的奴才，她那披着黑色斗篷的身影，就象幽灵一样在校内到处晃动，成天向学生灌输的，是她从美国学来的那些反动的资本主义思想垃圾和孔孟之道的混合物。她把学校比做“家庭”，把自己当作“尊长”，结党营私，飞扬跋扈，竭力在校内实行封建统治和高压政策。有一件事特别使学生们感到愤懑，她竟然阻止女师大学生请假去参加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的公祭大会，理由是：“孙中山是实行共产公妻的，你们学了他没有好处，不准去！”杨荫榆说出了当时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右派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

但是，黑色的校门挡不住时代的激流。一九二五年年初以来，工人反帝斗争一浪高似一浪，上海纱厂大罢工刚刚结束，青岛纱厂工人的大罢工又接着爆发。在这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风暴的推动下，女师大的学生们起来造反了，她们发表宣言反对

杨荫榆当校长，决心砸烂那拘囚她们身心的牢笼，驱逐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代理人。

杨荫榆于是就准备下毒手。

五月九日是“国耻纪念日”，十年前的这一天，袁世凯无耻地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学校在“国耻纪念日”的前二天布置了一个演讲会，早已被学生否认的杨荫榆竟悍然登台，要以校长名义亲自掌握会议。杨荫榆这一无耻行为激起了全体学生的公愤，她们群起反对，报以一片嘘声。杨荫榆狼狽不堪，诬蔑学生破坏“国耻纪念”，厉声高呼：“叫警察！”学生毫不退让，竞起责问，杨荫榆见势不妙，偷偷溜出会场。当天下午，杨荫榆立即召集党羽开会，密谋迫害学生。九日清晨，贴出了一张布告，宣布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六名学生自治会代表。

杨荫榆的横蛮手段激起学生强烈的反抗，她们一看到贴在墙上的开除学生的布告，立即在操场上集合，排队到办公处示威，当场宣言：“全体学生是拥护我们的代表的。”她们公推十位同学去见杨荫榆，要她到会辩论，可是杨荫榆早已闻风潜逃了。于是学生们更加愤怒了，许广平是自治会的总干事，同学们要她亲自拿封条去封校长办公室。

许广平执行了大家的委托，把校长办公室封了。

今后该怎么办？学生们富有斗争精神，但还缺乏经验，有的因气愤和忧虑而哭了起来，有的和自己的代表们一起考虑着下一步的对策。她们是多么希望进步教师站出来指导她们，和她们一起战斗啊！

正在这一时刻，鲁迅和许寿裳等进步教师挺身而出，坚决表示支持学生们的正义斗争。

五月十日，鲁迅首先用杂文愤怒地揭穿了杨荫榆及其同党

媚上压下的丑恶面目，号召学生针锋相对地进行还击，因为只有这样，“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

得到鲁迅的支持，学生们活动得更积极了。一天，鲁迅接到一个由学生自治会召集会议的通知。但是，当他下午去开会时，在那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两位教员坐在那里。

“先生的意见是怎样？”一个教员问。

“我个人意见，是反对杨先生的……”鲁迅的话还没讲完，那位教员就已经不耐烦地摇头了。

鲁迅知道自己是遇到杨家的人了，和这些人实在无话可说。但开会的人怎么还不来呢？一低头却发现桌上有一张印刷品，是杨荫榆发的通知，说什么学生自治会召集教师开会，“无此学制，亦无此办法”，并公然唱对台戏，通知教员到太平湖饭店开紧急会议。看了这张纸条，鲁迅才知道学生自治会召集的会议已经受到了杨荫榆的破坏。

从学校回到家里时，已经黄昏了。鲁迅想着下午的事情，心中无比愤怒，他仿佛看到在太平湖饭店里，杨荫榆一伙正围着桌子吃着丰盛的菜肴，在杯酒间就决定了青年学生们的命运。

鲁迅感到杨荫榆的“手段太毒”，必须发表一个宣言说明真相，给这些“暗中活动之鬼”以迎头一击。五月二十七日，鲁迅联合许寿裳等七位教员拟了一篇《对于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严正声明对女师大事件的态度，抗议杨荫榆对学生进行迫害，呼吁“关心教育”的社会各界人士密切注意杨荫榆的动态。

宣言在《京报》一发表，杨荫榆的狐群狗党立刻反扑。

“现代评论派”也出场了。凭着特有的反革命敏感，他们知道：女师大虽小，势在必争；闹学潮之例，断不可开，否则发展下去必定危害反动统治秩序。因此，他们决定公开支持反动的学校当局。

和鲁迅等人发表的宣言相隔仅三天，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闲话》，他装出局外人的姿态，说什么女师大学生“闹得太不象样了”，把学校弄得象“臭毛厕”一样，丢尽了“教育界的面目”；说什么鲁迅等人的宣言“偏袒一方，不大公允”；并放出流言说风潮是“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藉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要“当局”“切实调查”，加以“相当的惩罚”。谁都明白，他所说的“某藉某系”，是影射当时以鲁迅为中心的进步力量，他们是多么迫切地要求反动当局来迫害鲁迅啊。

这并不能“吓哑”鲁迅。当天晚上他就写了《并非闲话》一文，尖锐地指出：在现实社会中，“偏袒”是“在所不免的”，陈西滢一伙装作不“偏袒”一方，恰恰暴露了他们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鲁迅说，丢尽“教育界的面目”的不是青年学生，正是他们这一小撮“蛆虫”！

正当这场斗争深入展开的时刻，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了。五月三十日，上海二千多学生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屠杀、压榨和剥削，举行集会，英帝国主义巡捕房非法逮捕参加集会的学生一百多人。这个暴行激起了学生和市民的更大愤恨，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在南京路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可是英帝国主义巡捕却竟然向群众开枪射击，中国人民的鲜血染红了南京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工人阶级、青年学生和广大群众立即举行了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反帝怒潮汹涌澎湃，奔泻千里。

五卅运动给战斗中的鲁迅以极大的鼓舞。他十分关注由“五卅”引起的反帝运动的进展，还主动捐了一笔钱支援各地学生的反帝斗争。他一连写了好几篇杂文，指出这次“上海的英国捕头残杀市民”，就使“伪文明人的真面目显露了”；他号召青年

学生扩大视野，不要把自己的目光局限于一时一地的“学潮”，而是要坚决投身到当前反帝斗争的风暴中去经受“磨练”，并且驰而不息，“永远这样的干下去”。

当时，一些被帝国主义枪弹吓昏了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竟一次次向刽子手们辩解：我们没有“赤化”，我们不是“暴徒”，为什么要打我们？“张着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鲁迅在六月十一日写的一篇杂文中严厉批判了这种行径，勇敢地说：

中国人如果真使中国赤化，真在中国暴动，就得听
英捕来处死刑？

而且又进而指出，帝国主义之所以对我们如此凶残，国内这些人之所以如此软弱，“这原由是很容易了然的，就因为我们并非暴徒，并未赤化的缘故。”

这些思想，不仅反映了鲁迅一以贯之的彻底反帝精神，而且也表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的爱国运动，又一次促使他对当时被反动派视为洪水猛兽的“赤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产生了进一步的感情。

五卅运动也使鲁迅的对手惶惶不安了。还在拚命写文章为杨荫榆保驾的“现代评论派”“正人君子”们，迫不及待地抽出笔来，大叫什么“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陈西滢干脆咬牙切齿地说：“我不赞成高唱宣战”，他居然嘲笑被美国兵殴打而敢于反抗的中国人：“这样的中国人，呸！”对此，鲁迅尖锐地指出，他们是要“中国人该被打而不作声”。他针锋相对地对这批奴才投以十倍的蔑视：“这样的中国人，呸！呸！！”

五卅的反帝巨浪也迅速提高着女师大学生的政治觉悟，她们把反对反动学校当局的斗争和声讨北洋军阀媚外卖国的运动

连结在一起。她们多次参加北京各界举行的反帝集会游行，还在校内组织护士训练班，学习看护，准备用实际行动声援工人阶级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英勇搏斗。

就这样，女师大的风潮和全国人民反帝斗争的风暴汇合起来了。杨荫榆自然更加害怕，她在新平路密设了一个“女师大校长临时办公处”，一面借口暑假校舍要进行修理，不准学生住校，一面又卑鄙地阻止学生请来讲习护理知识的医生进校。并贴出布告解散学生自治会。

这些鬼鬼祟祟的阴谋活动，都被学生看穿并粉碎了，于是杨荫榆愈加疯狂，她要 and 革命力量决一死战了。

八月一日清晨，杨荫榆在北洋军阀政府的授意和支持下，干脆带着军警打手百余人，蜂拥入校，强占校长办公室；学生坚决抵制，毫不屈服。杨荫榆索性下令关闭伙房，截断电路，封锁校门，妄图断绝学生和各界的往来，把她们困死在校中。

在这最紧张的关头，鲁迅来到了女师大，他和学生们站在一起，隔着学校铁门同外面站着的密密层层的军警相对峙。当晚，鲁迅又毅然和一些进步教师留宿在女师大教务处办公室，准备应付不测。

在八月份短短一月中间，斗争形势在急速发展：

八月六日，教育总长以“学纪大紊，礼教全荒”为理由，在北洋军阀的国务会议上提议解散女师大，并当即下令执行；

八月二十二日，军阀政府派出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雇用了上百个打手，打入女师大，用武力将学生架出校外，不少学生被毒打受伤；

八月二十五日，“临时执政”段祺瑞亲自出马，发出了“整顿学风”的命令，声称“教育为国本所托，中央乃政令之源”，“倘有故酿风潮，蔑视政令”，便“依法从事，决不姑贷”。

封建势力象乌云一样往进步青年头上压了过来，严酷的阶级斗争考验着每一个人。在这风狂雨猛的时刻，胆小怕事的，明哲保身的，看风使舵的，都纷纷退却，逃之夭夭，但鲁迅仍不畏强暴挺身而出，他和许寿裳等组成“女子师范大学校务维持会”，坚决抵制北洋政府解散女师大的反动措施。他接连在报刊上发表《流言和谎话》等杂文，批驳反动派的种种诬蔑和谎言。当社会上传出反动政府正在搜捕学生代表、准备用警察把她们押回原籍的罪恶阴谋时，鲁迅怒不可遏，对学生们说：“来我这里不怕！”他让学生到他家里避难，警察来到西三条胡同，都被他顶了回去。

于是，鲁迅也就成了反动势力的眼中钉。他们千方百计要陷害他。先是派人向鲁迅说：“你不要闹，将来给你做女师大的校长。”鲁迅对此嗤之以鼻；软的不行又来硬的，八月十三日，教育部下令免除鲁迅教育部金事的职务。

但是，鲁迅仍然迎着敌人的锋刃而上。反动派免了鲁迅的职，鲁迅便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根据当时“法律”规定教育部无权免金事之职的条文，向平政院控告。石驸马大街的校舍被暴力占领了，鲁迅就带领学生们在宗帽胡同赁屋上课。九月二十一日，宗帽胡同的新校开学，鲁迅发表了演说，他对同学们说：“我相信被压迫的决不致死亡，压力是压不倒人的。”

九月的北京还是很热的，鲁迅在大热天中来回奔跑于西三条胡同和宗帽胡同之间，加之这几个月来的紧张、劳累，肺病又复发，在参加开学典礼后就卧床了。他在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上记着：“午后发热，至夜大盛。”但是鲁迅仍然抱病上课，并主动要求把任课时增加一倍。与此同时，他还写了大量文章，揭露“现代评论派”“正人君子”们的假面。

军阀政府和“现代评论派”种种倒行逆施的行径激起了社会上各阶层进步人士的愤怒。北京大学教师首先召开会议，议决与北洋军阀教育部脱离关系。接着，代表北京九十八所学校的学生联合会在报上公开发表启事，痛斥北洋军阀教育部“近日复受帝国主义之暗示，必欲扑灭学生运动而后快”。

反动派看到，单单用高压手段对付青年是不济事了，于是又想出了新的花招，妄图搬出一些所谓“理论”、“主张”来对抗学生运动。就在群众反帝斗争激烈展开的时刻，一种直接由教育部创办，叫做《甲寅》的周刊突然出版。这本封面上印着一只面目狰狞的老虎的刊物，一张口就声称：“文字须求雅驯，白话恕不刊布”。还叫嚣什么新文化运动“陷青年于大阱，颓国本于无形”……，后来，军阀政府又通过这个刊物发动了“读经救国”运动，甚至利用行政手段规定从初小四年级就要开始读经，再一次想用孔孟之道浇灭人民革命运动的烈火。

不久，胡适也跳出来配合，他在《现代评论》上写了一篇《爱国运动与求学》的文章，提出了救国必先求学的荒谬理论，说什么“跟着人家乱跑乱喊，不能就真是尽了爱国的责任”。他别有用心地向青年们讲了歌德和菲希特怎样在兵临城下的时候，还埋首读书著文的故事，“劝告”青年们不要受“外间刺激”，而是要去“用心研究一种绝不关系时局的学问”。

读经能够救国？鲁迅说，在欧战期间，谁见过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他认为，那些“正人君子”也并不相信读经可以救国，教育总长坐朝论道“读经救国”，大学教授现身说法“救国必先读书”，一吹一播，都是“别有用意”的。

当时有些人看不出这“用意”，竟花了许多笔墨和他们“评道理，讲利害”，鲁迅反对这种做法。为了及时粉碎《甲寅》和“现代评论派”的联合攻势，使广大青年免于上当受骗，鲁迅连续写了

《答KS君》、《十四年的读经》、《碎话》、《这个与那个》等杂文。

鲁迅当众宣告：“读经救国”只是一种政治阴谋，尊孔、崇儒、专经、复古这些“把戏”，完全是一种“将人们作笨牛看”的愚民政策，完全是为了从根本上腐蚀广大青年的革命斗志，使他们“什么事也做不成”，结果“老死在原地方”。

总之，北洋军阀及其走狗们武的一手没有成功，文的一手也没有奏效。一九二五年年底，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东征取得胜利。在南方革命浪潮的鼓舞下，北京人民接连爆发反帝反封建的示威游行，“驱逐段祺瑞”的口号声响彻全城。愤怒的群众冲破了反动军警设置的防线，连“京师警察厅”的牌子都给游行群众摘下来了。在人民群众斗争风暴的冲击下，封建统治阶级最后露出了纸老虎的原形，一些原先身居要职的政客官僚纷纷逃离北京，避居天津租界。在宗帽胡同坚持斗争的女师大学生，终于在十一月三十日，浩浩荡荡地排着队返回石驸马大街原址，正式宣布复校。北京其他大学的学生也前来助威。鲁迅和广大青年学生获得了胜利，人民革命力量获得了胜利！

在长达半年多的女师大风潮中，鲁迅的斗争体现了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迫切要求，客观上正和南方迅速发展着的革命主流相呼应。

胜利刚刚取得，硝烟还未消散，但是，一个新的战斗信号又在鲁迅面前升起了：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语丝》上出现了一篇林语堂写的文章，题为《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文章说，现在段祺瑞等人已经失败，我们不能“投井下石”，“再施攻击”，而应该发扬“费厄泼赖”精神。（“费厄泼赖”，英语 fairplay 的音译。原为体育比赛或其它竞技所用之术语，意为：光明磊落的比赛，不要用不正当的手段。这里转意为：对敌人要讲宽大，不要穷追猛打。）这种从外国贩卖来的论调，骨子里仍是孔孟鼓吹的中庸之道。

问题的提出者不是胡适、陈西滢等北洋军阀的公开走狗，而是当时还似乎置身在进步营垒里、并在鲁迅所拟的那个“宣言”上签过名的林语堂！这就更加使人迷惑：究竟应该如何对待敌人？要不要将斗争进行到底？

其实，“费厄泼赖”这股逆流还在几个月前就冒头了。五卅运动以后，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运动的迅猛发展，使一些惊慌失措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折中的面目，“宽恕”的论调来阻挡这场革命的进行。例如周作人说：“中国现在最切要的，是宽容思想之养成”，“以前的事情，我们不必再提罢。”应该怎样呢？他的回答是：“反抗自己”比斗争敌人更重要；“必先克己”，“凡有革新皆从忏悔生的。”

鲁迅早就在激烈的战斗中警惕着这股逆流，待看到林语堂的文章以后，更加感到他们宣扬的这一套中庸之道的危害性。在新的一年即将到来的前夜——十二月二十九日，他怀着将反帝反封建斗争进行到底的强烈责任感，写下了著名的论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在这篇文章中，针对着林语堂“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的论调，鲁迅提出了一个响亮的战斗口号：必须痛打落水狗！

鲁迅拉开历史的帷幕，向人们展示了辛亥革命中“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的许多惨痛教训。鲁迅思索已久的这些历史教训，在近几年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烈火中又进一步得到了证实。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阶级斗争的一条重要规律：如果对鬼蜮慈悲，将来“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于是，他写下了这样明确的论断：“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对它们绝不应抱有幻想，只要是“咬人之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不‘打落水狗’是误人子弟的”。

正是基于对敌人反动本性的深刻认识，鲁迅提醒人们，不要被一时处于劣势的敌人装出来的可怜相所迷惑，不要因胜利而松懈斗志，不要把敌人一时“失足”看作已经“塌台”，更不要把他的“落水”当作“受洗”，以为已经“忏悔”，“不再出而咬人”。他们“虽然有时似乎受伤，其实并不，至多不过是假装跛脚，聊以引起人们的恻隐之心，可以从容避匿罢了”。其实，他们的巢窟早已造好，“都在租界里”，只要时机一到，就要卷土重来屠杀革命者的。鲁迅谆谆告诫人们，对阶级敌人绝不能讲中庸，绝不能手软，千万不能有“哀矜之意”，不能对他们讲“公理”，不能一味“费厄泼赖”，而是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在这篇文章里，鲁迅还维妙维肖地勾勒出鼓吹“中庸之道”最起劲的胡适、陈西滢以及林语堂之流的脸谱：“虽然是狗，又很象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鲁迅给了他们一个绝妙的名称：叭儿狗。根据几年来斗争实践，特别是根据半年多女师大风潮期间的斗争实践，鲁迅清楚地看到这些“满心‘婆理’而满口‘公理’”的叭儿狗是最危险的敌人，当坏人得势的时候，他们伪装公正，粉饰太平，竭力维持现状；而当坏人行将落水之际，他们就大叫大嚷什么“勿报复”呀，“仁恕”呀，“勿以恶抗恶”呀，最后使好人上当，坏人“得救”。鲁迅深恶痛绝地指出，对这种叭儿狗绝对不能“宽容”，“应该先行打它落水，又从而打之。”

鲁迅后来把这篇文章收进了自己的杂文集《坟》。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他特别指出：

最末的论“费厄泼赖”这一篇，也许可供参考罢，因为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

是的，这是用鲜血写成的宝贵文字，这是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长期斗争中的经验结晶。同时，这也是鲁迅思想发展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它所体现的思想，捍卫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性，处处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因此，在以后几十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历程中，它曾无数次地激励和鼓舞了广大革命者的斗争意志。这篇文章的出现，表明鲁迅正酝酿着一次伟大的思想飞跃。

鲁迅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一直坚持“痛打落水狗”的革命原则，继续狠批北洋军阀及其走狗。敌人招架不住了，放出了“停战”的烟幕。一九二六年二月，“现代评论派”分子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写文章，说什么大家都是“大学教授”，不该“混斗”下去，他要“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鲁迅完全明白他们的用心所在，他大声地回答他们：

“我还不能‘带住’！”

第十章 “正视淋漓的鲜血”

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发表不到三个月，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卖国政府门前又一次响起了屠杀革命群众的枪声，一场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发生了。

敌人的血腥暴行，又一次证明了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所坚持的革命原则的正确性。

“三·一八”惨案的发生决非偶然，它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处心积虑地镇压“五卅”以后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必然结果。在英、美、日帝国主义的唆使下，一九二六年三月，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同情革命的国民军冯玉祥部。

紧张的气氛笼罩着北京。黄尘扑面的街市中，只见一辆辆装着伤兵的兵车飞驰而过，一队队国民军急急地往城外开去……

三月十二日，日本帝国主义公开援助同国民军作战的奉系军阀，派出两艘军舰掩护奉军闯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守军，国民军亦开炮还击。于是日本帝国主义便以此为借口，在三月十六日联合英、美、法等八国，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停止国民军在津沽间的军事行动，并撤除防务。他们还气势汹汹地勒令段祺瑞政府在四十八小时内，即十八日正午前作出答复。

消息传来，北京人民愤怒极了，纷纷要求执政当局拒绝八国通牒。十七日，一场大规模的请愿、示威运动在北京各界，特别

是在各个学校里准备着。而在铁狮子胡同段祺瑞卖国政府的大楼里，也在紧张地策划着一次血腥的屠杀。

国民党右派得悉段祺瑞的阴谋，为了和反动军阀一起摧残革命力量，也别有用心地“动员”人们去请愿。当时在北京的国民党右派于右任就曾经对女师大的学生说：“你们尽管去，黄花岗烈士中也没有一个女的，你们去干吧！”阴险地配合段祺瑞政府布下的诱杀的罗网。

十八日一清早，四千多工人、学生和各界人士冒着寒风到天安门前集会，抗议帝国主义对我国内政的干涉，谴责段祺瑞政府的投降行径。会后，他们示威游行至执政府请愿。坚持过长时间斗争的女师大学生，也加入了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扛着大旗走在她们前面的，是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

请愿队伍刚到执政府门口，段祺瑞就命令卫队开枪，并阻塞通道，两面夹攻，用大刀、铁棍追打砍杀。手无寸铁的爱国群众牺牲四十七人，其中有女师大的学生刘和珍、杨德群；伤一百五十余人；还有不少人“失踪”，其实也是牺牲了。

又是一起骇人听闻的血案！当时人们曾经这样悲愤地唱道：

呜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杀人如乱麻！
民贼大试毒辣手，
天半黄尘翻血花！

几个月来，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全国各地制造的一个个暴行在鲁迅心头积蓄着越来越强烈的愤怒。今天，执政府前大屠杀的消息刚传来时，鲁迅还不大敢相信，他说：“我向来是不惮

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消息被证实之后，鲁迅再也压抑不住了。当晚，他写了杂文《无花的蔷薇之二》，激愤的言词如同开了闸的急流奔腾而出：

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还要下令，诬之曰“暴徒”！

如此残酷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萨克兵击杀民众的事，仅有一点相象。

.....

如果中国还不至于灭亡，则已往的史实示教过我们，将来的事便要大出于屠杀者的意料之外——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在这篇杂文的末尾，鲁迅写下了写作的日期，他把这个血腥的日子称作“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惨案发生之后，段祺瑞政府一方面推卸罪责，诬蔑参加游行的群众为“暴徒”；一方面又加强镇压，于三月十九日发下一道通缉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命令。他们制造假现场，混淆视听，胡说群众游行请愿是搞什么“暴动”。对此，“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们心领神会，他们在惨案后不久出版的一期刊物上，用了几乎全部的篇幅，把矛头指向人民群众。其中，尤以那个前不久还

宣布“不管闲事”的陈西滢更为卑劣。他在一篇《闲话》中，竭力为段祺瑞政府开脱，恶毒污蔑学生是“受人利用”、“自蹈死地”，说什么“暴徒首领”应负“道义上之责任”，等等。

封建军阀及其走狗继续耍弄花招，这本在鲁迅意料之中；但他们无耻的程度，又有点出于鲁迅的意料之外。他气得好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些友人去看他，他怀着极度的悲愤，久久才迸出一句话：“我们对这件事决不能沉默。”

对反动派诬蔑群众游行是搞什么“暴动”的说法，鲁迅无情嘲讽，严加痛斥。他说：“做证据的有一根木棍，两支手枪，三瓶煤油。姑勿论这些是否群众所携去的东西；即使真是，而死伤三百多人所携的武器竟不过这一点，这是怎样可怜的暴动呵！”

针对着陈西滢之流的种种污蔑，鲁迅写道：“各种评论中，我觉得有一些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者在。这就是几个论客，以为学生们本不应当自蹈死地。那就中国人真将死无葬身之所，除非是心悦诚服地充当奴子”。在指出了他们的反动本质以后，鲁迅又寓意深长地说：“不过我还不知道中国人的大多数人的意见究竟如何。”

鲁迅这样说，是因为他已看到“中国人的大多数的意见”正和段祺瑞、陈西滢之流相反。三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宣布段政府是“卖国凶犯”，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用革命行动推翻军阀的反动统治；连日来，北京各界群众，冲破敌人的种种威压，纷纷集会、游行，哀悼死难烈士，声讨敌人的罪行。这一切，给正在寻求革命力量的鲁迅带来了多大的鼓舞！因此，他豪迈地宣告：“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民永远变作牛马。”

三月二十五日，女师大为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等召开隆重的追悼会，鲁迅也前往参加。

死者的遗体安放在灵堂上，她们的身上还留着许多棍棒的伤痕。她们在反动派屠杀的时候临危不惧，互相救护，表现了中国革命青年的大无畏精神。杨德群是身受重伤救护无效，在医院里去世的；刘和珍是当场被打死的，而且遗体还被执政府扣留了，女师大的师生们经过斗争才把这具遗体夺了回来。追悼会在悲愤的气氛中进行着。刘和珍生前的战友、女师大学生会总干事许广平举着死者打满补丁的血衣，愤怒地控诉了反动派的暴行和污蔑。

鲁迅目不忍睹，心情无比沉痛。他一个人在礼堂外面徘徊，刘和珍的形象活生生地浮现在他眼前：在艰难的生活中，毅然订下了全年的《莽原》；在女师大事件中，坚决同杨荫榆作斗争因而遭到了“开除”的“处分”；在宗帽胡同上课时，态度是那样的认真，对学校的前途是那样的关切……。鲁迅诧异于这样一个始终微笑、态度很温和的女青年，竟能如此勇敢地与反动势力作斗争，并在斗争中毅然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些什么没有？”一个学生跑来，打断了鲁迅的思路。

“没有。”鲁迅回答。

“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那个学生又说。

几天以后，鲁迅痛定思痛，终于写下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悼念文章：《纪念刘和珍君》。

鲁迅满怀深情地回顾了和刘和珍交往的过程，对她进行了热烈的歌颂：“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当她和她的战友们英勇地牺牲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

“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

“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鲁迅认识到：“这样的世界”不是枝枝节节所能改好的，中华民族尚无巨大的、彻底的变革是不会有出路。“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他决计踏着烈士的血迹，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用斗争来结束“这样的世界”。他写下了这样铿锵的语句：

“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真的勇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是哀悼，也是控诉；是宣誓，也是号召！

在写作《纪念刘和珍君》的前后，鲁迅还写下了一系列评述“三·一八”事件的杂文，几乎接连不断：三月二十三日写完《死地》，三月二十六日又写了《可惨与可笑》；四月二日写完《空谈》，四月六日又写了《如此“讨赤”》。在这些杂文中，鲁迅反复地表明了自己在这个血腥事件中所获得的思想进展。他自己的概括是：“三·一八”事件使他进一步认识了三种人物，取得了两个教训。

三种人物：“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敌人的凶残和下劣使他决心在“目不忍视”、“耳不忍闻”的现实中“爆发”出更大的斗争火花；革命青年的牺牲精神又使他找到中国人民“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使他在“淡红的血色中”看到了希望，尽管还有点“微茫”。

两个教训：“我以为倘要锻炼群众领袖的错处，只有两点：一是还以请愿为有用；二是将对手看得太好了。”

鲁迅说，段祺瑞之流，“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又是徒手。”在鲁迅看来，“请愿虽然是无论那一国度里常有的事，不至了死的事，但……中国是例外，除非你能将‘枪林弹雨’消除”。他认为：反动派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对他们不能搞什么“请愿”。鲁迅进一步指出：“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

鲁迅总结了“三·一八”事件的意义，指出：“这回死者的遗留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究竟用什么方法，他还在探索，但他觉得至少是不能“赤膊上阵”，而要改用“壕堑战”。

鲁迅对现实的认识因“三·一八”事件而加深了，这事件给他以巨大的震动，也给他以深刻的教育。他的斗争意志更加坚定了。不久，在“正人君子”的配合下，反动当局对鲁迅的压迫越来越紧。段祺瑞政府继第一个通缉令以后，报上又传出了一张范围广至五十人左右的黑名单，鲁迅的名字也列入其中。

四月中旬，在朋友们的劝告下，鲁迅离开了西三条胡同的寓所，搬到莽原社暂避。起初，他白天在里面看书写文章，晚上出来转一圈打听外面的消息。但到第三天，突然有三、四个不相识的“青年”闯到莽原社来，行迹可疑，鲁迅估计他们是化装的暗探，于是就装成病人，移住到一个日本医院中，不久又搬到一个德国医院。由于劳顿不安，鲁迅在德国医院真的生病了。病稍愈，德国医院催他出院，他又转到一个法国医院里。

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在德国医院，鲁迅和同去避难的几个人住在一间堆积什物的地下室里，白天以干粮充饥，晚上在水泥地上睡觉。一起避难的人闲得无聊，总是谈天、下下棋，而鲁迅却总是在这种谈天、下棋的人堆旁搭一张小桌，继续工作。有时实在没有地方了，就一个人躲到医院的木匠间里去写作。在这期间，鲁迅继续以匕首一样的杂文批判了反动政府和陈西滢之流，同时还写下了一些回忆性的散文。前些时候，在女师大风潮的日日夜夜里，那些军阀头目及绅士学者特别起劲地鼓吹封建道德，以此来和进步师生对抗。如今，鲁迅在这些散文中又穷根究底，从历史的回顾中深刻地揭露了封建道德的残酷性和虚伪性，指出：孔孟之徒拚命地鼓吹的“孝道”、“节烈”之类的东西，是专门用来对付幼者和弱者的，他们自己并不实行：“整饬伦纪的文电是常有的，却很少见绅士赤条条地躺在冰上面，将军跳下汽车去负米。”鲁迅把对封建道德的批判同现实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揭露了反动派利用儒家的伦理观念来诱杀青少年的阴谋。

避难的生活使鲁迅负债不少，弄得经济无法支持。五月初，通缉的风声渐渐沉静下去，鲁迅回到了自己的寓所。

当时，北京的政治局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军阀的内哄火并中，段祺瑞被赶下了台，逃到天津，“徐养兵力，以待时机”去了。不久，直系军阀头子吴佩孚和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又相继杀气腾腾地开进了北京。军阀们轮番登台，在鲁迅看来，无异于“做戏”，统治中国的仍然是这么一帮子主张“制礼作乐”、“尊孔读经”、见到一个“赤”字就胆战心惊的货色。他在结束避难生活后不久写的一篇杂文中说：段祺瑞等人虽然逃走，其实并未落水，不过“安住”在租界而已；北京依然是他们所豢养过的东西在张牙舞爪，他们勾结着的报馆在颠倒是非，……总之，依然

是他们的世界。

回寓以后，鲁迅生了一段时间的病，但他的精神却比过去更加高昂了。那时曾经有几个心怀叵测的“名人”间接“忠告”他，说他去年的文章，“专和几个人闹意见，不再论及文学艺术，于天下国家，是可惜的”。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要使鲁迅一针见血的批判变成隔靴搔痒的空头文章。鲁迅看透了他们所包藏的恶毒用心，辛辣地加以嘲讽：“冠冕堂皇的如所谓‘公理’之类，就让公理专家去消遣罢。”在一篇通讯中，他乐观地回忆一年来的斗争生活，嘲笑反动军阀和叭儿狗们的种种迫害阴谋“也没有什么效验”，“仍然于我无损，我还是这样”，“还想活下去”，“还要发点议论”。谈到自己的思想时，鲁迅说：“我近来的思想，倒比先前乐观些，并不怎样颓唐。”他还劝别人把身体搞好些，不要在斗争中消沉，“使精神坠落下去，是不好的”。

北京炎热的夏天来到了。鲁迅任教的北京大学和女师大也都放了暑假。但鲁迅不想停止工作去休息，除了继续撰写杂文外，他开始和别人合作翻译荷兰的童话《小约翰》。

鲁迅一向重视儿童教育。他曾说，儿童“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未经生活过的”。为此，他曾不断地批判反动派对儿童的摧残和毒害，曾根据当时的条件为儿童收集较为健康的精神食粮。他翻译《小约翰》非常认真。每天中午，总是冒着炎炎骄阳，夹着一个红黑色格子布的书包，来到中山公园一间红墙小屋里，和合作者一起开始工作。为了译得更准确些，他甚至经常与合作者展开激烈的争论。译得“头昏眼花”、“身上一大片汗”时，“便看看小窗外的日光和绿荫，心绪渐静”，又继续工作。这样辛勤地工作了约有一个月。

《小约翰》草稿译出，已是八月间。这时，千里之外的南方工农革命的好消息象阵阵春风，吹进了云封雾锁的北京。鲁迅受

到了很大的鼓舞。

“我想换一个地方，到南方去工作。”鲁迅对友人这样说。他决定应厦门大学的邀请南下了。

听说鲁迅先生要走，和他结下深厚战斗友谊的女师大学生是多么的依依不舍啊！八月十三日，她们特地为鲁迅开了欢送会。二十二日，是段祺瑞解散女师大一周年，女师大要召开纪念斗争胜利的大会，鲁迅虽已辞掉了教职，但仍去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发表了重要演说。在演说中，他批判了小资产者在革命中的软弱性，同时也表明对于未来、对于前面道路的希望。他说：

“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

“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

“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四天后，鲁迅告别了战斗、生活了十五年的北京，乘上了南下的火车。许广平同行。

第十一章 在 厦 门

座落在闽南海滨的厦门大学，有着一番与古城北京迥然不同的风光：几座花岗石的楼房矗立在海边，校园里到处丛生着生命力强盛的亚热带植物——青翠挺拔的龙舌兰。鲁迅在上海同许广平分手后，于九月四日来到这里，担任文科国文系教授和国学研究院教授。

当时，厦门大学才开办了五年多，教员宿舍还没有完全造好。鲁迅来到后，暂住在生物学院三楼靠海的一个房间里。这座楼房，筑在海滨的小山岗上，四无遮拦。屋外，茫茫的海水连着蓝天，海风卷着涛声日夜轰鸣。鲁迅有时在几个同事的陪同下，来到海滨漫步，他踏着玉屑一般的细沙，远眺南太武山那边天上的红霞，近看嬉戏于波涛之间的白鸥，顺便捡几枚奇丽精巧的贝壳。离此不远，耸立着明末郑成功建筑的城墙，蟠龙似地雄踞在海边；附近是当年的演武场，还有几尊郑成功军队遗留下来的野钢炮，在秋草萋萋的荒地上受着风吹日晒。这些遗迹，比海边的山光水色更使鲁迅不能忘怀。他不时前来凭吊，将思绪引到三百年前那段悲壮的时期，引到三百公里外被帝国主义强盗霸占去的祖国神圣领土台湾……

鲁迅初到厦门，离开了北京那种沉闷的环境，有种耳目一新的感觉。特别是看到报上刊登的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消息，更是振奋异常。九月七日，北伐军攻下了汉口，包围了武昌，鲁迅从报上获悉这消息，不胜欢欣鼓舞；不久，北伐军攻入福建，鲁迅于

九月十四日写信给已到广州的许广平：“此地北伐顺利的消息也甚多，极快人意。”以后每过几天，他都把北伐消息向许广平报告一次。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使鲁迅受到鼓舞。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曾说：“我来厦门，虽是为了暂避军阀官僚‘正人君子’们的迫害。然而小半也在休息几时，及有些准备”。所谓“休息”和“准备”，乃是回顾自己走过的革命路程，清理和解剖自己的思想，总结斗争经验，以便迎接新的、更大的战斗。

九月二十日开学。开学前，群贤楼下右边的布告牌上，贴着一张文科办公室的布告：

“周树人先生，已到校多日，其所担任之《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及《声韵文字训诂研究》三门功课，定于下星期起，开始上课讲授，希各注意，此布。”

同学们看到这布告后，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有些学生，是听说鲁迅要来厦大任教，特地从河南、青岛、南京、上海等地转学过来的，他们更是兴高采烈，觉得果然不虚此行。

鲁迅担任的三门课，原定每周各二小时；后来《训诂研究》没有开，小说史改为三小时。每当鲁迅讲课之前，热情的学生们常先到他的住处，替他拿了粉笔匣，簇拥着他走向课堂。鲁迅的生动讲授，象磁石一样吸引着青年们的心。当时厦门大学学生人数不多，四科十二系共四百三十二人，报名选读鲁迅课的有国文系全部学生，还有一部分英语系、教育系的学生。等到正式开课以后，不仅商科、理科和法科的学生都纷纷赶来听课，连校内的助教和校外的记者、编辑也闻风而至。教室满座了，许多人便倚墙站着听。鲁迅讲课前，先把认真编好的讲义发给学生。讲课时，并不限于讲义的内容，而是围绕一个作家或作品，联系时代背景

旁征博引，详加分析。大家屏息静气地听着鲁迅娓娓而谈，不时被他幽默的语句引得哄堂大笑。

鲁迅的讲课能吸引这么多的人，除了他态度亲切从容，言词简练生动之外，更重要的是思想新颖，分析精辟。当时，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七年多了，但在厦门，旧思想、旧文化的浓云毒雾依然到处弥漫。市里的报纸，大学的刊物，甚至中小学生的作文，一律都用文言。孔家店的幽灵在校内外游荡。厦门大学校长兼国学院院长林文庆，就是个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他曾专门写过《孔教大纲》，鼓吹孔孟之道。在这样的情况下，青年们多么希望有人带领他们冲破这沉闷的空气呵！如今，他们把这番希望寄托在鲁迅身上。

鲁迅在讲授文学史的时候，同封建文人、资产阶级学者尊儒反法的论调针锋相对，对于历史上坚持革新、坚持前进并屡遭儒家中伤咒骂的法家代表人物及其作品，给予高度评价。他称屈原的《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赞李斯的奏议“尚有华辞”，“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誉贾谊和晁错的政论文“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有些在过去文学史著作中几乎被抹煞的法家代表人物，鲁迅甚至用专章加以论述。鲁迅对于编写一部中国文学史是蓄志已久的。尽管厦门大学的图书资料十分缺乏，但他还是着手编了十章，这就是以后整理出版的《汉文学史纲要》。由于鲁迅能从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以严肃的科学态度对待祖国文化遗产，力图找出它的内在规律性，探求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因此，他这部著作中所体现的文学史观，是非常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他的讲课受到青年们的热烈欢迎，也就不奇怪了。

青年们把鲁迅看成引路的导师，他们不满足于光听鲁迅讲课，还希望在鲁迅的支持和指导下开辟新文艺的园地。有一次，

几个青年来到鲁迅的卧室，表明了自己的心愿，鲁迅边听边频频点头：“好的，好的！我一定来帮助你们！”

在鲁迅的帮助下，厦大的学生组织了两个文艺团体，一个取名“泱泱社”，出版《波艇》月刊；一个叫做“鼓浪社”，出版《鼓浪》周刊，附在鼓浪屿的《民钟日报》副刊上发行。鲁迅尽管感到这些学生们的作品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文艺的影响，或“过于颓唐”，或“大言无实”，“恐怕也不见得有什么好结果”，但仍象在北京时一样，怀着培养新一代的可贵热情，帮助青年们审稿、改稿，接洽出版事务。他曾经同一个向他约稿的书店联系，希望能出版青年的文学刊物，可是书店大概觉得无利可图，拒绝了。鲁迅非常气愤，对青年们说：“这种市侩，只要有有利可图，他们会若无其事地厚着脸皮，又来请我写文章；那我只好不客气地说：‘没有什么空闲！’”后来，鲁迅又向上海的北新书店联系，托他们代为印行。十一月间，一本草绿色封面、装帧颇为精美的《波艇》月刊，送到了读者手中。

与青年们在一起，鲁迅感到心情舒畅，但一接触到周围陈腐的空气，却又使鲁迅感到厌恶。

厦门，是帝国主义强迫开辟的“通商口岸”之一。这儿，除了侨商、买办的洋房别墅之外，市区的街道又脏又窄，房屋又矮又破，四郊则是丛丛野草，累累荒塚，野狗在其间自由出没。鲁迅在谈起对厦门的感想时，引用了曾在清末来过这里的荷兰人亨利·包立尔的一句话：“中国全国就是大墓场”。

鲁迅更为厌恶的，是这座城市里流行的金钱至上的哲学。他说：“大概因为和南洋相距太近之故罢，此地实在太斤斤于银钱，‘某人多少钱一月’等等的话，谈话中常听见”。鲁迅虽然月薪较高，生活却很朴素，正象当时一位记者所说的：“没有一点架子，也没有一点派头，也没有一点客气，衣服也随便，说话也不装腔

作势。”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不时遇到一些人的白眼。

有一天，鲁迅拿了厦门大学总务处会计室发给的支票，到市区“集通银行”去支取薪水，他向着柜台里边说：“支款，先生！”

“好的，支票拿来！”柜台里边的人一边说，一边接过支票，不禁狐疑起来。他上上下下打量着鲁迅，心想：一个拿教授工资的人，怎么穿戴是这个样子？莫非是人家丢了支票他捡来冒领？于是就提高了嗓门问道：“你是哪一系的？”

“国文系。”鲁迅回答，又补充说：“或者是，国学研究院吧。”

“请等一下，到会客室坐坐吧！”那人装成彬彬有礼的样子，把鲁迅带到后面一间房子里，并拿了一张当天的《厦声日报》给他看。

鲁迅在会客室拿着报纸看了又看，香烟一支接一支，还是不见人影，正在莫名其妙，忽听得远处断断续续传来了打电话的声音：“喂，喂！你是厦大会计室吗？——你们有没有一位教授名叫周树人的？——唔！是新来的。——唔！就是这样的身材！——唔！穿得太过朴素了！——唔！唔！就给他！马上给，马上给！”那人这才笑容可掬地领鲁迅去办领款手续。

社会上是这样，在号称高等学府的厦门大学里也不例外。校长林文庆，对教员吝啬刻薄，日日希望大家从速做许多工作，发表许多成绩，象养牛为的是每日挤牛乳一般。鲁迅刚到校，他就问著作，问年底有什么东西发表，可是当鲁迅把稿子送去后，却没有下文。后来林文庆在一次会上提出连教学科研用的经费和预算也要打个对折。鲁迅在会上据理力争，林文庆却神气活现地说：“关于这事，是有钱的人，才有发言权。”鲁迅听后非常气愤，当场掏出两个角子“乓”地一声掷在桌上，犀利而幽默地说：“我也有钱，我有发言权。”弄得林文庆啼笑皆非，狼狈不堪。

十月十四日上午，厦大举行纪念周会。对于这种每星期一

次的例行集会，学生们历来不感兴趣。然而这天大家听说鲁迅要来演讲，便争先恐后地拥到群贤楼上的大礼堂里。九时正式开会，照例是林文庆担任主席，照例是大家起立先唱校歌：“自强自强，学海何泱泱！……鹭江深且长，……嗟乎，南方之强！”唱毕，林文庆简单说了几句开场白，便向坐在台上的鲁迅一揖，顿时，礼堂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鲁迅走到讲台边，看了看底下的听众，说：“今天，我的讲题是：《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听到这个题目，会场里立刻活跃起来。

鲁迅说：尊孔，崇儒，读经，复古，可以救中国，这种调子，近来越唱越高了。其实呢，过去凡是主张读经的人，多是别有用心。你们青年学生，多是爱国，想救国的。但今日要救中国，并不在多读中国古书，相反地，我以为暂时还是少读为好。中国古书越多读，越使人思想糊涂，分不清是非。

鲁迅又说：其次，我要劝你们做“好事之徒”。世人对于好事之徒，往往感到不满，认为“好事”二字，好象有“遇事生风”的意思，其实不然。我以为今日的中国，这种“好事之徒”却不妨多，因为社会一切事物，就是要有好事的人，然后才可以推陈出新，发生变革。

鲁迅在又一阵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演讲。

过了不久，鲁迅演讲的纪录稿在《厦大周刊》发表了，但是不见了前半部分，原来林文庆认为前半部分同自己的尊孔主张相悖，干脆把它删掉了。从此，学校当局每次来约鲁迅演讲，他都一概谢绝。他说：“一演说，则与当局者的意见一定相反，真是无聊。”

在厦门大学，除了林文庆之外，“教授”中还有许多无聊的人物。他们不学无术，开口闭口“马丹”、“古貌林”，平时除了玩玩留声机，唱唱昆腔外，就只懂得吃吃喝喝，同银行家吹吹拍拍，一切

“惟校长之喜怒是伺”。十一月十七日在大礼堂开恳亲会，学生指导长林玉霖起而演讲，竟厚着脸皮说道：“‘恳亲’二字，是恳切亲密的意思，我们的老校长好比家长父亲……”鲁迅听后，气得真要立刻跳起来。一位哲学教授起来反驳了指导长几句，马上又有个留学西洋的教授为他辩护道：“在西洋，父子和朋友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倘说谁和谁如父子，也就是谁和谁如朋友的意思。”鲁迅后来说：“这人是西洋留学生，你看他到了西洋一番，竟学得了这大识见。”

其中，鲁迅最讨厌的是那些“现代评论派”的门徒。他们自称只佩服胡适、陈西滢两个人，整天围着权势者打转，到处安插亲信，散布流言，兴风作浪。鲁迅鄙视地称他们为“学者皮而奴才骨”，甚至“连皮也太奴才”了。眼看这类人在厦大飞扬跋扈，鲁迅感到气愤、失望。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以北京为污浊，乃至厦门，现在想来，可谓妄想，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么？”

是的，如果不荡涤整个旧世界的污泥浊水，厦门当然不可能独独“干净”起来。

社会和学校既然如此腐败，周围的一些人又这样可憎，鲁迅除教学和辅导青年外，别的事就不愿多管了。很久以来，他一直渴望能认真、系统地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以便适应斗争的需要和形势的发展。现在相对安静些，“琐事”也比较少，这正是一个学习和思索的好机会。

从九月二十五日起，鲁迅搬到集美楼居住。这座楼很大，楼的前面就是演武场；楼下是阅览室和书库，楼上是装订书刊的场所，有几个房间空着。鲁迅就住在楼上靠西边第二间房子里。房间的北面有两个大窗门，可以遥望南普陀寺；南面有两个大房门，门外走廊上有一排石栏杆。到了夜晚，人去楼空，整座大楼

常常只剩下鲁迅一人，周围一片寂静，除了风声、涛声，只有偶而传来的几声犬吠。鲁迅的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他倚着石栏远望，只见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雾笼罩着一切。记忆的闸门打开了，一幅幅早已随着时光逝去的生活图景在眼前出现了，于是他又继续了《朝花夕拾》的写作，接连写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和《范爱农》等五篇散文。这些散文首尾衔接，前后呼应，相当完整地反映了自己从童年到青年时代的生活历程：童年时期对私塾封建教育的不满，少年时期在沉滞、黑暗的故乡和骗钱害命的庸医周旋，青年时期对改良主义运动的失望，留学日本期间对日本友人的深厚情谊以及对军国主义的痛恨，归国初期亲眼看到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失败以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鲁迅从自己艰苦而曲折的生活道路中，从近代中国历史的急剧演变里，深深感到必须寻找新的革命力量，必须掀起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才能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这几篇回忆性散文，是鲁迅自我解剖的生动记录，其间留下了他不断寻找革命真理的足迹。

在一个深秋的夜晚，鲁迅编完了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二五年的论文和杂文。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的许多白点，是从塚；一粒深黄色的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寺里正在庆祝佛陀诞辰，诵经拜佛，超度亡魂，演傀儡戏的锣鼓声断断续续，间隔中更显得寂静。

看着这些旧稿，回顾一次次的斗争，鲁迅思绪万千。这些杂文，字里行间充满着战斗的呐喊，完全是针对着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发的，因此，很遭到一些“正人君子”的憎恶。鲁迅深深地知道这一点。他提笔写道：

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们却一心一意

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些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给他们说得体面一点，就是敌人罢——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

这番话，生动地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人生观，洋溢着一种不可遏制的战斗激情。

鲁迅说，他现在要印行这些杂文，是为了使喜欢他的作品的读者得到一点鼓舞，同时也是为了使那些憎恶他的文章的人得到一点呕吐，他毫不犹豫地写道：“那些东西因我的文字而呕吐，我也很高兴的”。不过这些以往的战斗，已经“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鲁迅决定把这本集子定名为《坟》——“一面是埋葬，一面也是留恋”。“埋葬”，是批判地认识自己走过的道路，否定思想上夹杂着的那些错误的东西；“留恋”，是珍惜斗争的历史和经验，准备迎向新的战斗。

哪一些可“留恋”，哪一些该“埋葬”，这须通过自我解剖才能明白。因此，在《写在〈坟〉后面》中，鲁迅深沉地说：

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

鲁迅具有可贵的自知之明，他通过自我解剖告诉读者，自己从旧营垒中来，情况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唯其从旧营垒中来，所以“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的思想，我

的心里也常有”，“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特别怕因此而毒害了热情地寻找真理的青年。鲁迅决心摆脱旧文化、旧思想的影响，渴望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但他又说：“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

但是，革命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它有力地推动着鲁迅在寻求革命真理的道路上不断迈进。北伐战争接连取得胜利的消息，促使鲁迅对谁是革命的主力军这个老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鲁迅过去一直把希望寄托在青年知识分子身上。这时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工农群众的力量，更清楚地看到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对他们深感失望。他在一次通讯中说：“我现在对于做文章的青年，实在有些失望；我看有希望的青年，恐怕大抵打仗去了，至于弄弄笔墨的，却还未遇着真有几分为社会的，他们多是挂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反动派一直咒骂劳动人民是“愚人”、“傻子”，自以为是天生的“聪明人”，鲁迅却从大量的亲身体验中得出了结论：“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

十一月二十七日，鲁迅就以“愚人”和“聪明人”为题，到集美学校作了一次演讲。

集美与厦门隔海相望，是著名的侨乡。十一月二十六日晚，集美学校的校长派秘书请鲁迅去演讲。演讲的题目事先并没有规定，但那位秘书带来了校长的一个口信：“校长的意思，是以为学生应该专门埋头读书。”鲁迅当即回答：“那么，我却以为也应该留心世事，和校长的意见正相反，不如不去好罢。”秘书面有难色，急忙改口说道：“不妨，也可以说说。”于是，第二天早晨，鲁迅便乘小汽船到了集美学校。

集美学校的大礼堂里，挤得满满的，全校各部师生员工都来

了。

鲁迅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说：现今世上，聪明人不是很多吗，可是他们不能做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来想去，终于什么也做不成。他们过于思虑个人的利害，过于计较个人的得失。他们想着，想着，有利于自己者才肯做，有利于社会别人者，即使肯做，也常不彻底，不真诚，不负责，以至于败事而无成就，在这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甘愿为群众利益，而放弃了自己的利益；他们甘愿为国家的独立自由，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一种人在所谓“聪明人”的眼里看来，却是傻子。但是，你们要知道：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推动，由傻子去创造，最后是属于傻子的。这些傻子，就是工农群众，就是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中所要扶助的农民和工人。他们是世界的主人，世界是属于他们所有的。

鲁迅的演讲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反响，坐在讲台后面的校长摇头不止，鲁迅演讲刚结束，他就赶忙过来要了鲁迅的演讲稿，准备会后束之高阁，秘不示人。但是，青年学生们却报以一片热烈的掌声，他们决心学习“傻子”，鄙弃“聪明人”。

对工农群众认识的深化，又促使鲁迅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比以往进了一步。十一月十四日，一个风雨之夜，鲁迅为一个年青人翻译的俄国小说集《争自由的波浪》写了《小引》，在这篇《小引》中，他反驳了反动派对工农政权的诬蔑，指出：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贵人自然总要较为苦恼，平民也自然比先前抬了头”。他还认为革命工农大众对敌人的暴力镇压是从敌人那里学来的：“俄皇的皮鞭和绞架，拷问和西伯利亚，是不能造出对于怨敌也极仁爱的人民的。”这种对革命敌人的镇压势在必行，极为重要。鲁迅进而联系实际，希望中国人民从十月革命中吸取经验，“推见将来”，争取祖国的解放。

正当鲁迅越来越瞩目于工农群众的时候，他接到一个通知：厦大学生会创办了一所“平民学校”，邀请他出席开学典礼。这个学校，学生主要是厦大工友的女儿、年轻的工友以及厦大附近一些贫苦失学的青年。教员则是义务的，由厦大的一些学生担任。十二月十二日，学校开学，为了出席这个会议，这一天鲁迅起得特别早，提前到了会。面对着这么多历来被剥夺受教育权利的贫苦工农的孩子，鲁迅觉得有许多话要对他们说，因此，他这次破了在厦门大学不再作演说的例，作了一次热情洋溢的演讲：

你们都是工人、农民的子女，你们因为穷苦，所以失学，所以须到这样的学校来读书。但是你们穷的是金钱，而不是聪明与智慧。你们贫民的子弟一样是聪明的，你们贫民的子女一样是有智慧的。你们能够下决心，你们能够奋斗，一定会成功，一定有前途。没有什么人有这样大的权力：能够叫你们永远被奴役；也没有什么命运会这样注定：要你们一辈子做穷人。

这些感情深沉的话，使二百多个工农学生深为感动。

会上有个留洋的教授，大放厥词，说什么这个学校于贫民有益，就是你们“底下人认识了字，送信不会送错，主人就喜欢他，要用他，有饭吃”等等，鲁迅听了大为生气，便愤然离席。

北伐的消息，也使鲁迅对厦门大学死气沉沉的局面更无法忍受。原先他想在这里工作两年，后来减为一年，最后缩短为一个学期。

鲁迅渴望“到热闹的地方”去，到革命的旋涡中去，积极投入激烈的战斗。一九二六年秋，经过中共两广区委员会的努力，广

州中山大学向鲁迅发来邀请的电报。鲁迅接受了聘请。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去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十二月三十一日，鲁迅正式向学校提出辞职书，辞去一切职务。

鲁迅辞职的消息传出后，学生们立即掀起挽留运动。一月二日，学生自治会派代表会见鲁迅，表示了大家的心愿；后见鲁迅决心已下，就在一月四日下午召开了“厦门大学全体学生送别鲁迅先生大会”。同学们知道鲁迅所以提前离开是由于学校的腐败，他们对此格外感到愤怒，终于掀起了一场改革学校的风潮。一月七日，群贤楼的布告牌上，走廊的石壁上，学校四周的围墙上，到处张贴了要求改革的标语，全体学生罢课，学期考试除鲁迅所讲两门提前考完外，其他各系各门功课一律停止举行。许多学生表示要追随鲁迅而去。林文庆看到风潮越闹越大，就恼羞成怒，表面上一再为鲁迅饯行，背后却攻击鲁迅是“放火者”，到厦门来是为了“捣乱”。林文庆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攻倒鲁迅，没想到鲁迅坚定地回答道：“放火者就放火者吧。”

离开厦门前，鲁迅特意坐在一个水泥坟墓的祭桌上拍了一张照片，四周是从生的龙舌兰。这张照片和杂文集《坟》的名字一样，表示向过去告别。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上午，鲁迅在许多师生的陪伴下离开厦大。次日下午，他与送行者一一握别，带着投入新的战斗的革命豪情，也带着正在逐步激化，但尚未彻底解决的一系列深刻的思想矛盾，乘“苏州”号海轮前往广州。

第十二章 伟大的飞跃

“苏州”轮在辽阔的海面上急急地行驶。

这次与鲁迅同行的，有三个要转学到中山大学去的广东籍学生。开船不久，就发现一个鬼鬼祟祟的人老是盯在后面。鲁迅判断：“此人大概是厦大当局所派，探听消息的，因为那边的风潮未平，他怕我帮助学生，在广州活动。”此人谬托知己，硬来攀附，鲁迅当面加以拒斥，但他总是嘻皮笑脸，一直跟着。于是鲁迅通知三个广东籍学生注意防备，使那人毫无所获。

与鲁迅同房间的，是一个除丝绸之外毫无所知的丝绸商人。鲁迅与他无话可谈，就一个人走到甲板上去看海。

海是美丽的。船的一边是一片汪洋，一边则时时闪过一些岛屿。因为没有风浪，就如同坐在内河的船上一样平静。到了夜间，海上的月色是这样皎洁，波面映出一大片银鳞，闪烁摇动；此外是碧玉一般的海水，看去仿佛很温柔。

鲁迅凭栏远眺，思绪翻卷，在密探的“护送”下离开了纷扰的厦门，广州将是什么样的呢？这，他还需要观察，还需要思索。但有一点可以断定，生活的波浪决不会象眼前的海水那样平静。当夜，他坐在船舱里写道：“陆上的风涛要比这险恶得多。”

是的，陆上，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风涛在等待着鲁迅。

自从一九二六年下半年浩浩荡荡的北伐队伍从广州出发以后，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和各地的工人运动怒潮滚滚，奔泻千里。资产阶级恐慌了，动摇了。伪装革命的蒋介石虽然一时

还不敢撕去假面具，但是继“中山舰事件”和“党务整理案”以后，却不断唆使他的爪牙，攻击中国共产党，分裂工农运动，故意制造事端，一步步露出了他的狰狞面目。被称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也正在改变颜色。

在鲁迅即将要去任教的中山大学，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斗争也十分激烈。把持着学校大权的戴季陶、朱家骅等国民党右派，妄图按照他们的意志来“改造”这所有着几百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学校。但是，广大青年学生都团结在党的周围。迫于当时的形势，戴季陶、朱家骅他们只得唱着“左”的高调，竭力装出一副“革命”的姿态，以欺骗群众。现在鲁迅要到这里来了，他们觉得又有了一个欺骗青年的机会，因此急着要做拉拢工作。正当鲁迅航行在海上的时候，他们又是准备发表捧场文章，又是筹划“欢迎”骗剧，忙成了一团！

在同一时刻，广大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兴奋地等待着鲁迅的到来。中山大学对面不远有一排普通的楼房，这是中共两广区委员会的秘密机关。区委书记陈延年同志在这里召集了中山大学的共产党员毕磊等同志在研究欢迎鲁迅的工作。陈延年同志对鲁迅自“五四”以来的言论、行动，特别是“三·一八”前后的斗争作了分析和估价。他认为：鲁迅跟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在前进着，并且对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及其走狗一直在进行着不调和的斗争。陈延年同志要求大家：“鲁迅抵粤后，你们应当迅速帮助他了解这里的情况。当鲁迅对局势有所了解以后，他是能够决定何去何从的！”最后，他还对毕磊说：“你要陪着鲁迅到各处走走看看。他喜欢青年人，你们去的时候要活泼一点。”

一月十八日午后，“苏州”轮在蒙蒙细雨中抵达广州。鲁迅在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就搬进中山大学，住在处于学校中心的一个通称“大钟楼”的楼上。

这时学校还没有正式开学，他可以经常到各处走走。他游览了幽静的北郊，参观了广州一年一度的花市，也在蔓草和荆棘中登临过越秀山。在兴致勃勃地领略南国自然风光的同时，他更是敏锐、深刻地观察了广州的政治气候。

广州，鲁迅曾热切向往过的广州，已不如想象中那样生气勃勃、轰轰烈烈了。虽然街头还贴着不少革命标语，有时还能看见工人纠察队雄赳赳地走过，但是，国共合作的裂痕已经出现，这个“革命后方”的反动势力正在逐渐抬头。诬蔑共产党的谣言时隐时现，破坏工农运动的挑衅事件层出不穷。甚至连广州公安局也颁布了限制工人的反动命令。越秀山头的乌云越压越低，珠江岸边的火药味已经相当浓烈了。

鲁迅所关心的广州文艺界更是沉寂。郭沫若已随师北伐，创造社的其他人也先后离开，原先准备与创造社联合起来结成一条战线的愿望就落空了。

到书店一看，景象也很寥落。宣传革命的新书并不多，相反，替北伐战争的对象——北洋军阀卖力的《现代评论》，在这里竟很畅销……

看到这一切，鲁迅在到达广州后不几天就得到一个初步的印象：广州是“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比起旧的社会，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形，并不见得有二样”。

住进大钟楼的第六天，一月二十四日，正在郊外别墅度假的朱家骅赶来对鲁迅大献殷勤。朱家骅，“五四”时期曾混迹于当时的一些学生运动，鲁迅在北大任教时早就和他相识。但这时，他已是国民党右派所赏识的人物，日夜奔走于豪门之间。因此，虽然可以说是“故人相见”，鲁迅的态度却相当冷淡。朱家骅提出学校要为鲁迅开欢迎大会，鲁迅拒绝了。

就在朱家骅访问鲁迅的当天下午，三个青年走进了鲁迅的

房间。其中的一个短小精悍，朴实沉着，他就是中共中山大学支部派来的共产党员毕磊。鲁迅端出厦门带来的点心，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谈了一会，毕磊就请鲁迅第二天去参加一个欢迎大会。

“不要欢迎了，学校要欢迎也回绝了。”鲁迅说。

毕磊告诉鲁迅，这次欢迎会由学生会出面，是青年学生自己组织的，希望他一定去参加。

出自广大青年学生心底的要求，鲁迅怎么能够拒绝呢？他终于同意了。

第二天，欢迎会在中山大学最大的礼堂里召开。学校还没有开学，平时校园里很少有人，总是一片宁静。但是，今天学生们一得到召开这个欢迎会的消息，早就纷纷赶来了。礼堂的楼上楼下，连过道的窗口上都挤满了人。当时学校中有一个直接受国民党右派操纵的反动学生组织，叫“树的党”，中共中山大学支部为了防止他们捣乱，还派了专人维持会场秩序。

鲁迅由毕磊陪同，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中走进了会场。

朱家骅也来了，原来他自己组织的“欢迎会”被鲁迅回绝以后，就想方设法钻到这里来混水摸鱼。

会议刚开始不久，朱家骅就以中山大学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乘机上台讲话，一副虚情假意，口口声声说鲁迅是“革命家”，是“战士”……

鲁迅对这种捧场十分反感，他立即当众声明说：

“大家很热忱，其实我是没有什么值得欢迎的。朱先生说我是‘革命家’，我这个人有什么‘革命’？我不是什么‘战士’和‘革命家’。朱先生说的那一套我不承认。”

鲁迅十分幽默地叙述了过去几年的经历，掷还了朱家骅送来的一顶顶纸糊的桂冠，然后话锋一转，顺着“革命”二字发挥下

去了：

“我在厦门时听说广东是‘革命策源地’，是很革命的地方，‘赤化’了，‘红’得很，既然如此，我很想来看看，看看广州的革命究竟怎么样？‘红’得怎么样？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

礼堂里一片静寂，大家等待着鲁迅的答案。

“跑来一看，果然是‘革命’了！满街红标语——红布标语中还有用白粉写的字——‘红中夹白’！”

“红中夹白”！这是对当时广州政治形势的多么准确的比喻，多么清醒的认识！

“我对这种革命真有点害怕！”鲁迅补充了一句。

礼堂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就这样，鲁迅从一踏上广州的土地，便敏感到革命潜伏着的危机，因而对某些国民党新贵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鲁迅住的“大钟楼”，据学校当局说，是全校最优待的住所，非“主任”之流是不准住的。可是就在这“最优待的住所”里，每夜有十多只至二十只老鼠纵横驰骋，使鲁迅很难入睡。而到了白天，他还要在这里对付另外一群“狐鼠”：自住进来以后，几乎天天有人提着大包小包、红红绿绿的礼品，来“表示敬意”。鲁迅的回答常常是这么一句：“立即拿回去！”不在学校露面的戴季陶，也送来了邀请鲁迅赴宴的请帖。戴季陶其人，鲁迅是有所了解的。就是这个人，在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曾先后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公开宣传孔孟之道是“国家的道德”，并以此为武器，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形成了反动透顶的所谓“戴季陶主义”。当时，他虽然挂着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长的招牌，实际上却整天在为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四出奔波。鲁迅怎么会到他的官邸去参加宴会！但

是，紧接着，陈公博、甘乃光、丁惟汾、孔祥熙等国民党老爷的请帖也象雪片一般飘来了。鲁迅同他们素不相识，现在竟如此大献殷勤，从这一张张色彩斑斓的纸片上，他进一步“感到形势是另有缘故”。到后来，这些纸片在桌上实在积得太多了，他干脆把它们一张一张插在收发处的信插内，上面贴着一张纸条，用浓墨写着四个大字：“概不赴宴”！

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意愿相反，鲁迅与共产党人的关系却日益密切。毕磊多次受党的委托，拿了《向导》、《人民周刊》、《少年先锋》等党团刊物送交鲁迅。鲁迅一见毕磊来到，总是非常愉快，两人经常促膝谈心，有时甚至谈到深夜。要是星期天，他们还会一起到书店里去看看，到花园里坐坐。毕磊向鲁迅介绍了党对目前形势的一系列看法。蒋介石集团背弃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破坏国共合作，破坏工农革命的种种迹象，鲁迅是耳闻目睹的，毕磊的分析，鲁迅觉得明晰而精当。听毕磊说完，鲁迅也乐意谈谈自己的看法，并把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拉拢他的种种丑剧和他的态度告诉毕磊。这种真实而生动的故事，常常引得这位平口不太爱说笑的年轻共产党员也禁不住笑出声来。一九二七年三月，通过毕磊，鲁迅还秘密地来到中共两广区委，和陈延年同志直接见了一次面，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以后，尽管他教育工作极其繁忙，还是花费很大的精力来关心党支部支持出版的刊物、壁报，甚至每月捐助经费。

鲁迅在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又是全校唯一的正教授。他在中文系讲授的课程是：“文艺论”、“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他博大精深而又生动风趣的讲解，象磁石一样地吸引着青年学生。

一九二七年春天的政治形势真是瞬息万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激烈的斗争展开了：盘踞在南昌的蒋介石，天天与帝

国主义买办走狗、北洋军阀的官僚政客策划着叛卖革命的阴谋。他先亲自派出戴季陶潜赴日本，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接着，英、美帝国主义的代表、上海的大买办虞洽卿也以“反共灭共为条件”来与蒋作交易。南昌的阴风吹遍各地，广州街头，也已隐伏着凛凛杀机。广州国民党报刊上开始用醒目的大字刊登出胡编乱造的所谓“退出共产党声明”，扬言要共产党“气死”。鲁迅的处境也不一样了，不久前还在为他大唱“赞美词”的报刊，如今却开始对他发起了攻击……

广州的政治风向，连北洋军阀的走狗，“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们也嗅出来了。他们纷纷抛弃了厦门大学“山河永固”的饭碗，或者舍弃了北京“公理正义的栈房”的东吉祥胡同，于是乎南下、南下、南下，跑到青天白日旗帜下来“服务”了。

这一切，鲁迅都看在眼里。他总是利用演讲的机会，公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向那些沉醉在革命口号中的天真青年敲起了一阵阵警钟。他向广州青年指出：广州可以做“革命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形形色色的投机分子混入革命，并非是革命的“弘通”，而是革命的“败坏”。

任何反动派要搞反革命政变，总要制造复辟倒退的舆论。当时，伴随着国民党右派的霍霍磨刀声，孔孟之道的霉腐气息也越来越浓重。不仅封建遗老遗少的尊孔活动日渐猖獗，而且那些还口唱着“革命”高调的人们也步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之后尘，热衷于孔孟之道的宣传，甚至连他们的后台帝国主义分子也对此格外热心起来。鲁迅根据长期的斗争经验，已惯于从孔孟之道的毒雾中来辨别政治气候，惯于从反动派对孔孟之道的热衷程度来分析和揭露他们的反革命祸心。因此，二月间，他应香港青年会之邀到香港去了一次，在那里一连作了两个反孔演说：《无声的中国》、《老调子已经唱完》。他揭穿了在中国

“最有权势”的帝国主义者和“接近他们”的一群中国人的尊孔阴谋，认为他们的目的是使中国人民受更多的苦，做“下等奴才”，直至中国灭亡。而他们手上的险恶武器孔孟之道，则是使人“觉不出这致死的毛病来”的“软刀子”。因此，他大声号召青年们抛弃“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的“老调子”，不再说孔孟之流的话，“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

鲁迅这次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赴港演说，使人民和敌人都很震动。在去港的船上，有一位广东船员认出了鲁迅，就很担心他会遭到反动派的迫害。这位船员觉得，鲁迅如在广东遭到不测，会使广东人民很难过。于是他热情地帮鲁迅筹划：如被禁止上陆时如何脱身，到港时如何避免逮捕，住在什么地方为好，……无所畏惧的鲁迅感到船员有点过于紧张，但还是深深地感激这位热心人。抵港后，反动派虽然不敢直接迫害鲁迅，但鲁迅得悉，在他来之前，演讲会的主持人就遭到了干涉，后来又有一些坏人来索取入场券，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去听讲。演讲之后，香港各报又“奉令”不准刊载讲稿。但尽管阻力重重，鲁迅还是对着济济一堂的青年群众胜利地完成了两次演讲，二月二十日回到广州。

返回广州后，三月二十九日黄花节那天，鲁迅又到岭南大学作了一次演讲。鲁迅在演讲中提醒广大青年，革命还远未成功，要警惕那些攀折革命之花、摘食革命果实的人们！

就在黄花节这天的下午，鲁迅出于对校内国民党右派和“现代评论派”“正人君子”们的厌恶和憎恨，搬出了大钟楼，和老朋友许寿裳、助教许广平一起移居到了广州东堤的白云楼中。

其时，已是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的前夕。蒋介石钻到上海以后，一面假惺惺地派了军乐队，吹吹打打地给上海工人阶级赠送写有“共同奋斗”字样的锦旗，一面却在暗中准备篡政夺权，形

势已经愈来愈紧张了。

四月八日，鲁迅在共产党人应修人同志的陪同下，又应邀到黄埔军官学校作了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著名演讲。在演讲中，他精辟地阐述了革命与文学的关系，热情地歌颂了革命暴力的巨大作用。他说，对于手握屠刀的反动派，如果我们“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我呢，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这是因为，“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同时，鲁迅还强调了做革命人的重要性：“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这些话，已闪耀着历史唯物论的熠熠光芒，体现了鲁迅对这些问题的崭新认识。

近来，有一个问题一直在鲁迅心中翻腾。这是由沪、宁克复引起的。

上个月二十二日，上海工人在周恩来同志等人领导下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占领了上海，二十四日，北伐军又攻克了南京。消息传来，广州各阶层群众欢欣鼓舞，集会、游行连续不断。而这时的国民党右派，尽管已经满腹杀机，摆好了随时向革命力量猛扑过来的架势，但他们暂时还没有发作。因此，广州全城笼罩在一片胜利的气氛中。

鲁迅敏锐地觉得这种气氛不怎么对头。对沪、宁的克复，鲁迅内心自然也感到高兴。对于象他这样从青年时期起就投身于革命事业的老战士来说，一旦听到这样的喜讯，怎能不兴奋呢！但也正是由于鲁迅长期战斗在反动势力猖獗的年代，经受过无数的挫折，尝到过胜利果实得而复失的痛苦，看到过敌人不断变换的脸相，因此他又对革命的前途怀着深深的忧虑：革命是在前进，但其中是不是潜伏着危机？敌人是遭到了失败，但他们会不

会改变手法破坏革命？庆祝胜利虽属必要，但因此而产生陶醉和骄傲，会不会思想麻痹、肌肉松懈，给敌人以可乘之机？答案很清楚：在黑暗的区域里，反革命工作正在默默地进行，随着革命势力的扩大，连一些最顽固的敌人也都变换手法，正在乘机钻了进来。“革命策源地”存在着深刻的危机！

四月十日，鲁迅决定写一篇杂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把自己的担心和忧虑告诉读者。也许是太激动的缘故吧，当他一拿起笔来，就觉得思绪万千，有许多或远或近或断或续的画面接连掠过脑海，他忽而想起十六年前辛亥革命时曾经光复过南京，还给捐躯沙场的战士立了一块纪念碑，但到民国二年以后，便被北洋军阀张勋毁掉了。忽而又想到共产党人李大钊在北京被捕，不知道现在究竟怎样了，……是啊，过去的革命有失败的教训，必须吸取；如今的胜利浸透着烈士的鲜血，必须捍卫。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目光停留于一时一地的胜利，必须继续痛打“落水狗”。鲁迅愈来愈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郑重地提笔写道：

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
进击的人们的多少。

怎样才能“永远进击”，夺取“最后的胜利”？鲁迅的脑际浮现出一个伟大的形象：列宁！

鲁迅结合革命实际学习列宁著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革命每前进一步，他就对列宁的论述有一番新的体会。前些日子鲁迅从毕磊手中得到过许多本《少年先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会的机关刊物，曾经认真阅读过，特别是该刊第八期上的一段列宁语录使鲁迅为之沉思良久，如今，在中国革命面临一个新的转折点时，他更觉得这段语录的份量，觉得它犹如一道

强烈的光束照亮了自己经过长期探索才体察到的斗争经验，讲出了自己长期蕴积胸中、想讲但又不能透辟地加以论述的话，此刻，鲁迅怀着一种不可遏制的激情引用了这段语录：

第一要事是，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自高自满；第二要事是，要巩固我们的胜利，使他长久是属于我们的；第三要事是，准备消灭敌人，因为现在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注）

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中，鲁迅一连四次提到列宁，一连用了三个“进击”。列宁就是领导千百万革命群众向反动势力发起进击的伟大革命导师，“进击”就是鲁迅此时全部注意力的焦点。

果然就在鲁迅写完这篇文章的两天以后，黄浦江畔响起了刺耳的枪声。蒋介石终于在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公开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和上海工人阶级举起了屠刀。由于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叛卖，革命者的鲜血，在自己用武装起义夺来的城市中遍地流淌！

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革命进入到了一个紧急关头。

带着血腥味的反革命逆风很快就刮到了广州，也刮到了中山大学。

四月十五日清晨，天刚蒙蒙亮，许广平家里的人跑到白云楼，找到许广平，气喘吁吁地说：“不好了，中山大学贴满了标语，

注：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一年九月版《斯大林论列宁》一书，此处现在的译文为：“第一件事就是不要陶醉于胜利，不要骄傲；第二件事就是要巩固自己的胜利；第三件事就是要彻底消灭敌人，因为敌人只是被打败了，但是还远没有被彻底消灭。”

也有牵涉到老周(指鲁迅)的,叫他快逃走吧!”

许广平马上跑到楼下,见街道上有许多军队,正在集合,听候调动。河对岸店铺的楼上,是工会办公处,现在透过阴郁的晨雾看过去,人影晃动,一片纷乱,似乎在查抄。

许广平知道事情不好,回来敲开鲁迅的房门,把一切告诉了他。

这天,全市电话不通,交通断绝,商店关闭,枪声不断。广州公安局长还发出了这样的布告:“奉总司令(指蒋介石)训令,迅将共产党分子全行逮捕,并将各工友纠察队勒令解散。”毫不掩饰地道出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

于是,令人气愤的消息一个个地传来:

黄埔军校的武装被解除!

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被解除!

中山大学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一批批遭到逮捕!

整个上午,鲁迅是在极度的愤怒和焦虑中度过的。

下午,他接到了参加各主任紧急会议的通知。屋外哗哗地下起了倾盆大雨,为了到会上去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鲁迅扑进风里、雨里,急急地朝中山大学走去。

学校里,原来那些“红底白字”的革命标语一夜之间全被反动标语覆盖住了。会议室里,更是一片沉闷的气氛。学校当局今天完全把自己的假面具撕了下来。不久前,他们还故作激烈地公开宣布要带领着学生“往左走”、“往左走”,现在,却在破口大骂共产党。

鲁迅非常愤怒,他站起来,厉声责问他们有什么理由要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但他们竟公然说:中山大学是“党”校(即国民党实行法西斯独裁的学校),凡在这里做事的人,都应该服

从国民党的决定，不能再有异言。

面对着这种气势汹汹的反革命淫威，有少数几个教授原先还准备响应鲁迅的话，现在也不吭声了。但是，鲁迅又一次站了起来，义愤填膺地据理力争，坚持营救学生。

早就下了反共决心的反动派，怎么会让步呢？营救学生的行动没有效果。街上，囚车还在飞驰；学校里，还在继续搜捕着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鲁迅逼视着坐在对面的反动家伙，就象一下子终于看透了他们反革命的五脏六腑。满腔的怒火在胸中燃烧，他因此辞掉了自己在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阴谋表示了最强烈的抗议！

回到白云楼，鲁迅脸色严峻，一语不发，心情非常沉重。等待着消息的许寿裳和许广平急切地向他询问营救学生的情况，他把经过情况和自己辞职的决定一一向他们细说了，许寿裳和许广平立即决定也采取同一行动，从此不再回中山大学上课。

这天，鲁迅连晚饭也吃不下去。

很快，报上就登出了这样的消息：

“是日共捕共产党分子二千余人之多。”

在中大“捕获”的名单里，有毕磊的名字。

对于毕磊同志的被捕，鲁迅非常悲痛。一连几个晚上，他都失眠了。他在许寿裳面前多次谈起这个瘦小精悍、头脑清晰的湖南青年，并满怀深情地感叹道：“常常来谈天的，而今不来了。”

过了几天，戴季陶和朱家骅这两个反动家伙出现在被捕的中山大学学生面前，阴险地以学校领导的身分诱劝被捕学生“自首”。

突然，一个瘦小精悍的青年从被捕学生的队伍中挺身而出，操着洪亮的湖南口音，慷慨激昂地揭露和斥责国民党反动派卑鄙无耻、叛变革命的罪行。说完，他还英勇地带领大家高呼口

号。

“共产党万岁！”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这个青年，就是毕磊。

戴季陶、朱家骅又气又恨，命令把毕磊拉出来，当场用铁链锁住，又用刺刀戳得他体无完肤，推推搡搡地拖走了。

残忍的国民党反动派把这位英勇的共产党员装入麻袋，和其他几百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起，活活地丢到珠江里……

毕磊同志的壮烈牺牲，深深地刺激了鲁迅。很长时间以后，鲁迅还怀着难以隐忍的悲痛对人说起：“毕磊死了，是被铁链锁住了弄死的……”

露出了毒牙的反动派还想笼络人心。他们怕鲁迅的辞职会引起大批学生离校，因此就千方百计地加以“挽留”。先是朱家骅亲自出面，几次跑到白云楼来“探访”，后来又派什么“文科学学生代表”、“学生会代表”来“面致慰留信”，最后，还派学校事务管理处主任两次持所谓中山大学委员会的函件，劝鲁迅留任，“早日返校共策进行”云云。随同这些“慰留信”，还送来了鲁迅已经退回的聘书。

对于朱家骅和各种“代表”，鲁迅或是当面回绝，没有商量的余地；或是干脆拒之门外，不愿接见。对于“慰留信”和聘书，第一次送来，鲁迅的回答是“退回”；第二次送来，他的回答又是“退回”；第三次送来，他的回答还是“退回”！

于是，鲁迅与中山大学断绝了来往。他有多少愤怒和仇恨需要倾吐，但在当时，哪有说话的地方？他只得强捺着心头的怒火，在白云楼里编编《野草》、《朝花夕拾》那些旧稿。

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几乎天天不断。在中山大学，许许多多曾热烈地欢迎过鲁迅，认真地听过鲁迅讲课的青年学生都遭

到了迫害和虐杀！

令人发指的消息象一条毒蛇在隐隐地啮咬着鲁迅的心，猛烈地震撼着他的思想。长期来，他把教育和唤醒青年起来反抗黑暗统治作为自己的使命，今天，他怀疑自己的战斗效果了。一年前，段祺瑞政府在北京枪杀了青年学生，鲁迅曾提出了愤怒的抗议，但在这一年里，他“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而“屠伯们”却“逍遥复逍遥”！只号召反抗而不指出革命的前途，仅仅把青年的脑子和感觉弄清了、弄敏了，而又不知道夺取胜利的道路该怎么走，那末，等待着他们的还不是死亡，还不是被送到吃人的筵宴上去！在吃人者的眼里，这些敏感的青年就如鲜活的“醉虾”，吃起来反而尤其畅快。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甚至悲痛地感到，自己也在帮着排吃人的筵宴。

问题究竟在哪里？极度的悲愤和深沉的苦闷，在鲁迅心中交织起来。几年来，由于在斗争实践中不断解剖自己，他的思想已有一种明显的“变迁”，尤其是离开厦门的时候，这种“变迁”就更大一些。但是根本的思想矛盾没有解决，一遇实际，还常常碰壁。例如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这次叛变，富有斗争经验的鲁迅虽有一些预料，也作过不少斗争，但当事变真正发生的时候，其惨酷的程度又超过了最坏的估计，超过了他过去的思想所能接受的范围。他曾说，当时，残酷的现实竟使自己有点“目瞪口呆”，深有被“从梦境放逐”的感觉。

四月二十六日，他在为自己的散文诗集《野草》所写的《题辞》中说，在这“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自己“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他“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对于向自己旧的生命告别而感到“坦然，欣然”。但是，“新的生命”该是什么，他心中还很不明确。几天以后，他为自己的回忆散文集《朝花夕拾》作了一篇《小引》，从中透露了当时纷扰的心情：“目前是这么离

奇，心里是这么芜杂”；而“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或芜杂的文章”。

“离奇”的社会现象需要得到合理的解释，“芜杂”的心绪必须来一番彻底的整理。鲁迅进一步感到了自我解剖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他觉得应该进一步将自己“诊察”一番，寻出自己的“真症候”。

刚来广州时，由于忙，鲁迅总叹息自己连想想的工夫也没有，现在，正是细细想一想的时候。这时，同住在一起的老友许寿裳已于六月初离开广州，白云楼显得更加寂寞、冷清。广州的天气热得很早，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从西窗望出去，时而是炎热的阳光，时而是如绳的暴雨，前面的小港中漂泊着一只只破旧的帆船，渔家的哀歌随风消失在苍茫的远处……

眼前的景象，自己的境遇，使鲁迅陷入了深深的思索。鲁迅想起了自己走过来的整个战斗历程，为什么自己的努力反而得到这样的效果？他又一次重新审视自己曾多次怀疑过、但还没有根本抛弃的思想武器——进化论。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已把鲁迅的眼睛冲刷得更加明亮，他终于看出了进化论的症结所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鲁迅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世界就是如此进化着；总是抽象地觉得杀人的大概是老年，这种老年死去了，中国就会有生气，革命的前途也大可乐观。然而，事实撞碎了这种看法。北京、厦门那些恶少，尤其是中山大学的“树的党”分子和其他反动学生从反面教育了鲁迅。他们也是青年，但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反动手段丝毫不比反革命的壮年和老年差。事实证明进化论不能正确地解释社会现象！鲁迅说，他的思路因此轰毁，开始确信：在阶级社会里，人是“受本阶级意识的支配”的。离开了阶级斗争，便谈不到革命，谈不到发展，谈不到前进！

正当鲁迅在这样进行自我解剖的时候，政治形势还在继续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四·一二”以后不久，蒋介石反动派在革命者的血泊中成立了反动的南京“国民政府”，从此，全国范围内的屠杀就愈加疯狂了。广州的屠杀也在进行着，“四·一五”以后不多时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竟达二千一百多人！在武汉，打着“左派”旗号的大资产阶级代表汪精卫，一边装模作样地“声讨”蒋介石，一边也渐渐露出反革命的原形，于七月十五日公开宣布反共——至此，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终于失败了。

随着政治气候的突变，围攻鲁迅的黑浪也在广州乘势泛滥起来。许多鹰犬借探访、研究、请教之名，窥伺在鲁迅周围；过去曾请他作序的书，也借故取回，不要他作序了；曾请他题签的刊物，也悄悄换掉了；有的报纸竭力不使“鲁迅”的名字出现；有的报刊还攻击鲁迅“特长即在他的尖锐的笔调，此外别无可称”；有的更是捏造他逃到还未“清党”的汉口去了，意在告发鲁迅是“共产党”。甚至连跟着鲁迅同来广州的几个学生，也因鲁迅而找不到学校读书了。

面对着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压迫，鲁迅毫不畏惧地进行了坚决而巧妙的斗争。七月间，他曾应邀到广州知用中学作了题为《读书杂谈》的讲演。与中学生谈读书，看来十分普通，但鲁迅却另寓深意。他号召青年不要害怕空前激烈的斗争而躲进书斋，“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他鼓励青年去勇敢地读一读社会斗争“这一部活书”，而不要上反动派的当，做一口听凭摆布的活“书橱”。这些话，说明鲁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与反动派争夺青年的斗争继续了下去。同一个月，广州市教育局也来“邀请”鲁迅了，说是要他到广州暑期学术演讲会去演讲，妄图从中找到“过失”进行迫害。鲁迅迎刃而上，坦然应“邀”，

到会作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在这个初看是专谈文学史的学术演讲中，鲁迅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论述了阶级斗争与文学现象的关系，高度评价了魏晋时代的法家人物曹操：“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同时，鲁迅以古例今，用魏晋时代的阶级斗争历史影射和抨击了以“巧取豪夺”的手法篡权杀人的蒋介石反动派。他在酷热的天气中挥汗讲完了这个专题，反动的广州市教育局立即索取了他的讲稿，但找不出什么明显的“把柄”，也就奈何他不得。

然而，一面是坚持战斗，一面他也更进一步感觉到：要彻底战胜这些麇集在“青天白日”旗下，一时显得“浩浩荡荡”的阶级敌人，孤军奋战显然是不行的。鲁迅最终地把信仰和希望倾注到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身上。

几个月来，他经常在心底深深地悼念着毕磊和其他牺牲了的共产党人。在深沉的悲痛中，鲁迅把自己和共产党人作了这么一个严峻的对比：在这次屠杀中，为什么自己虽被围攻而没有生命危险，共产党人却“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这是因为，他们是实地的革命者，而自己写的文章，倒如一箭之入大海一样。鲁迅想，他们的主张和行动远比自己的有实效，他们，只有他们，使反动派真正害怕了。

正是怀着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感情，鲁迅以凌厉的笔锋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他冒着生命危险写下了《谈“激烈”》、《扣丝杂感》、《可恶罪》、《小杂感》等直接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斗文章，揭露了蒋介石一伙刽子手的真面目，维妙维肖地画出了他们的反革命两面派嘴脸，提醒人们注意“防被欺”。鲁迅还指出，反动派以“凡为当局所‘诛’者皆有‘罪’”的“莫须有”罪名杀了大批革命者，其实，他们“法律上的许多罪名，

都是花言巧语，只消以一语包括之，曰：可恶罪。”他们认为“可恶”，便可肆意杀戮。在这里，鲁迅把国民党反动派为屠杀共产党人所制造的种种“理由”，全部戳穿了。对于当年“效忠”于北洋军阀，现在又摇身一变，在“青天白日”旗下起劲反共的“正人君子”们，鲁迅直截了当地喝问他们：“接受了新的战胜者的津贴没有？”

这些战斗檄文，已初步地体现了他新的思想高度，反映了他自我解剖的思想成果，已清楚地表明鲁迅正是在反动派的反共高潮中，自觉地、勇敢地把命运与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紧紧地联在一起了。

当时，鲁迅也很想更多地了解一些全国各地阶级斗争的形势，但很困难。广州反动当局严密地封锁着各种消息。无论杂志书籍，无论中文外文，凡有涉及“火”、“赤”、“烈”等字样的，一律查扣。甚至在杂志里有一篇旧俄时代的翻译小说，也因一个“俄”字而被没收。有一个邮局因为扣下的刊物太多，无处存放了，一律焚毁。鲁迅订阅的杂志，友人送给他的书籍，也大多在扣留之列，很少能收到。广州几乎成了一个“沙漠”。在鲁迅身边，有的只是几个恶意的批评家还在竭力搜索他的“坏处”，以便攻击，但正如鲁迅所说，他们“都寻不出我的真症候”。

有一次，他好容易收到了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一期《北新》周刊。翻开一看，其中有一篇时有恒写的杂感《这时节》，对鲁迅的沉默表示“怅惘”。这篇文章回顾了鲁迅“五四”时期的战斗业绩，接着就说：“我们还是请求于鲁迅先生来亲自出马，对现社会下攻击”，“因为救救孩子要紧呀”。

这种呼声表明：在政治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时刻，过去曾从鲁迅这里获取过思想力量的许多青年，正期待着鲁迅继续带领他们前进。

鲁迅一段时期来较少发议论，较少写文章，倒不是因为忙，连写字的工夫都没有，而是在进行着紧张的自我解剖。期待着鲁迅的读者们哪里会知道：平静的表面下正澎湃着汹涌的思想激流！现在，自我解剖已有了初步的成果，他决定把这个结果公开出来，回答朋友们，也回答窥伺在四周的敌人。

因此，一九二七年九月四日，正当腥风血雨笼罩着祖国大地，而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在重新集结力量准备新的战斗的时刻，伟大的革命者鲁迅以通信的形式，写下了《答有恒先生》这一篇重要文章。

鲁迅一开头就写道，在这封信里，要“说一两种我自己已经诊察明白的”思想。他叙述了在国民党叛变革命以后，对自己过去战斗道路和斗争效果的重新认识，对自己的思想武器——进化论的重新认识，对阶级敌人的重新认识，特别是对革命的领导力量——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重新认识。

“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鲁迅写道。他以异常坦率的胸怀，深切感人的笔触，宣布了自己旧的思想武器已经无效，而共产党人的主张行动才真正“见效”。时有恒不是希望鲁迅针对眼前的现实再象“五四”时期一样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吗？鲁迅非常诚恳地回答他，在激烈的阶级斗争面前，“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

讲完了这一些，他说：

上面的说话中，我并不含有谦虚，我知道我自己，
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

不留情面地解剖自己——这正是一切革命者不断前进的内

在动力，也是鲁迅能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迈出新的步伐的根本原因。“五四”以后，为了探求前进的道路，为了在与形形色色的敌人的搏斗中焕发出更大的战斗力，他曾多少次地整理和解剖过自己的思想！在黄沙蔽天的北京，面对着新文化运动的急剧分化，他曾深感自己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恐怕传染给别人”而急于“想除掉他”；在寂寞的厦门海边，为了使自己跟上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步伐，他也曾以无情面地解剖自己来将过去生活中的“陈迹”埋葬。就这样，不断解剖，不断前进，不断磨砺着手中的武器，不断获取战斗的动力，不断排除着旧思想的杂质，不断积累着新思想的因素。终于，他的思想达到了《答有恒先生》所表述的高度。这篇文章表明：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空前激烈的阶级斗争现实面前，在“五四”以后思想上新因素不断积累的基础上，鲁迅的思想已开始了一个质的飞跃。这个思想上的质变，在他后来学习马列主义的过程中加快速度，并胜利完成。

《答有恒先生》一文的发表，就象在当时正处于更加剧烈分化中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树起了一面标志着坚持革命、继续前进的旗帜。随着大革命的失败，更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背离了革命，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蒋介石滴血的屠刀面前吓得瑟瑟发抖，有的甚至在反动政府中谋取了一个席位。这时，恰恰在这时，鲁迅却公开宣告自己向共产主义者的高度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思想明晰了，鲁迅就更加“坦然，欣然”。他说，如果现在反动派来审问他：“你知道苦了罢？你改悔不改悔？”他可以即刻答复：“一点不苦，一点不悔！”

九月十日，是一九二七年的中秋节，明月下的珠江显得特别凄清、冷寂。这天晚上，鲁迅校完了《唐宋传奇集》。在《序例》之

后，他豪迈而含蓄地写道：

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餐蚊遥叹，余在广州。

短短数语，洋溢着独立于险恶环境中的凛然之气，表达了对凶残的敌人极度的蔑视，形象地概括了“四·一五”以后他在广州的生活背景和战斗风貌。

然而，四周难道永远是“大夜弥天”吗？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八月一日，党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

九月初，毛主席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在井冈山建立了红色革命根据地。革命的星星之火，给黑暗中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

一个个动人的消息，终于冲破反动派的重重封锁不断传来，鼓舞着鲁迅参加新的战斗。在广州，他已经生活、战斗了八个多月。现在，他已觉得无可留恋，他向往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想在那里寻求新的战友，开辟新的战场。

他对许广平说：“走吧！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九月二十七日，趁反动派的监视稍稍松懈，鲁迅和许广平登上“山东”轮，离开了广州。

这天天气不好，层云欲雨，海面上也卷起了层层波涛。鲁迅乘坐的“山东”轮劈波斩浪，在浩瀚的大海里前进！